

陳芳明政論集③

# 李登輝情結



陳芳明◎著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區供個人研究用途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995836

周宜旋先生贈

陳芳明政論集之三

# 李登輝情結

陳芳明◎著



2995836

## 內容簡介

四百年後，當那位葡萄牙水手回想起初次驚見東太平洋的蔥鬱海島時，他再度情不自禁讚嘆：「Ilha Formosa」西方無敵戰艦沈沒了，東洋日不落帝國偃旗了。李登輝坐在國民黨老賊小醜所打造的中華民國總統寶座上，雙手痠軟地解不開脖子上那條環繞半世紀的鐵鍊：專制統治、權力鬥爭、萬年民代、省籍糾葛、統一中國、制憲修憲……。

台灣之所以有李登輝情結，主要是人民把改革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然而，怯懦的李登輝卻將一場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設計成曖昧的軍黨政權力分配。台灣的福爾摩莎情結，來自於島上人民習慣以壓抑的情感來表達對鄉土的熾愛，對民主的渴求。人民無法奔放出激越的自主性力量，美麗之島始終陷入陰闇的虛無性憧憬之中。

《李登輝情結》《福爾摩莎情結》收錄作者一九九〇到九一年間所寫的政論。作者以知識分子的感性與知性，剖析蔣政權後台灣的時代面影，冷靜犀利而又熱情開闊。作者寫道：「我親自感受到人民的信心正在恢復，人民的主體也正在重建，畢竟唯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自我拯救。」

## 灰色時代·曖昧政治

——序陳芳明政論集《李登輝情結》

李敏勇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繼任台灣中華民國總統席位，並在當月二十七日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以接替蔣經國的主席位置；再於同年七月正式當選國民黨主席。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在這種權力形式交替中，進入李登輝時代；台灣在形式上進入李登輝政權。

歷史的描述雖然如此，但是這與蔣介石死後由其子蔣經國繼承中華民國總統（在嚴家淦之後）與國民黨主席之形勢不能相提並論，因為當時蔣經國不但已經實質掌握了中華民國與國民黨的黨政軍特力量，且為蔣家政權核心人物，更重要的，他是外省人。李登輝除了副總統法定繼任身分之外，其他一概付之闕如。

但重要的也因為李登輝是台灣人。如果他不是台灣人，就沒有在蔣經國政權時代出任副總統的因緣際會。這種微妙的關係，就是何以蔣經國在死前不久公開表示他是一個台灣人的原因。然而，李登輝是否真正能夠掌握強而有力的國家和黨的領導權呢？既沒有國民黨在中



國大陸的革命背景，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也是經由刻意拔擢安排，更重要的是其總統之職位係由以國民黨為主之老賊代表所選出，並未真正具有民意正當性，在怪異的黨政軍權力環伺下充滿了脆弱和危機。

雖然如此，李登輝顯然並沒有一如國民黨權力集團期望嚴家淦的虛位總統扮相，更何況李登輝又是國民黨主席。藉著蔣經國政權時代的黨與國家領導人身分的類比，李登輝在國民黨權力集團疑慮和掣肘之下，仍然顯現出某些特殊的領導風格，也就是他所一再強調的「平衡器」風格。

從一九八八年初迄今，李登輝做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治權力的平衡器，他所面臨的課題，除了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政治、經濟、文化層面課題之外，毫無疑問的就是統獨糾葛、外省人本省人對立的這兩種因長期的國民黨專制統治後遺症。而環繞著國民黨權力鬥爭所形成的統治權力環節，更有充滿矛盾的李登輝、郝柏村體制緊扣其間。李登輝、郝柏村體制的消長、省籍意識的糾葛，以及國民黨的統獨觀，無疑是李登輝「平衡器」令人眼花撩亂的政治權力姿勢。

在這樣的時局裏，旅居海外、在美國加州聖荷西密切凝視台灣發展動態的陳芳明，在台灣各媒體頻密發表的觀察與評論，一直是掌握台灣政情脈搏的重要訊息與判斷。閱讀陳芳明的觀察與評論，顯然成為島內重要的自我省察。相信這是許許多多海內外台灣人的共識，而

這種共識因陳芳明廣博而持續不輟的精神，與日俱增。

陳芳明將最新的有關李郝體制消息、省籍意識糾葛，以及國民黨統獨的政論文章，收成一集，名為《李登輝情結》。做為他的文學界同僚，且同為一九四七年出生而被視為二二八亡靈再生的「四七社」成員，個人有幸對他收錄在《李登輝情結》這本政論集的文章，再一次優先過目，更能感受到他在觀察、評論台灣政情的那份懸密，以及那份血肉與共的心情。

這誠然是一個反諷的書名，但這也是一個反諷的時代。李登輝因緣際會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出任總統，然而這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與國格陷於分裂、虛相與實相充滿謬境的國度。李登輝因緣際會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出任主席，然而這中國國民黨是一個革命與民主充滿混淆、台灣與中國分釐不清的政商幫會。但是，在歷史轉捩點的台灣，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現實裏，李登輝以一個台灣人、出身學界、具有某些文學藝術癖性，他領導取向的理想與現實十足關連著台灣要往何處去，關連著台灣人在戰後四十多年受盡蔣政權加國民黨專政加中國體制的壓制是否面臨著轉機。

就是這種種情境，使得許多台灣人多少對李登輝有所期待而形成某些李登輝情結。也因為這種相對性的疑慮，使得許多統治族群形成另一種反李登輝情結。但事實上，長久以來習於以統治族群凌駕在台灣之上的權力核心分子，深知李登輝政權來源的脆弱性，在表面上以李登輝體制延續國民黨政權，但實地裏則處處對李登輝政權加以約制，形成李登輝政權的虛

虛實變調，使得台灣人的李登輝情結處於充滿期待和失望的糾結裏。

台灣人的李登輝情結，應當不只期待李登輝成為國民黨統治權力的平衡器，而是期待他開創和前瞻。但是另一種李登輝情結，則疑慮李登輝扮演出超越平衡器的角色，連帶的使統治族群的特殊政治權力失落。這另一種李登輝情結，也許就是郝柏村情結吧！並無任何形式性選舉所賦予的權力來源。但郝柏村多次毫不諱言地提及內閣制取向，明顯的就是從統治族群的特殊權力構造，特別是依賴軍事權力的曖昧性所呈顯的權力抗衡。

做為國民黨統治權力的平衡器，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角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處於台灣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黨的交界。國民黨包山包海發展出來的面相，幾乎成了台灣的縮影。台灣問題的改革與保守衝突，本省與外省糾葛，以及獨立與統一紛爭，無不在國民黨內部對立著。李登輝的平衡器角色，不只要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更要在本省與外省之間，以及獨立與統一之間扮演，但這種多重平衡器角色，對於台灣的過渡時期或許會有某些功能，畢竟不是開創和前瞻性功能。李登輝情結的侷限性就在這裏。

對於李登輝政權已經展開的時代樣相，以及李登輝情結的現實與理想，陳芳明在本書收錄的論述裏，提供了一個旅居海外的台灣人知識分子，兼具了歷史學者與文學家的知性與感性而又廣博的觀察與批評。這一篇一篇的歷史與時代的面影、一篇一篇的政治與社會的現象，在我們的時代，也在我們的土地上，勢將成為冷靜而又銳利的解剖，成為熱情而又深入的接

觸。

觀察與批評李登輝政權，才能在李登輝的平衡器角色裏省察到台灣的政治現實；脫出與超越李登輝情結，才能前瞻與開創台灣的政治前景。陳芳明論述心血裏所投入的，不就是這種要求從平衡器角色邁出前瞻與開創性脚步的憧憬與理想嗎？台灣的國家重建與社會改造，必須從嚴格的自我省察鞭策自己，才能跨越灰色地帶的現實，邁向理想的、充滿綠色希望的春天。

陳芳明政論集之三

# 李登輝情結 目次

003 李敏勇序／灰色時代·曖昧政治

第一輯 李郝體制的消長

017 用腳投票的時代已經到來——台灣資金大量外移的政治背景

021 一個沒有驚喜的時代——讀李登輝的就職演說

025 向民進黨挑戰——李登輝政府的新取向

029 是郝柏村表現智慧的時候——對五一九衝突事件的檢討

033 沒有前景的施政報告——評所謂的郝柏村「強勢內閣」

037 李登輝變法失敗的跡象

041	一個權力鬥爭的象徵——評「國家統一委員會」的誕生
045	拋棄舊包袱，開創新視野——論二二八事件的官方立場之崩解
049	該退的護航不該退的——郝柏村退席風波評議
053	這是一個「張建邦們」的內閣
057	同胞郝柏村不是台灣人
061	翁大銘是「人頭中的人頭」？
065	金權政治與人權問題
069	李登輝的獨台路線
071	後戡亂時期很像陳儀時代
075	戡亂時期開始對內實施——冷眼看「獨立台灣會」之破獲
<b>第二輯 省籍意識的糾葛</b>	
081	打破落伍的眷區意識——評外省籍國民黨員的結盟運動
085	這是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論大法官會議對限期退職的解釋
089	令人寒心的中國熱情——評侯德健的海峽往來
093	只有國籍問題，沒有省籍問題
097	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聞國民黨擬議召開二中全会
101	國民黨分裂的形式
105	道歉賠償不能洗刷罪名——論江南命案的庭外和解
109	人性·謊話·錄影帶——梁肅戎的人格與風格
113	學術面具下的權力追求——「民主基金會」對國民黨的衝擊
117	「民意調查」的時代已經到來？——冷眼看丁庭宇的表演
121	朝向「自民黨化」的國民黨——從邱創煥成立政團談起
125	一本護照換取一張選票——「僑選民代」的荒謬劇
129	國民黨的「僑變」疑雲
133	郝柏村的華僑觀
137	省籍戰爭蓄勢待發
<b>第三輯 國民黨的統與獨</b>	
143	李登輝政府對外關係的展望

- 155 關係法應提昇到國格的地位
- 159 面臨考驗的「一國兩府」政策
- 163 兩岸談判豈可視同兒戲？——駁斥梁肅戎的譏言
- 167 務實外交始自務實內政——論沙烏地阿拉伯斷交事件
- 171 李鵬外交對台灣的衝擊
- 175 國民黨「大陸政策」的危機——評郝柏村「一國兩區」的概念
- 179 國民黨對中國的敗北主義——據說鄧小平抨擊李登輝
- 183 統一的合唱與民主的變調——評李登輝、楊尚昆、郝柏村的談話
- 187 台灣是國際的棄兒——蘇聯與南韓建交的聯想
- 191 金門模式與國共秘密談判
- 195 還未收復的領土：釣魚台
- 199 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黨統一情結的糾葛
- 203 國民黨的蒙古症
- 207 釣魚台與「朝野合作」

- 211 當蘇聯不再是魔鬼時
- 215 唯有民主才有國防——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的想法
- 219 利益的橋樑·民意的堵牆——「海峽交流基金會」的可疑角色
- 223 政治問題豈能用文字解決——評所謂的「國家統一綱領」草案
- 227 勿以「停火協議」掩護國共談判
- 231 台灣的政治實體與政治虛構——論北京對國民黨「中共定位」的回應
- 235 「國統綱領」的新版本和舊問題
- 239 這是變相談判的開端——論《人民日報》對「國統綱領」的回應
- 243 沒有國防就沒有海防——論台灣保安員警被挾持事件
- 247 「大陸政策」的敵對與互惠——悲觀的國民黨「後越亂時期」
- 251 國際生存空間日益萎縮——台灣加入關貿總協的困境
- 255 傳達北京信息，不能如此沒水準
- 259 謹防海基會趁內亂引進外患
- 263 海基會與國民黨的大陸政策



這本後記，是陳芳明先生生前最後一篇文字。他是在病榻上，在與病魔搏鬥的艱苦環境中，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以極大的毅力，克服極大的痛苦，完成這篇後記的。這篇後記，不僅是陳先生對其一生政治生涯的總結，也是他對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深刻反思。

陳先生在這篇後記中，回顧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點點滴滴，從早期的黨外運動到後來擔任黨主席，再到最後的卸任。他坦誠地談到了自己的心路歷程，談到了在政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談到了在權力與責任之間的抉擇。他特別提到，在推動民主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和挑戰，以及他對台灣未來發展的憂慮和期望。

這篇後記不僅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更是一份充滿人文關懷的政治宣言。它展現了陳先生作為一個政治家的胸襟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擔當。這篇後記的完成，標誌著陳先生政治生涯的圓滿結束，也為台灣民主化進程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 用脚投票的時代已經到來

——台灣資金大量外移的政治背景

## 第一輯·李郝體制的消長

## 用脚投票的時代已經到來

——台灣資金大量外移的政治背景

### 投不信任票的徵兆

台灣資金的大量外流與台灣住民的大批外移，自今年年初以來已呈昇高趨勢。從王永慶赴中國投資所帶來的震盪，到鉅額資本急劇外流所暴露的恐慌，證實了一個用脚投票的時代已經到來。

所謂用脚投票，便是以資金外流與住民外移的方式，表達對現有執政者的不信任。只要國民黨不能為台灣社會重建信心，則這種「走路」的現象將會惡化下去，不是任何政策可以阻遏的。

中央銀行在四月廿八日說，雖然台灣持有的外匯存底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但是最近兩個月，外匯存底大幅減少將近卅七億美元，亦即從二月的七百三十一億九千萬美元，滑落到最

近的六百九十五億美元。這種逆轉的現象，是一九七〇年以後從未出現過的。這些數字本身，足夠反映一個社會內部的變化。這些數字指出，人民對於國民黨的統治能力表示了極大的懷疑。

對國民黨的信心銳減，乃是四十年來錯誤政策必然導出的結果。目前，能夠遠走高飛的人，大約可分為兩種，一是資本家，一是中產階級。這兩種人要走的理由可能不同，不過背後有一個共同因素，則是政治、經濟不安定。以資本家王永慶為例，他就坦然表示投資不善的話，就不可能挽留台灣的巨型工業。所謂改善投資環境，對王永慶來說，當然就是減少勞資糾紛，維持社會治安，以及降低環保意識。對於大量移民的一般中產階級來說，則是擔心國民黨沒有足夠能力抵抗中共侵犯。同時，他們也擔心國民黨沒有信心做好台灣的社會治安。

王永慶希望改善投資環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投資環境並非只是經濟問題而已，它還牽涉到政治、社會、人文等等層面的問題。在經濟掛帥之下，王永慶自以為有恩於台灣，自以為他個人資本的累積就是台灣經濟成長的指標。他從來不會自我反省，他從一位小企業家躍昇成爲今天的鉅富，台灣人民爲他分擔了多少社會成本；這種社會成本，事實上，也已經把後代子孫的生存權一起賠進去了。這種剝削土地、欺侮人民的污染工業，能夠早日離開台灣，才能夠早日讓台灣人民認清「經濟奇蹟」的真相。

### 改造政府才能改善環境

王永慶的離去，自然會引起骨牌效應。許多中小企業將紛紛轉移基地，當是可以想像的。當台灣社會環保意識、工人意識昇高時，就等於宣告「低成本高成長」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企圖以時光倒流的政策使資本家回心轉意，將只有激化社會的內部矛盾。

現在的問題是，資本家的資金外流是有理由的，爲什麼連中產階級也開始大量移民？最大的原因，恐怕也是環境污染與社會治安的問題。中產階級遠行，並非是爲尋找新的投資環境，他們需要的是安定的生活環境。社會不安，並不是由於台灣人民的民族性不良，而是由於國民黨這個統治機器已經產生故障。

以政治穩定來支持經濟成長，又以經濟成長來支持政治穩定，一直是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最佳雙元政策。政治穩定，是以犧牲人權、歧視人格換取的。這種高壓手段，創造了六〇年代以來全球少有的資本家樂園。國民黨又進一步利用經濟數字的成長，來鞏固它的統治地位。在這雙元政策裡，台灣社會喪失了歷史視野，喪失了人文基礎，也喪失了國家認同。台灣變成了一個「租界地」，能夠致富者，都擁有社會責任的「豁免權」。由於沒有歷史視野，他們看不到台灣的過去與未來。由於沒有人文基礎，他們對台灣沒有任何愧疚與罪惡感。由於沒

有國家認同，他們該走的時候就毫不留情離去。台灣既然是借來的空間與時間，他們沒有理由必須久留。

自去年年底選舉以來，國民黨一而再、再而三以中共的宣傳來恫嚇島上人民。這種藉北京的軍事威脅來做選戰文宣，可能發生效用於一時，但從長期的眼光來看，卻產生一種後遺症，那就是台灣社會失去其主體性。國民黨對北京那種露骨的投降心態，更加使失去信心的人民進一步失去勇氣。他們開始選擇用腳投票，對國民黨投下大量的不信任票。

今天台灣的資金外流與住民外移，絕對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已，其中還有更深沉的政治問題與社會人文問題。面對這樣問題重重的現象，國民黨內部並沒有立即從事改革，卻反而進行仇恨式的權力鬥爭。總統選舉糾紛之後，又有行政院長去留問題。這種鬥爭將沒完沒了，因為下一個階段還有黨主席的問題，還有總統制、內閣制的問題，更有外省籍黨員、台灣籍黨員的問題。這種權力分配優先於政治改革的心態，那一個資本家想留在台灣，那一個中產階級相信國民黨？國民黨不自我改造的話，台灣社會環境絕對沒有改造的機會，那麼用腳投票的高潮，就要到來了。

一九九〇·四·廿九 聖荷西

## 一個沒有驚喜的時代

——讀李登輝的就職演說

先安內後攘外的講詞

李登輝在五月二十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並沒有如一般人所預期的會帶來一些驚喜的宣告。在全文三千字裡，充滿了黨內各派系相互妥協的氣息，這是一篇典型的先安內後攘外的演講詞。從全文內容來看，與其說這是李登輝對未來施政的展望，倒不如說這是爲了安撫國民黨內部的不滿情緒。

這篇就職演說的妥協性格是相當清楚的，充分顯示李登輝政府的兩面性。在憲政體制上，他一方面肯定蔣氏父子實施臨時條款的功勞，一方面卻強調要修訂憲法。在對外關係上，李登輝既要努力洗刷獨台的色彩，又要劃清台灣與中國的界線；既要突出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要解釋發展「實質外交」的政策。這種雙重性格的談話，兼顧了國民黨的舊

有勢力與新興當權派的地位，也反映了李登輝政府在縫隙中求生存的確局。

自兩年前繼任總統以來，李登輝就一直依違在各政治勢力之間，企圖以模稜兩可的立場討好各方。他從來沒有表現堅定果斷的決心，也沒有展露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勇氣，而只是在有限的空間維持既得的權力格局。因此，在他執政的兩年期間，並沒有出現開創性的局面，李登輝總是抱持「不滿意但可以接受」，以及「不樂觀也不悲觀」的態度。這樣的立場，頗有自我保護的意味，也帶有過多的機會主義的色調。從這個觀點來看，李登輝政府只不過是一個故步自封、劃地自限的統治機構。

李登輝要拯救自己都已嫌力不從心了，他是不可能有任何餘力拯救台灣人的。所以，寄望他在就職演說詞中發佈驚喜的宣告，自然是落空了。他所說的「要在最短期間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以「兩年為期」完成憲政改革，這其實是相當遲緩的承諾，與整個社會要求全面改革的步驟並不配合。同樣的，他宣稱「願以平等地位」與中共建立溝通管道，以及「願以實質關係」與友好國家合作，這兩種願望全然沒有觸及中國主權與台灣主權的問題，充分顯示他在逃避政治責任與客觀現實。

### 李登輝政府的合法性

在通篇文字中，李登輝數次提到「未來六年」的說法，這似乎暗示他要完成六年的任期。不過，這個「六年論」與憲政改革的「兩年論」是相互衝突的。如果李登輝在兩年內終止戡亂時期，並且完成憲政體制的重建，則目前所有國民大會的資深代表必須退職，屆時總統民選的主張必提上民主時間表。當超過半數以上的「總統選民」都退職時，李登輝的合法性一定會受到挑戰。

李登輝如果不把總統職位開放直接民選的話，他至少要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來決定他的去留。即使在現階段，李登輝就職的合法性也是很成問題的。國民大會的萬年代表違憲長達四十年，早已失去民意的認同。李登輝經由這樣的「選民」投票選出，全然沒有合法的基礎。因此，李登輝是否能夠完成六年的任期，頗令人懷疑。

由於李登輝就職的合法性仍成問題，他的演講詞就更加暴露其內容的矛盾與衝突。例如，他說：「任何負責的政治主張，必須以認同中華民國為前提，以全體人民的福祉為依歸。」中華民國政府的違憲事實，是全民公認的。如果任何政治主張都認同中華民國的話，等於是認同違憲的行為，這樣的主張就不可能是負責任的，也更不可能是以全體人民的福祉為依歸。

這次李登輝的就職儀式在進行之際，台北正展開萬人的示威遊行。全民所抗議的，不僅是軍人干政的問題，而且也是由於李登輝的合法問題仍未解決。四十年來的所有就職典禮，以這次李登輝的宣誓最為難堪。李登輝代表的是戡亂體制的最後一任總統，是臨時條款所建立起來的傳統的最後延續。

犧牲了多少台灣的人權與民權，李登輝才終於登上今天這樣的地位。從憲政體制的立場來評估，李登輝的地位是極其不光彩的，也是極其不名譽的。李登輝在未來兩年，重點不應該放在洗刷獨台的罪名之上，而應該努力洗刷他個人以及整個中華民國的民主之恥。只有真正的民主體制在台灣建立起來，全體人民才有可能迎接一個驚喜的時代。

一九九〇·五·廿二 聖荷西

## 向民進黨挑戰

### ——李登輝政府的新取向

#### 獨台路線的浮現

李登輝開始他全新的總統任期之後，國民黨的獨台路線已逐漸明朗化。這個跡象表現在「一國兩府」構想的提出，表現在「終止戡亂時期」的擬議，也表現在國安法規定「不得主張分裂國土」的準備刪除。依照這樣的政策發展下去，國民黨已經很明顯要在台灣代表權的問題上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可以預見的，一向在台灣主權的立場上居於優勢的民進黨，如果不能在中國關係與國際關係方面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則反對運動的空間必將日益縮小。

在這次總統就職前後，李登輝在對外關係與憲政改革方面所擺出的攻勢，將迫使民進黨重新思考日後的方向。戰後四十年來，從來沒有一位總統敢於承認北京政府的存在，李登輝不僅僅表示要「以政府對政府的對等地位」與中國政府來接觸，而且在五月廿二日的記者招待會

上他也公開稱呼北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談話，即使在二、三年前也會被控以「叛亂罪」的，如今卻出自李登輝口中，並且還訂定為台灣對中國關係的一個政策。這種急劇的轉變，已立刻使原來「漢賊不兩立」的保守立場昇華為面對現實的開放立場。以這種轉變做為契機，國民黨的施政方向開始慢慢觸及台灣代表權的問題。因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中國代表權從此就定位了，國民黨再也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任何雄辯的理論。剩下來的，便是如何使台灣主權與中華民國合二為一。

由於對北京政府的公開承認，國民黨必須立即做兩件工作，一是對外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中共不再被視為叛亂團體，一是對內刪除國安法裡「不得主張國土分裂」的規定，島內的台獨言論從此不再是政治禁忌。這一裡一外的措施，自然是為了合理化國民黨的獨台路線。在戡亂時期宣告終止與國安法著手修改之後，國民黨必然會更大膽以台澎金馬的政治實體重返國際社會。這個方向，正是島內外台灣獨立運動者長期努力追求的目標。現在國民黨已主動朝這方向發展，對於民進黨與海外獨立運動者，無疑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目前國民黨獨台路線僅有的兩個障礙，便是不能不繼續宣稱維持「一個中國的架構」，同時也繼續宣稱要「統一中國」。另一個障礙則是堅持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義，而不敢直接使用台灣為國號。前者是為了應付中國武力犯台的危機，後者則是為了維持在台灣統治的合法性。

### 民進黨的反對空間

這兩個障礙是國民黨很難克服的，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社會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國民黨要維持「一個中國的架構」，就不能不對中國民主運動、海外民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有所表態。國民黨在宣傳上、口號上既然要堅持「統一中國」的立場，就有義務支援中國內部的民主運動。這樣做，必然與中國政府的利益發生衝突，而且也觸犯了干涉中國內政的原則。這種內政干涉，較諸宣佈台灣獨立還更容易引來中國的侵犯。國民黨對「民主女神號」廣播船的支援，就是一個實證，中國不僅對台灣施行恫嚇，而且還派遣潛水艇出現於台灣海面。

同樣的，在統一中國的口號下，國民黨對海外民運人士與華僑也必須不時施以小惠，例如邀請民運人士訪台，以及在台灣舉行全球華僑會議，都是在「一個中國架構」下的後遺症。這種做法又和台灣人民的利益發生衝突，因為邀請他們來台，耗費的是民脂民膏。

就國際關係的層面來看，國民黨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其實是在製造兩個中國的政策。中華民國的名義，使台灣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自去年與賴比瑞亞、貝里斯等國建交以來，台灣已經付出數億美元予以經濟援助，用以換取邦交的建立。這種彈性外交政策，是一種購買的交易，對建立國際人格及重返國際社會，並沒有幫助。

民進黨在台灣主權問題上的反對立場，可能就必須在國民黨兩個障礙上去拓展空間。不過，民進黨能夠爭取到多少發言權，仍是值得懷疑。在對待中國的政策上，民進黨仍然停留在一九八八年「四一七決議文」的「四個如果」的階段。在對待國際關係上，民進黨也仍然停留在建黨時所提出「台灣前途由台灣住民共同決定」的階段，至於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等政策，已逐漸被國民黨侵佔地盤了。

確切一點來說，國民黨在很多施政方面已主動向民進黨挑戰。從前只有民進黨能夠發言的問題，國民黨現在也搶先發言了。民進黨若仍然自滿於建黨時期的黨章、黨綱，顯然已不能趕上政治變化的脚步。在面對國民黨挑戰之際，民進黨已經到了有必要舉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集全黨的智慧重新修訂黨章黨綱，再次決定日後運動的大原則與大方向。尤其在國民黨把憲政改革也提上議程時，民進黨的建黨方針顯然已嫌落伍。反對黨本來應該是領導執政黨前進的，現在反而被執政黨搶盡機先。民進黨已不容再忽視李登輝政府的攻勢，反對空間的拓展將是民進黨日後生存的最大考驗。

一五九〇·五·廿四 聖荷西

## 是郝柏村表現智慧的時候

### ——對五二九衝突事件的檢討

#### 郝柏村是事件主因

台灣社會對軍人干政或軍人執政的憂懼，徹底表現在五二九的衝突事件上。無論是民進黨中央或反軍人干政聯盟，無論是民進黨立委或社會一般群眾，都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方式，對郝柏村的出任閣揆表示強烈的反對態度。從來沒有一次閣揆的任命，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時，遭到那麼激昂的抗爭，又遭到整個社會的反彈。只有這次郝柏村受到提名時，竟然使任命一事變得這麼不光彩。

對郝柏村的反對，並不就表示過去的行政院長都受到歡迎。只要國民黨的權力結構沒有改變，只要台灣民意沒有得到恰當的尊重，由誰來擔任行政院長，都不可能獲得社會的認同。郝柏村之所以比任何一位行政院長還更受抨擊，究其原因，乃是由於台灣社會受夠了太久的



軍事統治。將近四十年的戒嚴時期與戡亂體制，已經使社會的忍受到達了極點。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郝柏村在擔任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期間，從來沒有一次的公開談話是把人民放在眼裏的。

戡亂體制再加上軍事強人，豈能不讓台灣社會恐懼？今年二月，台北《中國時報》訪問郝柏村時，曾經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台獨是經過合法的憲政程序，國軍支不支持？郝柏村說：「那也不行，任何變更國號、國土、國旗的主張都不行。任何假藉民主程序、變更國憲的行為，我都要明確提出忠告。」這種傲慢、粗暴的態度，其心中並不存在任何人民的地位。所以，他口口聲聲表示「國軍是中華民國憲法的擁護者」，其實是違背民意、賤視憲政的。沒有人民，何來憲法？徒談憲法，不談人民，這樣的軍隊只不過是擁護權力而已。郝柏村之不受社會的歡迎，由此可知。所以，自李登輝提名郝柏村之後，反對的聲浪就繼起不絕。

五二九台北街頭發生暴力衝突事件，只不過是將近一個月來台灣社會不滿情緒的總爆發。持續十餘小時的對峙，人民與警察都有嚴重受傷。鎮暴部隊發狠執行公權力時，只有使秩序與治安更加惡化。這個事實，反而突顯了軍人統治的不良徵兆。

### 以寬容解決問題

自有街頭抗議事件以來，五二九第一次出現投擲汽油彈的行動。這說明了任何強勢作為，都有可能引來強勢回應。郝柏村在總統選舉中，沒有保持軍人中立，反而積極捲入政爭漩渦。這件事，台灣人民並沒有淡忘。事後，他發表的一連串的談話，把台獨與憲法一分為二，並宣稱國家的軍人就是要效忠國家與憲法，從來沒有表示要效忠人民。這次抗議事件終於投出汽油彈，便是對郝柏村的傲慢做出相對的回應。

這種事情的發生，對整個人民、整個社會都是不幸的。對於五二九事件，郝柏村說：「不同意見是民主社會的常態，但投擲汽油彈蓄意攻擊，可說是嚴重的暴力事件。」其實，暴力的發生，才是戡亂體制的常態。國民黨違憲長達四十年，這是赤裸裸踐踏民意的暴力。汽油彈與這種違憲暴力，可謂輕微許多。這並不是說，投擲汽油彈是值得鼓勵的；而是說，在一個反常的體制下，往往會產生非常的行動。當台灣還未回歸到憲政體制時，社會上必處處充滿危機。何時會爆發，沒有人能夠預測。

五二九的衝突事件，與韓國、菲律賓的情況相較，就可反映出台灣的反對運動已是相當節制了。從悲觀的角度來看，流血對峙誠屬不幸。可是從樂觀的態度來看，這種衝突的有限格

局，正好顯示台灣社會還沒有到絕望的地步。

在郝柏村出任閣揆的第一天，社會就以示威衝突來迎接，這說明了軍人干政的陰影仍然籠罩台灣。郝柏村不可忘記，自己就是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也不可忘記自己還未為社會帶來民主的希望。這次事件的爆發，正是給郝柏村一個警惕戒慎的提醒。究竟是要提昇公權力來維護政府的威信，還是要以寬容的執政來協助建立民主政治？

現在是郝柏村表現政治智慧的時候了，如果決定對這次示威者施以鐵腕，極有可能印證了一般對軍事統治的預言。自兩年前的五二〇事件發生以來，公權力的發揮，往往只是以暴易暴，政府的認同者反而越來越少。對於這次肇事者，郝柏村應以平常心處之，如能以寬容態度來做為執政的開端，或許可以使形象改觀。

然而，最重要的是，郝柏村應協助加速回歸憲政。只要戡亂時期還未宣告終止，國民黨的憲政改革就還只是謠傳而已。拖得越久，台灣社會就會越不耐。現在郝柏村有機會拿出執政的誠意，就必須好好把握。鐵腕措施將不只招來更多的汽油彈，還有可能引燃革命的火種。

一九九〇·五·卅一 聖荷西

## 沒有前景的施政報告

### ——評所謂的郝柏村「強勢內閣」

#### 造神運動的背後

郝柏村在九月廿五日於立法院做完施政報告之後，「強勢內閣」一詞至此算是正式確立。在口頭報告中，郝柏村提出他今後的施政重點，那就是反對台獨，整頓治安，提高國民生活品質，確保國家安全。對於郝柏村的施政報告，台灣部分媒體給予極高的評價，儼然有「聖人不出，奈天下蒼生何」之勢。

冷靜觀察的話，郝柏村的施政重點並沒有任何出奇之處。立法院的國民黨籍立委報以熱烈的掌聲，只不過是在為他造勢而已。如果他的談話內容可以做為「強勢內閣」的佐證，那麼這種強勢不免是矯情的。這十年來，台灣的行政院長凡經四次更迭，從孫運璿、俞國華、李煥，一直到郝柏村，有那一個不是在上任之初都是強勢作為？去年李煥上台時，也說過許

多門面漂亮的官話，台灣傳播媒體也無不極盡諂媚之能事，不但為李煥喝采，也為他製造「民意測驗」，其目的乃是在為李煥的到執政之路造勢。

孫運璿、俞國華、李煥所享有過的風光，如今輪到郝柏村來品嚐了。在他就任時，報界先是猶豫觀望，然後是下注押寶，現在是搖旗吶喊。這種現象，與國民黨內部派系結構的重新調整有密切的關係，也與國民黨延緩憲政改革有著錯綜的牽扯。郝柏村是由李登輝任命的，這使得李煥派支持者無所適從。如果他們過早支持郝柏村，似乎會使李登輝輕易鞏固其權力基礎。經過一段時期觀察後，他們發現郝柏村與李登輝之間也是有矛盾存在的。所謂「李郝體制」，只不過又是另一次方便的政治性結婚，從郝柏村對外的發言與行動，就可知道李登輝被比下去了。七月以來發生的種種事實，包括彭明敏的受辱、陳昭南的被捕，以及李登輝不敢會見北美教授協會會員，被迫成立「國統會」，絕口不提國是會議的結論，在在都證明李登輝已經受到挾持。

非主流派勢力所控制的報紙，之所以會努力肯定郝柏村，是有多重作用的，第一，貶抑李登輝，以達到壓制黨內獨台政策的目的；第二，擴大李登輝與郝柏村之間的矛盾，使非主流派有復辟的機會；第三，澆熄台灣社會的李登輝情結，使李登輝難以與台灣社會結合。在這些考量下，郝柏村的造神運動，就成為國民黨權力鬥爭的延續。

### 拿高射砲打蚊子

提高郝柏村的地位，同時貶損李登輝的身分，這種做法更可以使黨內憲政改革的速度減緩下來。對黨內保守勢力來說，李登輝主動召開國是會議，是要加快改革的脚步，這對既得利益者已經構成立即的威脅。

李登輝在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訪問時就指出，他雖然決心要將台灣推向歷史性的民主改革道路，但此一方向有其矛盾性，因為真正的民主化將會對台灣所稱代表全中國的主張造成影響。李登輝的說法非常委婉，說穿了其實就是統獨之爭。他很清楚，徹底民主改革的結果，就是台灣全民真正獲得憲政的精神。然而，這種徹底的做法，等於使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進而造成實質的台獨。

如果李登輝了解這種吊詭的改革邏輯，那麼握有實權的非主流派就更加清楚民主化的因果關係了。李登輝的改革路線，等於是台獨路線，等於是侵犯了他們長久掌握的政治利益。非主流派對李登輝的改革主張公開予以阻撓，甚至拿出省籍問題來攻擊李登輝。自七月以後，李登輝對憲政改革的問題，已到了隻字不提的地步。非主流派進行大規模的批鬥，果然發生了效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非主流派人士開始疏遠李煥，而向郝柏村集結，這種棄主轉向的行動，

更可透露政治鬥爭中的微妙關係。這次在立法院以掌聲肯定郝柏村的施政報告，就顯現出非主流勢力的新動向。

郝柏村把反對台獨當做施政的第一要務，態度是很清楚的。事實上，他反對台獨的立場，與俞國華、李煥並沒有兩樣。但是，這種話由他說，自有不同的意義。在憲政改革已經提上日程表的今天，郝柏村仍然要把台獨問題拿來與社會治安、生活品質與國家安全相提並論，足證台灣社會的台獨要求是多麼強烈。郝柏村會如此發言，一方面是對民間的台獨運動施行恫嚇，一方面也是對黨內的獨台主張予以警告，使憲政改革的速度不致過快。

在郝柏村的施政報告中，完全看不到台灣的政治前景。台灣社會如何突破國際的孤立，如何建立內部的民主，郝柏村完全避開不談。消極地強調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就可獲得「強勢內閣」的稱呼，實在是這個時代的諷刺。郝柏村不敢向國際社會表現堅強的態度，不敢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現堅強的立場，卻只是關起門來對台灣人民逞強。這種做法，只是拿高射砲打蚊子的姿態，產生不了遏阻作用。國民黨搞實質台獨，卻又公開反對台獨，其目的只是在保護自我利益與阻撓民主改革而已。郝柏村的強勢與台灣社會的客觀形勢，究竟何者較強，事實將可證明。

一九九〇·九·廿七 聖荷西

## 李登輝變法失敗的跡象

### 「階段論」是一種倒退

李登輝提倡的變法運動，在國是會議結束兩個月之後，已經開始呈露敗象；這種敗象，表現在政治改革階段論的提出。對於資深代表的退職問題，李登輝原來計劃以兩年三階段的方式，使萬年代表在一九九一年全部退光。但是，過了今年七月，資深代表的第一階段退職全然未見實施。就在老賊拒退之際，國民黨竟然又推出「兩階段修憲」的構想。這一修憲構想，與兩年三階段的退職是相互矛盾的。

所謂修憲兩階段論，便是以明年（一九九一）上半年為第一階段，由資深與增額國代共同參與修憲，以召開國大臨時會的方式，進行廢止臨時條款的工作，凍結憲法廿六條、六十四條、九十一條等國大與立監兩院名額及產生方式的條文。然後以增訂條文方式，產生區域

與不分區的國大代表。

修憲的第二階段訂於後年（一九九二）上半年，這時資深代表已全部退職，而由新產生的具有民意基礎的國代召開第二次國大臨時會，對憲法做全盤性的檢討修訂。

如果兩階段修憲可以成立的話，就等於表明現在的萬年代表，不必再根據先前的兩年三階段的規定退職，因為這批老賊將於明年與增額代表共同召開國大臨時會。老賊原是受到改革的對象，現在反而變成扮演改革者的角色，這是極其可笑的變法。

今年三月總統選舉時，國人大會代表在陽明山舉行閉門大會時，就曾經提出召開臨時會的要求來擴張其權力，同時又要求延長任期，準備與李登輝的任期相始終。資深與增額代表的無理要求，引起全國人民的共憤，而且還促使學生發動大規模的靜坐抗議示威。時間才過半年，國民黨就已忘記全國發生沸騰的教訓，竟然主動邀請資深代表參與修憲。不僅如此，內政部在擬議改選三國會時，其中還有一案竟是要把現任的八十名增額國代，自動延長任期至一九九五年。這種做法，等於是合理化無恥國代的無理要求。

李登輝是健忘的，整個國民黨也是健忘的。在台灣社會敦促加速改革之際，李登輝及其幕僚仍然還在構思拖延式的階段論，仍然還在設計形形色色的甲、乙、丙案，仍然還在妄想把所謂的僑選立委重新包裝成不分區代表制。這種種措施只在證明一個事實，李登輝不是變法的改革者，他的革新運動已是失敗的了。

### 光緒變法的前車之鑑

李登輝變法的最大目的，不在搶救台灣社會，而在於拯救國民黨本身而已。從目前李登輝的施政方向來看，他處處都要從國民黨原有的框架與條規去進行改革。對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與派系團體，李登輝一再讓步妥協，一再低頭後退，其目的只不過是為了鞏固其權力而已。

社會大眾對李登輝之所以表示同情，並且又因同情而產生寄望，便是希望他能夠得到權力以進行改革。因此，他在繼任總統的前兩年期間，社會大多能諒解他的毫無作為。但是，今年當選總統之後，李登輝還是不敢有所行動。如果說，李登輝仍然還在感嘆他沒有權力，那是一種欺罔。國民黨臨時條款所賦予他的權力，至大且鉅，只是李登輝沒有勇氣去使用而已。李登輝之所以沒有勇氣，乃是由於他對權位過於戀棧。

滿清戊戌變法的失敗，在於光緒皇帝過於懦弱。光緒一方面頒布新政「上諭」，一方面卻大量使用慈禧太后的黨羽。這種情況，正是李登輝變法的先例。李登輝正式登基後，立即召開國是會議，企圖表明他將有所作為；另一方面，他卻過於依賴國民黨的保守黨羽。郝柏村猶之於光緒朝的榮祿，「身兼將相，權傾當朝」。榮祿擴張權力時，借機削弱皇權，全力打擊

改良主義者。郝柏村對李登輝的干涉也是有目共睹的，他阻撓李登輝接見教授會會員；他提出「一個兩區」的構想，來取代李登輝「一國兩府」的主張；他主持全國治安會議，以達到權力擴張之實，李登輝僅是受邀致詞而已。

這樣一位溫、良、恭、儉、讓的總統，居然還受到「獨裁」與「獨台」的指控。李登輝在國是會議後的兩個月，就全力洗刷這兩個罪名，又是宣稱不戀棧黨主席的職位，又是忙著組織「國家統一委員會」，其目的都在為自己開脫罪名，這是一種變相的「下罪己詔」。

李登輝的變法運動算是失敗了，他空有臨時條款的權力，卻不敢大膽去做。從階段論的提出，到各種方案的完成，國民黨的政治改革都只是在維護一己的利益而已。一個處處保護舊有勢力與利益的變法，絕對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在變魔法而已。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台灣政治改革之「道」，就完全要依賴全民的力量了。

一九九〇·九·九 聖荷西

## 一個權力鬥爭的象徵

——評「國家統一委員會」的誕生

### 光怪陸離的權力鬥爭

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已經到了光怪陸離的地步。這半年來，國民黨各個派系的相互傾軋，日趨複雜。黨政要員的全部聰明智慧，盡耗於權力角逐之中。國民黨承諾的所謂兩年三階段退職方案，以及在國是會議所承諾的憲政改革，到今天仍然一籌莫展。

伴隨著權力鬥爭昇高之際，台灣經濟開始呈現衰退的景象，台灣對外關係也加速萎縮孤立。這些情況，充分顯示國民黨的統治能力已經出了問題；即使它所掌握的國家機器還不至於分崩離析，至少台灣社會再也不可能依賴國民黨的力量而發展下去。當台灣人民求變之心越來越強烈時，國民黨仍然停留在坐地分贓的階段。

在島內，有所謂「民主基金會」、「展望基金會」的出現；在海外，則有所謂「獨立黨部」

與「興中會」的鬧劇。一個健全的政府與政黨，應該是日益走向制度化的道路；唯獨國民黨竟穿過時光隧道，倒退到宗派與幫會的時代。面對這種內部的分裂，國民黨中央顯然束手無策，卻只是忙亂派遣高幹四處安撫。這樣的黨，要拯救自己都已嫌不足，又如何能夠拯救台灣？

國民黨中央目前的急迫工作，便是全力護權；國民黨下游團體的努力目標，便是全力奪權。這種護權與奪權的主要戰場，當以即將來臨的三中全會為中心。黨中央與下游團體，都希望在三中全會中獲得實權。以李登輝為首的黨中央，不打沒有把握的仗，當然是儘量把這場會議越延後越好。只要把時間拉長，就可做更週全的作戰準備。

近日中，國民黨宣稱要成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便是李登輝用來做為政爭的工具之一。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機構，是為權力鬥爭而設立的。只有國民黨在台灣統治四十年的過程中，才會不斷設立各種奇怪的組織、機構。從婦女會到救國團的成立，就反映出當年宋美齡與蔣經國政治鬥爭的景況。如今，李登輝籌設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也只不過是為了鞏固其權力地位而已。

## 那一國的統一？

就像婦女會無關乎婦權，救國團無關乎救國，現在擬議的「國家統一委員會」當然也與所謂的統一毫不相干。自從在四十年前設立「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以來，國民黨未嘗有一日是真正要統一中國的。對於一個酷嗜權力的黨機器而言，如果「光復大陸」、「統一中國」之類的包裝可以鞏固統治基礎的話，李登輝就沒有理由不繼續掛起這樣的招牌。

在各個下游團體的指控之下，李登輝必須全力洗刷他的「獨台」罪名。尤其是一些國民黨非主流派，一方面努力與北京緊拉關係，一方面則又指責黨中央的大陸政策不夠明確。不善於權力鬥爭的李登輝，終於也學習到一些鬥爭的技巧。國民黨的反動保守勢力都能夠組成「民主憲政研討會」，李登輝當然也可以籌組「國家統一委員會」了。

國民黨從事「獨台」工作長達四十年，卻只由李登輝一個人來承擔這樣的指控，這當然是極其可笑的事。亞東關係協會會長馬樹禮對外表示，「統一委員會」的成立，可以消除外界對李總統「獨台」傾向的疑慮。馬樹禮的談話，真是可圈可點。那些拒絕退職的、反民主的老賊既然以「民主憲政研討會」做掩護，則走獨台路線的李郝體制就更需要以「國家統一委員會」來粉飾了。

在國是會議中，從來沒有達到所謂「國家統一」的共識；如果有共識的話，那也只是憲政改革而已。其中最受矚目的一個共識，就是總統民選。然而，國是會議結束以後，國民黨對於總統民選的議題從此絕口不提，而憲政改革的方案則變成國民黨的黨務來辦理。真正付諸實行的，竟然是國是會議中沒有獲得結論的「國家統一」。國民黨的改革誠意，可謂是本末倒置。

國民黨在台灣都沒有誠意、沒有能力實行民主了，則統一中國對台灣人民有什麼好處？如果以為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就等於是在進行統一的工作，那就過於天真了。台灣的一些迂腐教授，竟然還認真作假，在德國模式與韓國模式的問題上侃侃而談。國民黨並沒有任何模式可言，最多只不過是權力鬥爭而已。

一九九〇·八·二十

聖荷西

## 拋棄舊包袱，開創新視野

### ——論二二八事件官方立場之崩解

#### 永遠遲到的政權

台灣社會對二二八事件真相的追求，已到達空前蓬勃的狀態。台灣宗教界、學術界，以及南北各地校園，都在今年以追思、祈禱、研討的方式展開紀念活動。當民間已經在各地紛紛建碑，當和平日的建議已為民衆所普遍接受，國民黨面對這樣的盛況，又平白拖過一年。

內政部長許水德說，關於為二二八事件訂定紀念日及興建紀念碑問題，今年已來不及去做了。總統府資政邱創煥也說，他已建議成立專案小組研究為二二八事件立碑、建紀念館、訂紀念日，以及向受難家屬致歉的可行性。官方人物發表這些談話時，距離事件的發生，已經達四十四年；距離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的發起，也已超過四年了。

二二八事件禁忌的突破，並非來自官方，而是來自民間的勇氣、果敢與氣度。今天官方



人物能夠對這個事件侃侃而談，能夠參加追思祈禱而不覺得慌亂，實在是由於民間突破禁忌有以致之。倘若沒有戰後成長起來的青年，在警棍、盾牌、鐵絲網的重圍中跨出重要的一步，民間可能仍然對事件還保持怯懦的沉默。官方也可能恬然不以為恥，可能還視事件為統治者必要的措施。

從李登輝祭出「向前看」的遁詞，到俞國華說出「滿清入關」的論調，以至新聞局宣稱沒有完整的史料保存，都充分顯示國民黨不斷在逃避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歷史。如果沒有民間持續不斷的努力，敦促國民黨克服本身的障礙。國民黨恐怕仍然自我囚禁在歷史的牢籠裡。

經過四年來民間壓力的累積，俞國華的「滿清入關」論，已遭到朝野各界人士的嚴厲譴責。國民黨的「沒有史料」論，也隨著「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的成立而揭穿謊言。李登輝的「留待後代史家」論，更由於民間史料的陸續出土，而完全失去了立足點。

國民黨總是遲到的；但是在遲到之餘，卻總是不懂得說抱歉。和平日促進會的戰後青年，為國民黨辛勤開路，官方仍然不懂得表示感激。他們寧可拖過一年，對致歉、建碑等問題，還是抱著得過且過的態度。

### 信心危機日益加深

自事件發生以降，歷史撰寫權一直操在國民黨手中。四十多年來，國民黨就有關事件出版的宣傳品，已不下數十餘種。在壟斷史料、壟斷解釋的情況下，國民黨仍然沒有贏得民間的信任。從社會各個角落所傳出的呼聲來看，官方的歷史解釋一直刻意隱瞞著事件的真相。

有一種陳腔濫調的說詞，便是堅稱事件發生的原因，乃是由於台灣人受過日本的「奴化教育」。這種見解，彷彿是說只要台灣人沒有接受日本人的「毒素思想」，事件就不會發生。國民黨苦心建立起這樣的觀點，是經不起考驗的。這就像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北京政權指控學生受過西方「民主毒素」的說詞一般，絕對不可能使民衆信服的。

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之所以會被推翻，最後又被驅逐出境，恰恰證明這個政權是出了問題的。中國人民並沒有受過日本的「奴化教育」，並沒有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殖民」過，為什麼他們竟然也起來顛覆國民黨政權？這個事實證明了：台灣人比中國人民還更早覺悟要驅趕國民黨政權。

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的反抗畢竟失敗了，但這並不能因為失敗，就可肆意由官方來捏造不近情理、不符史實的歷史解釋。國民黨應該汲取歷史教訓，檢討本身所犯的錯誤，而不是

巧思各種理由來轉嫁責任。

到今天，邱創煥仍然還在說：「希望大家都能記取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教訓，了解暴亂只會帶來生命的傷亡，不會有任何建設」。這是什麼話？二二八事件豈是一場暴亂？依照邱創煥的這種心態，國民黨提出的報告會是什麼貨色，已不難想像。在面對這個嚴肅的歷史事件時，國民黨必須更謙卑檢討當年的落伍統治與封建心態。沒有勇氣跨出這一步，台灣社會對國民黨的信心必將日益遞減。

台灣民間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起來反抗，並不是暴亂的原因，而只能視為暴政下的一個結果。除非台灣人寧可接受國民黨的「奴化教育」，否則國民黨的歷史解釋是不可能獲得認同的。在紀念活動達到高潮的今天，國民黨應該卸除陳舊包袱，展開全新的視野。如果民間都有勇氣克服四十年來的畏懼，則權力在握的國民黨，就更沒有理由不克服長期以來的心虛了。

一九九〇·二·廿六 聖荷西

## 該退的護航不該退的

### ——郝柏村退席風波評議

#### 郝柏村的勇夫之懦

郝柏村在二月廿六日的退席風波，以及梁肅戎在三月一日的護航行動，顯示了國民黨政治文化的粗糙、野蠻與悖理。立法院在開議的第一天，民進黨立委抨擊國民黨資深立委未能依照承諾準時退職，因而紛紛上台質詢。郝柏村不耐這樣長久的質詢，突然拂袖離去，行政院官員也尾隨不告而別。事後，新聞局長邵玉銘解釋，郝柏村的離席，是因「中東戰爭正熾政務繁忙」。到了三月一日，郝柏村則又改口說，率全體閣員退席是「維持行政院長最低限度的尊嚴」。

如果說，「中東戰爭正熾政務繁忙」的理由可以成立，郝柏村顯然是在說謊。因為，台灣並沒有參加中東戰爭；這場戰爭真正對台灣有所影響，便是參戰國的石油紛紛降價之際，唯

獨台灣的油價宣告上漲。除此之外，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早已喪失淨盡，絕對不可能戰爭正熾，政務繁忙。

郝柏村說得極為冠冕堂皇，在三月一日親自解釋時，還說「行政院每耽誤一小時，等於耽誤全民二千萬小時的工作」。然而，他說這話時，他竟去參加了朱高正「中華社會民主黨」的成立酒會。未知他的時間效率是如何折算？

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郝柏村，明明知道資深立委沒有信守承諾，在這次會期開議之前必須依約退職。老賊不退，是國民黨之恥，是台灣民主之恥。因此，面對民進黨抨擊國民黨的失信，郝柏村竟以離席行動來轉移台灣人民對退職問題的注意。該退職的，竟然不退；不該退職的，反而退了。郝柏村的行動，不是蠻勇，而是怯懦的行為。

一個行政院長的起碼尊嚴，絕對不是以這種粗糙的做法就可建立起來。施政報告的對象，如果是以一群沒有民意基礎、沒有議事能力的老賊做為聽眾，這種立法院對行政院才是最大侮辱。郝柏村如果要維持起碼的尊嚴，他應該是提出這樣的要求：等到老賊退光了，他才願意前來做施政報告。

然而，郝柏村的強勢作為，並不是表現在這樣的政治倫理之上。相反的，他對於民進黨抨擊老賊的正義行為，不僅沒有仗義直言，卻以自我墮落的行為，自甘淪為老賊的共犯。這位勇夫的強勢，正好反映了他人格的頹勢與怯懦。

### 梁肅戎的懦夫之勇

郝柏村退席風波，並沒有因為他的親自道歉而終止。曾經有說謊前科、有篡改議事紀錄前科的梁肅戎，對於郝柏村的不禮貌行為，沒有絲毫的譴責。

梁肅戎以「敷衍兩句」而建立他的人格名聲，這次果然不再敷衍兩句，反而是默默無語。他的行動，等於是默許郝柏村的離席。依照行政院的說詞，在議事中途休息時間，郝柏村曾經通知梁肅戎，他將有離席之舉。一位有擔當的立法院長，如果知所進退，至少可以做兩件事：第一，行政院長郝柏村必須尊重立法院，即使退席是合理的，也應該進行協商；第二，梁肅戎即使同意郝柏村的個人行為，也應該讓全體議事的立法委員知悉這件事。郝柏村的匹夫之勇，加上梁肅戎的龜縮不前，其結局自然是一場災難。

事情發生以後，梁肅戎未能及時補救，竟然對於郝柏村是否做過口頭通知一事，全然予以掩蓋。非常清楚，立法院長要為行政院長護航，已是相當清楚。

梁肅戎早就是應該退職的一名老賊。他應該退職，竟然不退；反而進一步為不知禮貌之為何物的郝柏村護航。整個台灣政治上層結構的倫理，就是由於有這種駭人的、落後的文化才完全破壞無遺。

國民黨的增額立委，與一些幫閒的學者，對這事件的評論恰恰倒果為因。他們的論調是這樣的，就是因為立法院議事效率的不彰，才招來行政院的侮辱。這種的見解，全然是背德而悖理的。立法院就是存在著沒有水準的、沒有民意的萬年代表，才使整個議事效率如此低落。民進黨就是要改善這種不合理的結構而進行抗爭，如果這種抗爭影響議事的進行，國民黨應負百分之百的責任。

如今，不該退席的郝柏村，首先為應該退職的老賊護航；接著則是應該退職的梁肅戎，又為不該退席的郝柏村護航。這樣的禮尚往來，這樣的投桃報李，正是國民黨政治文化的精髓。這不是一場茶杯裡的風波，而是時代裡的風浪，其衝擊是至大且鉅的。

一九九一·三·二

## 這是一個「張建邦們」的內閣

### 沒有商業道德的內閣

郝柏村在最近表示，對於他的內閣成員表示很滿意，並強調每位閣員都很「稱職」。郝柏村的談話，應該是可以相信的，以他那種家長式的領導作風，可以說信心十足。以交通部長張建邦為例，便是郝柏村內閣的一個典範；在濫用權力上，在輕許諾言上，張建邦就做得非常稱職，而且是屬於強棒級的。

在一九八九年年底的選舉時，張建邦為了輔選，不惜向宜蘭縣民承諾，只要支持國民黨籍縣長候選人李讚成，政府就會建設北宜高速公路，就會使「六輕」不會在宜蘭設廠。然而，李讚成落選後，郝柏村內閣卻開始積極推動在宜蘭設廠的計劃。等到六輕遭到宜蘭縣民的強烈抵抗之後，郝柏村又公開表示要擱置北宜高速公路的規劃。

一個政府竟然以公共工程做為競選用的政治支票，做為稱職的馬前卒的交通部長張建邦，為達到爭取選票的目的，對選民做各種不實的政治承諾。等到選舉失利以後，國民黨立即撕掉支票。所謂的強勢內閣，就是這種「朝令夕改」、「背信毀約」的勾當。

公共工程，是台灣全體納稅人共同投下的心血。人民納稅是要委託政府為他們規劃整個社會的平衡發展，但是，權力在握的國民黨，卻把這種委託的工作當做政治工具。企圖把公共工程的規劃，用來控制地方的政治。這種公僕，傲慢到騎在人民的脖子上，甚至還以人民的血汗錢做為政治的釣餌。政府的公信力，淪落成庸俗的商業行為；更不堪想像的，郝柏村內閣比一個普通商人還不如，非但不遵守商業信用，而且還跳票撕票。這種情況下，人民還敢繳稅給這種沒有信用的政府嗎？

郝柏村的強勢姿態，是一種在商言商的姿態。為了資本家少數人的利益，他可以犧牲整個宜蘭縣民的全體利益；如今，郝柏村不能滿足資本家的慾望，竟然還反臉毀掉整個北宜高速公路的計劃。郝柏村在三月五日還說：「緩建北宜高速公路，是因為宜蘭目前工商發展的需要並不迫切。」這種話，在「六輕」建廠受挫之後，才發表，實在是太「巧合」了。

在一年多前，如果宜蘭縣民讓國民黨籍候選人當選縣長的話，北宜高速公路就一定變得相當「迫切」了。如果不迫切的話，張建邦豈會在選戰中公然承諾？因此，所謂迫切性，絕對不是經濟上的理由，而純粹是政治上的理由。即使不談政治道德，僅就商業道德來說，郝

柏村內閣是非常沒有水準的。

### 張建邦是一個典範

張建邦背信毀約的問題，不應由他個人來承擔，而應該由整個郝柏村內閣來負責。張建邦敢於開出政治支票，乃是國民黨長期濫用政治權力的一個具體表現。郝柏村也許會辯稱，張建邦去宜蘭輔選時，他還未上台。然而，郝柏村擔任閣揆後，既未更動交通部長的人事，也未對其政治諾言表示不滿。相反的，郝柏村還公開宣稱每位閣員都很「稱職」，這個問題他是推卸不掉的。

郝內閣的濫用權力尚不止於此，最近張建邦的家人又傳出股票風波的醜聞。張建邦的夫人姜文鑑，是華隆公司的監察人。華隆公司在去年十二月，將所持有的國華人壽保險公司股票，以遠低於市價之每股一百二十元的價格，轉讓五百萬股給淡江大學副教授游顯德及張建邦的女兒張家宜。

張家宜購得的股票即使是合法的，那麼，根據國稅局的紀錄，就顯示她去年有過逃漏稅。如果是不合法的，那麼，張建邦夫人則涉嫌利用私親情誼，不惜以低價股票轉讓，這種行為已觸犯刑法背信罪。為什麼華隆公司會發生這種事？這件事與新設的蘭陽銀行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張家宜與游顯德都是新銀行的投資人。

張建邦家族發生了這種風波，他本人是不是應該負責？這就牽涉到責任政治與政治道德的問題。就是在他的權力庇蔭之下，利益才會匯集過來。那樣高額利益的轉讓，為什麼不會發生在尋常百姓家，卻偏偏發生在張建邦家族的身上？民進黨立委彭百顯指出，這不是一個家族的問題，郝柏村必須對政商股票轉移案所造成的傷害，對全國人民道歉。彭百顯說，股票轉移已涉及交通部、財政部、經濟部、法務部，絕非張建邦一人下台就可搪塞的。

政商勾結，是國民黨權力結構中無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次股票醜聞，並非是今年才發生，張建邦只是一個典範而已。長年以來，財政部的「包庇」，法務部的「縱容」，才是醜聞的根部與恥部。

最近，財政部長王建煊，已揚言要追查逃漏稅，並且要以公平方式去追查。事實上，要查稅，就應該優先從國民黨內部的「張建邦們」查起。這就像國民黨要掃黑的話，就應該先從上層結構的「汪希苓們」掃起。汪希苓下台，張建邦下台，對整個政治改善都是無補於事的。汪希苓、張建邦只是被國民黨上層權力者無謂犧牲而已。台灣社會將冷眼旁觀，郝柏村的強勢內閣到底要逞強到幾時？

一九九一·三·八

聖荷西

## 台胞郝柏村不是台灣人

### 自我扭曲的「台胞」

郝柏村接受民進黨立委邱連輝的質詢時答覆，他在台灣住了四十年，承認他是個台胞，但承認台胞並不是就主張台灣應獨立於中國之外。這是郝柏村說過「我愛台灣，但更愛大陸」之後，表現其淡薄台灣情感的又一次證明。

「台胞」的全稱是「台灣同胞」，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統戰的官方術語。邱連輝在三月廿二日質詢時指出，一位江蘇籍的台灣人進入中國後，被中共官員在其證件蓋上「台胞」的戳印而提出抗議。中國官員斥責這位來自台灣的人士說，「在台灣住了四十年，還不承認自己是台胞？」邱連輝以這個故事相詢於郝柏村，是否承認自己為台灣人，因而有郝柏村的上述回答。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在台灣統治了達四十年以上，竟然未能與台灣社會的族群融合成一片，拒絕宣稱自己是「台灣人」，反而寧可自我矮化，接受中國北京領導人所規定的稱呼「台胞」。這種表現，十足反映了郝柏村對中共的投降心態。

政治名詞的使用，在每個階段、每個時期都有特定的含義。北京創造「台胞」一詞，是經過內部統戰會議精心設計出來的。這就像「一國兩制」的主張，都蘊含了一定的政治內容。與中國處於「交戰狀態」的台灣，對於中共推出的任何統戰語言，都必須審慎看待。權力在握的郝柏村，是國民黨「大陸政策」的主要決策人，絕對不可能不知道「台胞」一詞的統戰意味。

然而，他不僅接受了「台胞」的稱謂，還進一步表示，所謂「胞」字當指一個國家，台胞去大陸不是去外國。他還說，既然承認了這「胞」字，就不能主張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

郝柏村使用中共的術語來壓制台灣主權獨立的概念，其立場為何，已不言而喻。郝柏村明言，接受台胞，等於是接受「一個國家」；又明言去大陸不是去外國。這是很明白的，郝柏村在內心裡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爲同一國家。做爲行政院長的郝柏村，對於國家主權與尊嚴，竟有如此悖理的發言。無怪乎民進黨立委葉菊蘭會抨擊說：「我們憑什麼相信你，郝柏村先生？」

### 自我矮化的「主權」

郝柏村的嚴重失言，主要原因是爲了反擊邱連輝的質詢。因爲，邱連輝原是要郝柏村能夠向全世界宣佈：台灣主權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這樣的宣佈，事實上是符合客觀的政治現實，而且也有利於台灣重返國際社會。

以申請加入關貿總協（GATT）爲例，該國際組織執行長鄧克爾，於三月廿日向台北「聯合報」記者表示，台灣申請加入關貿總協，面臨的是「政治主權上的困境」。鄧克爾說，「在聯合國體系中，台灣並不存在。而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對台灣申請入會做什麼？事實上我們無能爲力」。

關貿總協的負責人清楚台灣在國際的處境。當北京不斷對國際宣傳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之際，國民黨也附和地表明台灣主權不能獨立於中國之外。在此情況下，國民黨不但不能讓國際人士分辨台灣與中國的分際，反而還強化國際的一個印象，亦即台灣是中國內政的一部分。如此自我混淆視聽，如此自我混亂脚步，又如何能責怪北京阻撓台灣進入國際組織？

郝柏村在台灣主權的問題上，既已表現了頭腦不清楚的思考，現在又在「台胞」的問題上，自甘矮化自己的政治立場。這種進退失據、舉止失措的言談，充分暴露了主政者對國家

尊嚴的缺乏認識。

願不願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並不是重點所在。日本殖民統治者從來沒有承認自己為台灣人，也照常統治台灣達五十年之久。但是從歷史經驗可以看出，郝柏村之拒絕與台灣社會的族群認同，只不過又一次證明他具有強烈的殖民心態。然而，這樣的殖民者，畢竟還不是主子，因為背後還有一個稱他為「台胞」的主子——北京政權。

郝柏村從來就不是台灣人，他是統治圈裏的「台胞」，也是北京中共政權核定的「台胞」。郝柏村能夠如此劃清界線，台灣人可以更清楚看到國民黨的統治本質。

一九九一·二·廿三 聖荷西

## 翁大銘是「人頭中的人頭」？

### 棄俸保帥的策略

民進黨立委彭百顯，在四月五日公佈華隆集團二次公開政商勾結的紀錄，顯示該集團在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一九九〇年都有利益輸送的事實。每次利益輸送，都牽涉到國民黨權力核心的人物。一九七七年的醜聞，蔣經國出面掩護；一九八三年的醜聞，俞國華是其中的要角。這次醜聞，則涉及交通部長張建邦。彭百顯呼籲，政府應徹底追究違法失職的人員與責任。

華隆案的醜聞，已到了醜不可聞的地步。因此，國民黨對這個案件將有可能被迫有所「交代」。這就像江南案發生時，國民黨在美國政府的施壓下，終於以殺車保帥的方式犧牲掉情報局長汪希苓，算是對美方負了「政治責任」。汪希苓是整個江南謀殺案的「人頭」，他頂替了



國民黨應該負的一切責任。這種做法，是一種變相的「政治利益輸送」；犧牲了小我，完成了大我。

現在發生的經濟利益輸送案，顯然也有可能要以華隆集團的「龍頭」翁大銘，當做整個政商勾結過程中的「人頭」。淡江大學副校長、交通部長張建邦的女兒張家宜，已在日前寫信表示，她不可能在四月八日回台應訊。她說，她從未購買國華人壽股票，而是遭人冒用「人頭」買賣。

如果張家宜是「人頭」，淡江大學教授游顯德也是「人頭」的話，檢察官已經透露，偵辦全案的方向將針對翁大銘。以書信方式自我辯護，就可排除檢方的偵查。那麼，游顯德爲什麼必須被拘押禁見，張家宜反而可以逍遙法外？張家宜可以這麼做，游顯德也應該可以這麼做。不能因爲她有一位交通部長的父親，就可寫信搪塞。這種差別待遇，不就是司法系統對行政系統的另一次「利益輸送」嗎？

檢察官的偵辦重點僅朝向翁大銘一人，顯然是要把政商勾結的色彩沖淡。萬方無罪，罪在翁大銘本人。現在的問題就在於，翁大銘是否願意扮演「人頭中的人頭」。如果他樂於擔任冤大頭的話，整個案件的劇本就可全部改寫；發展到最後，就可能像張建邦說的，「到時候大家自然會了解」。

### 圍趙救魏的策略

翁大銘是關中「民主基金會」的重要支柱，他的去留關係到基金會的成敗。由於這牽涉到國民黨內部整個政治結構的生態，翁大銘是否樂於從事一次利益輸送，以自我犧牲的方式來成全國民黨的名節，則有待進一步觀察。

就在華隆案情高潮迭起時，「民主基金會」的立委郁慕明，突然在立法院以打擊特權的名義，揭發長榮航空張榮發挾總統之名以令部長的事實。自稱是關中「愛將」的郁慕明，在質詢中指出，張榮發以李登輝的名義向前交通部長郭南宏施壓，用以爭取桃園機場用地。郁慕明在質詢後辯稱，他的行動「外界不必打成是非主流的反擊，也不必描述此事是一政爭動作」。在華隆案醜聞高昇之際，郁慕明適時揭發另一個醜聞，令人不免有柳暗花明之感。郁慕明在質詢後對記者的談話，果然牽扯出這雙重利益輸送案的政治意義。原來，華隆案的發生，是主流派要打擊非主流派；而長榮案的暴露，則是非主流派要反擊主流派。

長榮案是否會繼續發展，就要看郝柏村願不願意「查清楚」，也要看李登輝願不願意出面說明。郁慕明有勇氣的話，就應該窮追猛打；就如華隆案那樣，檢察官也必須查個水落石出。否則，華隆案僅找出一個人頭來頂替；而長榮案也抓另一個人頭來承擔政治責任。雙方通過

翁大銘是「人頭中的人頭」？

相互的「利益輸送」，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國民黨的共犯結構仍將安然無恙。

無論華隆案與長榮案的結局如何，公開在台灣社會之前的一個事實是，中華民國政府早已淪落成爲一個利益團體。所謂五權分立，只不過是代表五個利益團體的不同管道；它們所涵蓋的下游團體，可謂不計其數。一旦有事情發生時，各個部會則互相掩護前進。直到一切問題無法掩蓋時，就找出一個人頭冒名頂替。做爲利益團體的中華民國政府，最後仍然維持了整體的利益。

翁大銘是否會變成「汪希苓第二」，目前尙難預卜。這必須等到各個部會共同會商之後，終究會有一個人頭出現的。擅長股市經營的國民黨，是不愁沒有人頭的。

一九九一·四·六 聖荷西

## 金權政治與人權問題

### 製造不安的「治安內閣」

在全國人民的注視之下，交通部長張建邦果然在四月廿四日辭職了。他的下台，暴露了台灣金權政治的現象；然而，政商勾結與輸送利益的疑雲，則仍然籠罩整個郝柏村的內閣。

郝柏村是在去年六月上台的，在短短不到一年之內，除了說幾場強勢的語言之外，對於台灣的內政、外交，毫無任何開創的氣象可言。在張建邦涉及北宜公路建設計劃的背信案時，郝柏村則乘勝追擊，大大修理了宜蘭縣的地方政府與無辜百姓；對張建邦的政治責任問題，絲毫沒有反省自責之心。

一個政府可以對人民公開背信，甚至把可恥的「朝令夕改」的惡習，合理化爲「國家整體規劃」的行政考慮，這樣的內閣已經爲日後台灣社會投下陰影。直到張建邦又涉及華隆公

司的利益輸送案時，郝柏村仍然在公開場合稱讚他，並且還揚言，等司法審判確立後才考慮張建邦的辭職的問題。

現在張建邦只是首度被秘密偵訊而已，郝柏村又突然以「尊重個人意願」為由，讓他辭職了事。司法審判都還未進入程序，郝柏村就開始「朝令夕改」了，這不能不使人有殺俾保帥的聯想。張建邦辭職所牽引出來的金權政治問題，是郝柏村內閣的問題。財政部對政商勾結的問題，沉默不語；教育部對「政」「教」合作的問題也沒有意見。彷彿張建邦是一個「個體戶」，與郝柏村內閣毫不相干的樣子。

張建邦擔任淡江大學校長達二十餘年，如今他的女兒又是該校的副校長，而翁大銘是該校的董事。華隆公司案爆發後，多位教授已公開承認被當做「人頭」。學校是樹立道德形象的重地，然而，政客、商人卻利用這種形象從事商業利益的活動，這是對教育的最大傷害。事實上，不僅是教授被當做「人頭」而已，淡江的學生也被當做「人頭」。無辜的學生被拿來做為政商勾結的掩護，教育工作變成了金權政治的一部分。

郝柏村內閣，是以掃黑建立威信的。不過，台灣最黑暗的地方，不在一般的社會上，而是存在於國民黨的上層結構裏。如果郝柏村不能好好澄清政商勾結的疑雲，則他的「治安內閣」必將給台灣社會帶來更大的不安。

### 混淆金權的「人權立委」

就在張建邦決定是否辭職之際，從未關心台灣人權狀況的國民黨立委，卻突然關心起華隆公司被羈押的翁有銘的人權問題。以國民黨非主流派為主體的國民黨立委，據說爲了了解檢察官在調查華隆案時是否有濫用職權，遂聯署提案要求法務部長呂有文到立院備詢。

領銜聯署提案的軍方立委張志民說，「我關懷所有同胞的權益，翁有銘亦然，今天不能因爲一個人有錢、有勢或有些政治色彩，大家就不能談。」這種關心人權的嘴臉，不能不使人毛骨悚然。台灣的人權問題自來就不受尊重，先抓人再找罪證的習慣，早已沿用了四十餘年。遠的不說，今年一月發生的沈富雄醫師被捕案，完全在罪證不明的情況下遭到羈押，那時候關心人權的張志民究竟在那裏？參加這次聯署的國民黨立委又在那裏？

國民黨立委對於資本家的人權，如此關心備至。似乎必須有錢有勢，才有人權可言；彷彿必須有政治色彩，人權才會獲得關心。一位立委對人權表示關心，並沒有錯誤；問題就在於關心的時機與對象。如果今天被羈押的，不是翁有銘，而是其他尋常百姓，試問張志民會去關心嗎？翁有銘與關中民主基金會的親密關係，以及由此關係而渲染出來的政治色彩，才是今天「人權立委」真正關心的所在吧。然則，他關心的，是金權問題，而不是人權問題。

人權問題，並非止於政治人權的層面而已，它還包括經濟人權、社會人權、文化人權等更關係到人民權益的問題。國民黨的政商勾結與利益輸送，早就嚴重侵犯到全體人民的經濟人權問題；利用大學的道德形象來從事商業利益的活動，這也侵犯了全體人民的教育人權。國民黨立委不能在大原則、大方向掌握社會癥結的所在，卻只因爲一位資本家的羈押，就表現出大手筆、大動作的聯署提案。這種本末倒置的關心，便令人寒心。

張建邦的辭職，張志民的關懷，精確點出了今日台灣社會價值混亂的問題所在。這是金權政治高度發達的國家，也是基本人權最不受尊重的地方；然而，國民黨卻能完美地將二者結合起來，台灣社會當然就更加黑暗了。

一九九一·四·廿六 聖荷西

## 李登輝的獨台路線

李登輝在台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最大的意義不在宣佈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也不在宣佈「憲法增修條文」的生效，而在於揭示國民黨的「獨台體制」從此確立。

自李登輝領導「國統會」以來，國民黨就不斷討論如何在戡亂時期終止後對中共定位。但是，到四月三十日的記者招待會爲止，李登輝仍然還沒有對中共有任何定位的政策。雖然他表示，今後將視中共爲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並將稱中共爲大陸當局或中共當局；不過，這種做法與過去並沒有兩樣。

在國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獲得大多數國家承認的主權政府，這種客觀的事實，是沒有人能夠予以否認的。把中共稱爲「政治實體」或「大陸當局」，完全不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相反的，李登輝雖然重申「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但是這個國家在國際地理上並不存在的。把中共稱爲當局後，完全不能改變「中華民國」國際地位低落的事實。

那麼，稱呼中共爲「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究竟有什麼含義？一言以蔽之，這是李

登輝建立獨台體制的初步徵兆。李登輝既然公開表示，要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邀請中共的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台，或者他本人要以總統身分訪問中國，不就暗示這是國家元首對國家元首的互訪。這樣的暗示，等於是說台灣與中國之間是兩個國家。海峽兩岸是兩個國家的存在，是既存的事實。李登輝卻必須迂迴使用政治實體、大陸當局的字眼來表達。獨台體制的痛苦，獨台體制的逃避現實，由此就可見一斑了。

一九九一·四·卅 聖荷西

## 李登輝的獨台體制

## 後戡亂時期很像陳儀時代

### 蔣渭川的化身

李登輝在四月三十日於台北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時，郝柏村正派遣陳長文在北京與中共談判。這種情況，使人不能不想起一九四七年的陳儀時代。

陳儀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頗知自己闖下大禍，不能收拾整個亂局。他需要南京政府派兵來鎮壓全民起義的事件，但是在時間上似乎又來不及。因此，陳儀必須想辦法爭取時間，以防止事件繼續擴大。在最危急的時機，陳儀終於邀請台灣士紳蔣渭川出來廣播，以安撫民心。蔣渭川是台灣抗日領導者蔣渭水的胞弟，在戰後初期，頗孚人望。在群眾紛紛起來反抗國民黨之際，蔣渭川在廣播電台的喊話，果然使許多不滿的人士暫時緩遲他們的行動。

蔣渭川是一位善良的台灣知識分子，他根本不知陳儀玩弄兩面手法，每天照例到廣播電

台傳達陳儀的指示。陳儀在必要時就接見蔣渭川，對他稱讚有加，並且還深表感激。然而，他背後早已拍電給南京政府，請求蔣介石儘速派兵來台。陳儀早已知道蔣介石已經答應，不久就有軍隊抵台。

然而，陳儀也透過蔣渭川的傳達，容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立，同時也派遣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參加會議，討論政治改革的事宜，彷彿台灣就要進入民主改革的時期。蔣渭川也向民衆保證，陳儀是具有改革誠意的；他強調，這位行長官絕對不會欺騙他。

在蔣渭川的保證，加上陳儀的誠意之下，台灣人終於提出了四十二條政治改革要求。就在改革方案提出之後，蔣介石的軍隊也適時到達台灣。一場慘絕人寰的全島性屠殺，於焉展開。台灣人的改革之夢，立刻在一夜之間變成了歷史的噩夢。這種慘痛的歷史教訓，台灣人是不能須臾忘記的。

現在，台灣又見到了所謂「憲政改革」的到來。李登輝已不止一次在電視上發表演說，保證國民黨有憲政改革的誠意。在四月三十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李登輝也代表國民黨向台灣人承諾，「把戒嚴令停止，就是給我們自由化的一個方向」。對於海基會的訪問北京，李登輝也向台灣人民保證，「海基會這次到大陸，完全是拜會的」。然而，李登輝對於憲政改革與兩岸關係的問題，並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

### 陳儀的幽靈不散

不能不注意的一個事實是，陳長文領導的海基會訪問團到達北京時，李登輝還沒有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這個事實證明，李登輝有沒有為中共定位，與海基會的北京之行毫無任何關係。陳長文所代表的，畢竟是行政院的郝柏村，而不是總統府的李登輝。

這種情況，實在太像二二八事件的時期了。如果李登輝扮演的是蔣渭川的角色，那麼郝柏村就是表演陳儀的角色。從前的南京政府，就是今天的北京政府。至於從台北拍電文到南京的事實，恰恰就是海基會到北京傳達信息的翻版。

李登輝在電視上看來是那麼善良，他的演講循循善誘，實在像極蔣渭川的廣播。郝柏村的容貌與談吐，都類似陳儀的風格。然則，在台灣宣稱中共是敵對團體的，正是郝柏村；派人到北京去談判的，也是郝柏村。這種兩面手法，不就是當年陳儀的所作所為嗎？

凡有關憲政改革的事，都由李登輝來傳達。這就像一九四七年的政治改革方案，也是由蔣渭川來宣示。陳儀完全負責與南京政府聯絡，今天的郝柏村則全權負責與北京政府傳達消息。何況，陳儀以行政長官的身分統籌黨、政、軍事宜；現在的郝柏村，也恰恰以行政院長的官銜領導黨、政、軍。

歷史會不會重演，沒有人能夠預測。對於罪犯，尚且要考察其前科；那麼對於政治共犯，我們更不能不注意歷史上的前車之鑑。李登輝在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台灣的空氣並沒有變好，交通秩序也沒有改善，政治局面更沒有開放，至於國際地位也就更不值得一提了。進入了後戡亂時期，台灣社會反而回到了陳儀的時代。

郝柏村的代表正在北京談判，隨時要武力侵犯台灣的北京政府，究竟會開出怎樣的條件，台灣人民沒有人敢於想像。要避免歷史的夢魘，台灣人民不能只是相信國民黨的誠意；反對運動的領導者應該更能團結，應該更能凝聚人民的智慧與力量，跨越這段危疑的時期。

一九九一·五·二

聖荷西

## 戡亂時期開始對內實施

——冷眼看「獨立台灣會」之破獲

老當益壯的戡亂法令

四位台灣青年被控以參加「獨立台灣會」的地下組織，於五月九日遭到調查局的拘押偵查。這次凌晨的逮捕行動，距離一九四八年動員戡亂時期的實施已有四十三年，距離宣佈戡亂時期的終止僅及八天。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裏，無論戡亂時期是開始還是結束，台灣社會之停留於白色恐怖的階段，是從來沒有改變的。國民黨老賊在陽明山上召開的國大臨時會，使所有的戡亂法令延年益壽，果然發生了效果。

李登輝在五月一日宣佈終止戡亂時期之後，台灣的一些輿論都表示這是「歷史性」的轉變，是台灣「憲政時代」的來臨。不僅如此，國民黨還派人親赴北京，向一度被視為「叛亂團體」的中共，要求承認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雙方還達成共識，決定加強交流，消除敵

意。

然而，就在與「叛亂團體」消除敵意之際，國民黨卻開始在台灣社會內部製造敵意。四位三十歲上下的台灣青年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都曾分別參加過學生運動、環保運動與人權運動；這次反而以參加「叛亂團體」地下組織的罪名被捕。

這四位年輕的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典型的在戡亂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長期接受戡亂時代的國民黨體制教育，也長期接受國民黨中華民族主義的灌輸。在全部的生命裏，他們從沒有經驗過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今天國民黨逮捕他們，證明台灣教育所施行的那一套思想與價值，根本是與年輕一代脫節的；同時，也證明國民黨宣稱要回歸憲政，根本就是虛偽的。

戡亂法令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為中共的存在；國民黨既然已承認中共對中國的統治權，並且取消「叛亂團體」的稱呼，則戡亂的理由等於於是事實上消失了。國民黨堅持在戡亂時期終止後繼續使用戡亂法令，意圖是很明白的，它完全是用來對付台灣島上的住民。四位台灣青年的被捕，恰恰可以說明這種戡亂法令的惡用與濫用。

### 台灣青年是假想敵

以青年學生做為後戡亂時期的開刀對象，而且還以極為牽強的理由嫁罪於他們，絕對不可能重建國民黨的統治威信。自國大臨時會召開以來，已經殘破的國民黨尊嚴全然崩壞於國人之前。台灣學生的靜坐抗議，適足顯示年輕的一代再也不能接受國民黨的獨斷獨行。在過去實施動員戡亂的時期，國民黨獲得了統治的絕對優勢。一個有前瞻性的政權，如果銳意進行憲政改革的話，一定會利用這樣的優勢矯正長期累積下來的弊病。但是，國民黨並不作此圖，反而千方百計讓世人詬病的戡亂體制繼續延長下去。

台灣學生正是反對這種違逆民主潮流的統治方式，所以他們才勇敢挺身出來，以最和平的絕食行動表示最大的抗議。面對學生的抗議，國民黨應該亟思有所更張才對，竟然刻意在已經鑄成的錯誤之上再製造另一錯誤。使用參加「獨立台灣會」地下組織的罪名，對純潔學生戴上「叛亂」的帽子，絕對是倒退的做法。

「獨立台灣會」的領導者史明，在台灣知識分子之間已不是陌生的名字。他撰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在台灣翻印流傳甚廣。史明的史觀在知識青年所產生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無遠弗屆的。國民黨以四十餘年的教育心血，對台灣學生進行封閉式的灌輸，其影響力居



然抵不過史明的一冊史書。台灣教育的破產，於此又得到一個證明。

偵破這次政治案件的調查局人員說，陳正然等人積極在台發展組織，對國內治安已構成嚴重威脅。但是，所謂嚴重威脅是什麼？調查局說，他們發現很多學生運動介入的資料。根據他們的推理，這個組織極有可能在製造學運，造成政治動亂，達成顛覆政府的不法陰謀。非常清楚的，調查局的行動純粹是針對日益蓬勃的學生運動而下手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逮捕四名青年，並不能遏止學生運動的繼續發展。從這次濫捕的事件來看，台灣學生必更覺悟到要強化運動的組織與規模。倘然他們坐視自己的同學被捕，則下一次的受害者必將輪到他們了。

台灣獨立的主張，在台灣社會裏已是普受認同的思想。思想的問題，並不能以政治方法來解決。倘然延長使用戡亂法令，是爲了針對台灣的異議人士與團體，可以預見的，後戡亂時期的台灣社會將更趨於緊張、動亂。製造這種緊張動亂的，正好就是國民黨本身。台灣的青年知識分子，可能必須通過這場嚴酷的考驗，才有可能迎接明天的台灣。國民黨的逮捕令，正是最大的棒喝。

一九九一·五·十 聖荷西

## 打破落伍的眷區意識

——海外省籍國民黨員的結盟運動

## 第二輯·省籍意識的糾葛



從聯盟到聯誼的行動，無疑是外省籍國民黨員的聯合陣線。在下屆國民黨主席的爭奪戰中，這股力量是不可忽視的。

這些聯盟的成員，都以促成黨內民主做為號召。例如國民黨前秘書長關中，就在聯誼會上主張「應該推動黨內民主化，不要怕競爭、挑戰」。在過去四十年裡，國民黨內部的外省籍黨員當家時，從未聞有台籍黨員爭取黨內民主化。如今，李登輝控制了黨中央之後，竟然傳出民主化的呼聲，這是宗派化還是民主化，已是不言而喻。

他們對黨中央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李登輝承諾召開國是會議之後，他們發現依賴國民黨力量來左右台灣社會的時期就要過去了。國是會議召開的意義，便是跨越黨的界線而尋求社會的力量來解決政治問題。如果把現在的政治問題侷限在國民黨內解決的話，絕對不能獲得答案。李登輝之所以不得不避開黨內運作而直接與台灣社會結合，是因為他知道國民黨的權力結構與派系智慧已趕不上整個求變的要求。四十年來台灣民主化遭到的最大的障礙，乃是由於國民黨壟斷了最大資源，而國民黨內部的壟斷者，又是以外省籍高幹為中心。這種壟斷結構，自然使李登輝無法進行任何有效的政治改革。他要做的話，就不能不跨出黨的藩籬。

外省籍黨員當然瞭解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他們不可能再透過對黨的操縱而達到攫取台灣社會資源的目的。他們在這個關鍵時刻提出黨內民主化的要求，便是要瓜分李登輝的權力，

以便繼續掌握黨內的控制權。聯盟行動的出現，可以視為外省籍黨員的一種自保運動。

### 黨內整合不如社會整合

愛盟的領導者之一郁慕明，談到他們留在國民黨的原因說：「國民黨內還有這麼多資源，我們還沒有笨到不去好好利用。」這說明了今天他們結盟的理由，仍然是基於資源控制的考慮。

不過，國民黨的資源，原就來自台灣社會。從前國民黨取得台灣社會資源的方式，乃是透過不民主的手段。倘若要繼續使用老舊的手法來取得資源，必將遭到社會的強烈抵抗。李登輝被迫把門打開，而尋求國民黨以外的智慧謀求問題的解決之道，因為他非常清楚過去的方式是錯誤的，不得人心的。

外省籍黨員並不做如此想，他們反而把門關起來，進一步在黨內築起城堡。更令人擔憂的是，他們的結合是以省籍界線做為劃分的標準。當整個社會開始打破省籍建立和解、諒解的境界之際，他們為了政治利益而不惜重建省籍意識。這種做法，是過去四十年來眷區意識的殘存，對於社會的進步和諧並沒有正面的意義。

這種眷區意識發展到極端之後，就會出現一些異常的動作。結盟的外省籍黨員，據說將在最近化整為零，前往中國去了解實況。部分黨員認為，中國現在仍保有中國國民黨的組織，

「由一些老國民黨員負責，定期開會，有時也會討論如何促進改革等議題」。因此，部分國民黨十三全代表要與這些留在中國的老黨員接觸，做為日後「重返大陸」的參考。

對於中國政局稍有認識者都知道，留在北京的中國國民黨組織，其實就是指被容納在政協裡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這是中共統戰的樣版，是執行北京對台政策的御用工具。他們何嘗有過討論如何促進改革？他們何嘗能夠為「重返大陸」提供參考？國民黨員若要重返大陸，結局就像他們那樣變成中共的零件。

以省籍界線做為結盟的基礎，最後就註定要與台灣社會脫節。今天台灣社會要求改革，主要是因為國民黨獨佔過多的權力和利益。要避免政治衝突昇高，就應該慎重考慮如何把國民黨所獨佔的利益重新分配給社會。現在這些外省第二代不僅相互結盟，準備要「好好利用」黨內資源，以保護既得利益，而且還跨海與中共的御用組織掛鉤。台灣社會就這樣被置放在次要的地位。

現在是一個追求和解的時代，落伍的省籍意識與眷區意識，已經遭到全民的唾棄。國民黨內部要做如何的權力爭奪戰，非外人所能置詞。但如果因權力鬥爭又要勾起省籍裂痕，甚至還要與北京統戰者掛鉤，台灣人民是不會原諒的。外省高幹應考慮如何與台灣社會整合，這是紓解內部矛盾的唯一出路。重蹈歷史覆轍，一定失去更多。

一九九〇·六·五 聖荷西

## 這是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

### ——論大法官會議對限期退職的解釋

無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六月廿一日發佈了一份「釋字第二六一號解釋」的歷史文件，規定所有資深代表必須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卅一日之前終止行使職權。這是一份早已遲到的解釋，根據這份文件，國民黨終於不能不承認，「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這證明了萬年國會的存在，是沒有任何正義基礎的，它違背民意、偏離憲政長達四十年，為人類歷史留下可恥醜陋的一頁。

大司法官會議在這個時候發佈新解釋案，顯然是基於客觀形勢的要求。第一，資深代表的存在價值已經喪失了，特別是在今年的總統選舉之後，他們再也沒有剩餘價值可資利用了。一九九二年將是台灣的大選年，他們若不退職，國民黨恐怕有淪為在野黨之虞。第二，李登

輝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承諾要完成憲政改革。萬年國會是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礙，李登輝不能既要維新，又要守舊。除去萬年國會的障礙，是他的義務。尤其在國是會議即將召開前夕，國民黨必須表現改革的誠意。大法官會議的解釋，無疑是爲了配合這項政治日程表。第三，最重要的，台灣社會對改革緩慢的不滿，已經到達了飽和點，台灣究竟是要走向暴力革命或和平改革，端賴國民黨的抉擇了。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也在新解釋案公佈的同一天，進行修改已經立法的「自願退職條例」，將原案自願精神，改爲強迫退職之意，訂定了如下的規定：「於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前未申請退職者，視同自願退職。」這是司法院與立法院之間，達成了一次罕見的歷史性合作。經過這樣立法之後，所有資深代表都將在明年年底之前退職，萬年國會的邪惡存在，就要成爲一個歷史名詞。

對於台灣社會而言，這項退職的解釋還是相當寬容的。民進黨所要求的是，今年年底全部的資深代表都必須退光。民進黨會提出這樣的要求，乃是根據最直接的民意反映。因此，到明年年底之前，資深代表如果還存有僥倖之心，如果還有抗拒的行動，恐怕不能見容於台灣社會。政治衝突之升高，當可預卜。

### 政治改革尚未開始

事實上，國民黨發表兩年三階段的退職方案之後，一些資深代表已開始出現拒退的動作。最爲顯著者，當推立法院長梁肅戎。他以立法院內的台獨氣燄高漲爲理由，有意抗拒退職。這種顛頂心態，正是資深代表的反民主作風。倘若立法院的增額立委主張任何台獨言論的話，那正是民意的反映。這些年輕的立委是有選票的，是有代表性的。梁肅戎的選票在那裏？民意基礎又在那裏？

梁肅戎與增額立委陳水扁辯論，竟然還說資深代表是「代表各省籍來監督政府，現在大家已經很收斂，只有消極的舉舉手，在重大政策需要變動時，這些人還是有作用的」。梁肅戎所謂的「消極的舉舉手」，似乎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他們的表決卻決定了台灣社會的政治人權與經濟人權。台灣人民的命運，就是在他們如此舉手投足之間被決定了。

這次大法官會議的新解釋，是十年前、二十年前應該做而沒有做的工作。今天終於提出了這樣的解釋，不知已犧牲了多少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梁肅戎認爲在做重大政策變動時，他們資深代表還是「有作用的」。他的這種態度，台灣人民從來沒有懷疑過。當他們宣稱要戡亂、要反共時，資深代表是多麼理直氣壯。他們舉手表決的立法，他們可以不必遵守，而台

灣人民竟然馴服遵守了四十年。如今，梁肅戎卻突然又主張要與「叛亂團體」的中共進行「黨對黨」的談判，台灣人民四十年來，以人權犧牲所建立起來的守法精神，等於全盤皆錯。

梁肅戎領導下的萬年國會，是一個充滿了貪慾與罪惡的集團。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對這個為人類歷史製造可恥紀錄的機構，無疑是相當寬容的了。然而，台灣社會經歷過這樣的政治浩劫之後，要到何時才能恢復元氣，現在仍難預見。在獲得這樣的解釋之前，台灣人民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是不容忽視的。如果這四十年來，台灣如果還有一些憲政基礎的話，那是以無數的生命與血汗換取而來的。

萬年代表退職，並不表示政治改革已經開始了，這還只是準備工作而已。當國民黨內部的既得利益者，仍然如萬年代表那樣討價還價，政治改革的前景還是很黯淡的。不能有這樣一紙解釋，就以爲可以走向新境界。台灣人要走的路途仍然遙遠，要克服的困難仍然繁多。

萬年代表退出歷史舞台時，新時代的布幕尚未揭起。

一九九〇·六·廿一

聖荷西

## 令人寒心的中國熱情

——評侯德健的海峽往來

### 台灣意識論戰的導火線

民歌作曲家侯德健的回到台灣，具有文化意義，也具有政治意義。侯德健本人在海峽的去來並不重要，他背後所代表的時代問題才是值得注意的。一九八三年他離家出走時，曾經引發黨外陣營內部「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論戰。這場牽涉到統獨問題的意識論戰，持續了將近三、四年之久。主張台灣自決與台灣獨立的民主運動，隨著論戰的展開而日益蓬勃崛起；相對的，島內的統派運動則隨著論戰的退潮而漸趨沒落。

這次侯德健在台灣突然出現，顯然已爲他當年點燃的戰火譜下最後一個句點。侯德健個人的行動，勝過辯論中的千言萬語。空洞抽象的〈龍的傳人〉一曲，也抵不過侯德健本人所體驗的挫敗與困頓。中華民族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侯德健當然比任何統派分子還更清楚。

國民黨企圖利用〈龍的傳人〉來販賣民族主義，也就更加零落不堪了。

如果必須要前往中國，才能證明自己是中國人，那麼侯德健並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在他之前，有許多爲了證明自己是中國人的政治人物，也曾懷抱巨大夢想前往中國定居。陳若曦、陳逸松、黃順興等人，是最早對中國帶有浪漫情懷的人士，他們最後都宣告幻滅了。如果說中國之夢終究是要驚醒的，那麼侯德健也將不是最後一位嚐到這種滋味的人。

侯德健的中國熱情，孕育於國民黨的民族教育體制裏。他從文字上所得到長江、黃河的概念，只是一種地理名詞，與真正的現實並不是契合的。在台灣被教育出來的知識青年，似乎很難理解所謂的長江、黃河，並不僅僅是壯麗山河而已；在其背後隱藏多少中國人民的苦難與血淚，台灣書生是無法領會的。他們從來沒有理解到，擁抱中國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侯德健千里迢迢去探訪古老中國，以爲中國的景物、風情能夠帶給他創作的靈感，以爲離開台灣就可以投入一片遼寬的天地。侯德健到達中國後，殘酷的現實立即使他的熱情冷卻了。

### 傳人傳人你快長大

在七年前，侯德健爲了解決他個人的問題，選擇了前往中國。七年後，他也是爲了解決個人的問題而回到台灣。所謂中國感情，虛構的成分居多。這次回到台灣，侯德健宣稱他是

被中共遣送回台的，但是台灣警方卻認爲他是偷渡回台的。無論是遣送或是偷渡，有一個事實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侯德健所說的，他不能不回到台灣。

侯德健是不是民運人士，當值得懷疑。民主運動是長期的工作，不是臨時插花；民主運動是堅決站在人民的立場，而不是爲統治者塗搽脂粉；民主運動是勇於承擔責任，而不是諉罪於人。從這些標準來看，侯德健從來就沒有參加過民主運動。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他也非常懂得保護自己。在北京電視上，他爲中共統治者說話；在這次偷渡時，他不惜對協助他登陸的漁船落井下石。做爲民主運動者的一個最基本道義，侯德健完全沒有盡到。在他的眼裏，根本沒有人民地位的存在。這樣的中國人，這樣的民運人士，是沒有人看得起的。

回到台灣後，侯德健仍然聲稱他將再回到北京。台灣只不過是他暫時借住的空間。事實上，沒有人要求他必須成爲烈士，沒有人要求他變成勇者。不過，侯德健也無需把自己描繪成充滿理想、充滿壯志的創作者。藝術並沒有那麼偉大，脫離現實的、背叛人民的藝術，只不過是一種自我褻瀆罷了。華麗的音樂與絕美的詞藻，若不能與創作者的言行符合，那只是一種虛偽的、矯情的藝術。

可笑的是，國民黨竟然利用侯德健的被「遣送」，當做一種反共的政治宣傳。馬英九說，中共這種放逐政治異議人士的做法，只有蘇俄做得出來。馬英九顯然有意轉移國民黨的責任。在這個地球上，對異議人士的迫害、凌辱、驅逐，還沒有一個國家做得像國民黨那樣殘忍、

那樣絕情的。許信良、陳婉真的被強迫離境的故事，不知馬英九聽過沒有？海外有多少黑名單人士被拒絕返鄉，不知馬英九遺忘了沒有？以中共的錯誤，來推卸國民黨在台灣應該負起的責任，正是國民黨一貫的手法。

這次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的成員陳昭南回到台灣，立即受到國民黨的刁難、拘捕、污辱。陳昭南不諱言他在海外的政治活動，他明知被通緝，仍然回到台灣。這種勇於負責的態度，是民主運動者的基本要求。國民黨要侮辱的，便是這種勇者；極力推崇的，則是像侯德健那樣自我保護者。侯德健的回到台灣，是一個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他的中國熱情，只不過令人寒心。所有以龍的傳人自居的青年，應該以侯德健為鑑。中國不能使人長大，要長大，只有依賴自己。

一九九〇·六·廿六 聖荷西

## 只有國籍問題， 沒有省籍問題

### 「台灣人」突獲承認

利用省籍區別政策，對台灣本地人進行政治上、文化上的欺壓，是國民黨維護其既得利益的最佳方式。受到侮辱損害的台灣人，他們的母語權、歷史撰寫權、政治發言權早就被剝奪淨盡；在國民黨官方政策的精心規劃之下，「台灣人」一詞其實已經從歷史上拭去了。

然而，當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逐步昇高時，台灣人的地位突然在一夜之間獲得重視。在戰後官方史上消失了的「台灣人」，竟然受到無上的提昇。這兩天以來，一群以中國人自居的國民黨員，還義正辭嚴提出這樣的問題：「誰在出賣台灣人？」在政治上、文化上被出賣被遺忘的台灣人，受到這些替天行道的中國人的眷顧，是應該感激涕零的。

不是說沒有台灣人嗎？不是說「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嗎？如果有所謂出賣事實的話，那



麼被出賣的應該是中國人，爲什麼又輪到台灣人？以趙少康、郁慕明、李勝峰爲首的國民黨員，在國是會議結束以後，終於挑起省籍問題，對黨內展開前所未有的省籍戰爭。「台灣人」之成爲國民黨政爭的利器，於此又創了先例。

在國民黨統治下，台灣人經歷過漫長而無情的鞭笞；他們的語言、歷史、文學、思想、政治主張，從來就不能免於醜化、矮化的命運。在台灣人陷於無聲、無助之際，新國民黨聯線的中國人，何嘗爲台灣人仗義直言過？何嘗放下身段與台灣人站在同樣的立場？但是，在台灣面臨國家改造的今天，省籍界線又重新被刻劃出來，被出賣了千百次的台灣人又獲得國民黨中國人的關切，這不是很離奇的政治現象嗎？

自三月台灣總統選舉之後，以外省籍政治人物爲中心的國民黨員，就明目張膽進行結盟的活動，從新國民黨聯線、歸友會、反共愛國聯盟，一直到最近宣告成立的所謂民主基金會，都不斷在上層的權力結構中進行政治利益的結合。在這些結盟的過程中，有誰是真正爲台灣人說話？又有那一個團體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又有那一位領導者針對憲政改革提出具體的方案？

### 國家認同必須確立

這批以中國人自居的政客，一方面對台灣獨立的主張惡意抨擊，宣稱今天台灣人的多數，會變成明日中國人的少數，一方面則又擺出雍容大度的姿態，質問「誰在出賣台灣人」。這種利用台灣人來打擊台灣人的手法，本身就是出賣台灣人的行徑。

倘然新國民黨聯線認爲台灣人一詞可以成立的話，就應該好好重新認識台灣的語言、歷史、文化，就應該虛心向台灣人學習求教。到全島各地進行問政說明會，散佈一些粗暴傲慢的理念，其目的只不過要吸收台灣人的資源，以遂其黨內鬥爭的野心。在台灣這一片土地上，從來沒有出現這樣醜陋的中國人。

不管是國民黨的主流派也好，或是非主流派也好，避開台灣的歷史命運不談，避開台灣的政治前途不談，就沒有資格提出「誰在出賣台灣人」的問題。台灣社會演變到今天這樣混亂而腐爛的局面，國民黨必須承擔最大的責任，做爲統治共犯的新國民黨聯線成員，豈能逃避人民的譴責？

台灣社會很早就已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無論是早期移民或是戰後的晚期移民，生活在偏頗畸型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已經融合成爲一個新的台灣人族群。他們之間容或有不同的經

濟內容與階級屬性，但是，在中共的軍事威脅下，在國民黨的政治迫害下，其實已分擔了共同的命運。因此，台灣社會內部的省籍界線，已在共同掙扎奮鬥的過程中日益模糊消失。

在現階段，台灣社會只有國家認同的問題，何曾有省籍問題。認同台灣社會，就是台灣人；認同被統治者的立場，就是台灣人。如何在台灣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有民意基礎的憲政體制，建立一個有國際人格的民主政府，是當前迫切的課題。仍然停留在五〇年代、六〇年代的時期，刻意挑撥省籍傷痕，必將使新國民黨聯線的中國人遭到唾棄。

新國民黨聯線，絕對不屬於台灣的命運共同體，而是屬於上層結構的統治共犯體。以「明日中國人的少數」的語言來恐嚇台灣社會，正好暴露他們虛偽的台灣人立場。不談台灣、不談國籍、不談民主，就是少數；既是少數，鐵定就要沒落。

一九九〇·七·十八 台北

## 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

### ——聞國民黨擬議召開三中全会

#### 李登輝的「二獨」

明年六月以前，國民黨的三中全会就要召開。這項會議之所以值得注意，乃在於國民黨內部的權力再分配至今還塵埃未定，三中全会將是黨內各派系的角逐戰場。在這場會議中，誰獲選了黨主席，誰就掌握今後國民黨的領導權。因此，在會議到來之前，各個派系之忙於佈局，自是可以想像。

現任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在今年三月的權力鬥爭聲中當選總統之後，就成為衆矢之的。尤其在任命行政院長郝柏村時，得罪了李煥系統的既得利益者。黨內外所有受過李煥提拔的黨政人員，無不懷恨在心。新國民黨聯線的趙少康、李勝峰，反共愛國聯盟的陳義揚、郁慕明，民主基金會的關中，展望基金會的李慶華，以及潛伏在民進黨內部的朱高正，都紛紛揭

竿而起，對以李登輝為首的黨中央展開徹底的、無情的攻擊。他們的旗幟鮮明，都以「反對個人獨裁，建立黨內民主」的立場自命。

在黨內派系與下游團體的抨擊下，李登輝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罪名。他不僅遭到「獨裁」的指控，並且也被抨擊為「獨台」的推行者。這「二獨」的罪名，迫使李登輝必須採取對策。為了洗刷獨裁的嫌疑，李登輝在日前與十二位反共愛國聯盟成員餐敘時，表示未來票選黨主席乃是必然的趨勢。為了沖淡獨台的色彩，李登輝決定在總統府裏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做為國民黨大陸政策的諮詢機構。在國民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黨主席做得如此辛苦，又做得窮於應付。

李登輝以「不戀棧黨主席」的承諾，來換取敵對者的信任，又以「國家統一」的號召來掩護他的獨台政策。這些因應措施，都足以顯示李登輝處境之尷尬。不過，即使李登輝做了姿態上的讓步，也不可能消弭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因為權力不能在握，就不可能保有既得的利益。明年三中全會召開時，反李登輝陣線的各派系人馬，必定會繼續針對「二獨」的指控昇高攻擊。

### 偽民主意識

所謂獨裁與獨台的罪名，只是非主流派為了師出有名而炮製出來的。國民黨的內部獨裁，

原就是其建黨精神的重要傳統。從蔣介石、蔣經國以降，黨內決策自來就聽命於黨魁的指揮。李登輝如果有獨裁傾向的話，那也只是國民黨傳統的延續。

今天，非主流派的黨政高幹與公職人員，能夠獲得特殊的地位，無非是拜賜了國民黨的獨裁政策。沒有蔣家的獨裁，會有今天的李煥嗎？沒有黨內的獨裁，會有今天的趙少康嗎？蔣家參養出來的奴才非常清楚，李登輝上台後如果真正實施黨內民主的話，利益絕對不會繼續落在他們身上，而會轉移到佔黨員多數的台籍人士。在國民黨內，外省籍黨員是少數，為什麼他們能長期佔有發言權，為什麼能在中央委員裏盤據那麼多席位？這種不公平的現象，理應由台灣籍黨員出來呼籲實施黨內民主，應該倡議外省籍黨員必須交出權力。

然而，情況卻恰恰相反，在國民黨裏面高喊黨內民主的，竟然是佔少數的外省籍黨員。這種離奇的現象，更加可以證明國民黨的獨裁傳統是多麼根深蒂固。他們指控李登輝是獨裁，便是企圖把他從主席的位子拉下來。倘然有朝一日李煥能夠復辟，或是其他非主流派人士出任黨魁，獨裁的傳統必將更加鞏固。到那時候，趙少康等人必將恬然不知「黨內民主」之為何物了。

同樣的，李登輝被指為「獨台」的魁首，也只是政爭中的攻擊手法而已。放眼今天國民黨內部，無論是主流派或非主流派，有誰不是因獨台政策的實施而獲得今天的統治地位？沒有台灣的利益，豈有今天的國民黨？今天李登輝、郝柏村所走的獨台路線，其實早就從蔣家

時代長期累積下來的。所謂「國家統一」，完全是拿來做爲保護統治利益的擋箭牌而已。「國家統一」的口號演變到今天，再也不只是鎮壓台灣社會的口實，並且也是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了。

在明年三中全会召開以前，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之激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只有等到領導權決定以後，派系糾葛與權力角逐的發展才會告一段落。在整個政爭過程中，國民黨絕口不提如何落實台灣社會的全民主。對國民黨而言，黨內民主也好，黨外民主也好，都是不能實行的。任何涉及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必然會危害國民黨的現狀。李登輝清楚這個問題，李煥與非主流派也更清楚這個問題。

一九九〇·八·廿九 聖荷西

## 國民黨分裂的形式

### 分裂是一個定局

國民黨會不會分裂的問題，在最近已漸漸成爲熱門的政治議題。尤其是康寧祥在日前公開表示，國民黨在明年年底前分裂成兩個黨，這項談話更是引起廣泛的討論。在九月七日紀念雷震事件三十週年的研討會上，康寧祥的演講指出，國民黨將如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那樣，執政黨將分成兩個相互制衡的黨。他又說，現在的李登輝「很自然、很努力的把國民黨主流、非主流都分開了」。

康寧祥的看法，主要是根據國民黨近兩年來內部結構的變化而提出的。不過，康寧祥並沒有細部解析國民黨究竟會在什麼情況下分裂，也沒有指出國民黨會以什麼形式分裂。

國民黨基本上是一個分贓的政權，是一個酬庸式與恩寵式的政權。今天在李登輝政府據有

要津的高官高幹，都是因効忠蔣氏父子而得到統治地位的。李登輝、林洋港、郝柏村、李煥，以至宋楚瑜、關中、趙少康等人，都是依賴蔣家餘蔭而受到恩賞。蔣經國還未病逝以前，他們全部都聽命於強人的獨裁與指揮。

國民黨的裂痕，第一次出現於蔣經國病逝之後。這個裂痕的真正明朗化，則發生在今年二月的二中全會。這項大會，原是為了解決蔣經國死後還未解決的權力分配問題。李登輝的繼任總統與黨主席，絕對不是因為他德高望重，也絕對不是因為國民黨擁有健全的接班制度，而是因為他沒有班底。他的繼任，只不過是做為國民黨內部實力派系之間的一個緩衝而已。換句話說，李登輝只是臨時代理人的角色，並不是真正把權力交給他。李煥、林洋港、郝柏村等人沒有料到的是，李登輝本人竟然也有權力的慾望。在擔任兩年的總統與黨主席之後，李登輝終於拒絕交出權力。

今年總統選舉時的「起立派」與「票選派」，副總統人選的爭議，兩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相互抗衡，以至李煥後來拒絕辭掉行政院長，都顯示了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在權力分配上的激烈抗爭。到目前為止，國民黨仍然停留在權力角逐的階段。只要權力分配沒有明朗化，國民黨絕對不可能對政治改革有任何的興趣。

## 國民黨內部的分裂

### 可能會導致黨政分裂

在現階段，黨似乎由李登輝領導，政則是由郝柏村控制。但是，李登輝所控制的黨務系統，早已失去領導地位了。他掌握的黨鞭，對其黨員根本產生不了約束的作用。黨本身，目前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態。

一個新的形勢在最近開始出現，那就是原來屬於李煥黨羽的人馬，逐漸與郝柏村結合。李煥工於心計，但性格過於陰柔，是扶不起的阿斗，因此他的屬下都紛紛尋找新的主子。郝柏村是當初李登輝用來抵抗李煥的，如今李煥黨羽則開始利用郝柏村來壓制李登輝。尤其是郝柏村在最近提出「一個兩區」的構想之後，非主流派都公開表示支持，極盡阿諛之能事。事實上，李登輝的「一國兩府」與郝柏村的「一國兩區」，都屬於文字遊戲，全然不能解決台灣的問題。非主流派刻意支持郝柏村，只不過是為了解李登輝的威信。

李登輝現在為求自保，不得不在總統府設立一個「國家統一委員會」。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在九月十一日表示，總統會的設置將不會送交國民黨中常會討論，這說明了李登輝已有意以總統府為中心來建立他的據點。李登輝雖然擔任黨主席，但是在中常會裏的發言權遠遜於其他中常委。避開黨的牽制，李登輝反而能夠為所欲為。

李登輝在召開國是會議時，也是沒有尋求國民黨中常會的同意。這種模式，將改變以往國民黨「以黨領政」的傳統。只要李登輝繼續依此模式建立他的據點，則以後由誰來擔任黨主席都再也無法控制總統了。這樣演變下去，國民黨的分裂不僅會出現兩黨，甚至還有可能出現黨政分裂。

李登輝設立國統會，其目的絕對不是要追求「國家統一」，他透過這個機構，一方面可以表明政治立場，一方面則是希望結合台灣社會的力量，這是國是會議模式的翻版。在這次國統會的設置過程中，李登輝不斷與學者、民間人士接觸，甚至包括民進黨主席黃信介。這顯示了國民黨的黨系統本身並不是那麼重要了。

如果李登輝成功地建立自己的據點的話，他與郝柏村的關係就會進入敏感的階段。非主流派人士將以什麼方式與郝柏村結合，當值得觀察，因為這將決定李登輝與郝柏村的分合消長。總而言之，國民黨的分裂已成定局，現在只剩下時間問題而已。

一九九〇·九·十 聖荷西

## 道歉賠償不能洗刷罪名

### ——論江南命案的庭外和解

中華民國政府與崔蓉芝就江南事件達成了庭外和解，並沒有使這件轟動國際的命案塵埃落定。國民黨願意達成和解，主要是為了重塑其國際形象。只要江南案的訴訟繼續存在一天，中華民國政府與黑社會流氓結合的污名就難以清除。因此，這次庭外和解，並非表示江南命案已經水落石出。在這次和解中，形象的維護重於人權的恢復；一百四十五萬美元的所謂「人道賠償金」，完全不能洗刷中華民國政府的罪名。

江南命案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傷害可謂至深且鉅，它引起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衝突，也迫使蔣經國不能不以「解嚴」與「解除黨禁」來換取台灣人民對劊子手的注意。然而，受到損傷最大的，還是台灣人民的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問題。

如果江南沒有撰寫《蔣經國傳》，也沒有計劃要寫《吳國楨傳》，他可能不會受到國民黨遣人刺殺的結局。國民黨在事後宣稱江南是「三面間諜」的說詞，只不過是要合理化這種違反人性的瘋狂行動。江南命案發生後，國民黨從未對其遺孀崔蓉芝表示歉意，卻在台灣島內

一方面製造「十信案」的醜聞，一方面又展開對竹聯幫的掃蕩。前者是以更大的新聞來掩蓋命案，後者是要爲了封鎖消息走漏。從一九八四年十月事件發生到今天，未嘗聽見國民黨官方對崔蓉芝有絲毫致歉之舉。現在庭外和解，竟有「道義賠償」之說。這種遲來的道義，以金錢折算的道義，究竟還有什麼道義可言？

國民黨對作家的刺殺，對言論自由的威脅，到今天仍然存在著罪孽深重的陰影。只要這個陰影不能去除，則無論江南遺孀獲得多少賠償金，都不能使基本人權得到安全的保障。因爲江南命案中，涉及了中華民國政府的軍方情報局局長、副局長、副處長等高級人員。使他們能夠做出如此轟動國際的命案事件，全然是由於他們手中握有龐大的權力。沒有這樣的權力，就無法如此大規模動用人力。他們的權力來源既然是來自政府本身，則整個事件就不能單單視爲個人行爲，中華民國政府是沒有理由推卸責任的。

在命案發生六年後的今天，值得冷靜思考的，並非只是如何對待江南遺孀的問題，更不是如何維護國民黨形象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政府權力的濫用與愛國理念的誤用，這兩個嚴重問題不能得到合理解決，則更多的作家、更多的性命都還有可能繼續陪葬。

政府權力的濫用，表現在政府官員與黑社會流氓的密切結合。這種結合，是蔣介石在上海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國民黨傳統。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累積，國民黨與黑社會的相互過從，已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今天台灣社會出現了「國民黨統治白天，黑社會統治晚上」的現象，

是依照這個傳統發展下來的結果。郝柏村在最近宣稱要整治「社運流氓」，顯然必須要從政府內部優先做起。否則，劊子手的陰影將不只伸向作家而已，台灣社會的每一階層、每一角落將沒有任何安全感。

愛國理念的誤用，在於國民黨灌輸「愛國殺人無罪」的觀念。江南命案發生後，國民黨傳出兇手的行爲是愛國的，企圖減輕他們的罪責。這樣的說詞，在美麗島事件的時代也宣揚過。高舉愛國的旗幟，就可以爲所欲爲，僅發生於義和團的封建時代，但那是對入侵的外國人而言。現在這種義和團精神，卻用來對付哀哀無告的人民。

因此，今天看待江南命案的庭外和解，不能只停留在賠償金的層面，也不能只停留在國民黨如何賠償的問題之上。台灣社會所關心的，勿寧是中華民國政府如何真正做到尊重基本人權，如何使「個人行爲」不再陸續發生，如何使政府官員與黑社會流氓切斷關係。國民黨如果不能糾正這樣的歷史錯誤，則宣稱江南命案已經落幕也是無益的。

所謂道義賠償金還有道義存在的話，那也只是對江南遺孀個人而言，對於受制於黑社會威脅、受制於情報局控制的台灣人民而言，江南夢魘並沒有結束。國民黨能洗刷的，只是面子而已，至於它應承擔的罪名，絕對無可減輕絲毫。

# 人性·謊話·錄影帶

——梁肅戎的人格與風格

裸裡的立法院長

美國影片《性·謊話·錄影帶》，不久前才在台北放映過。這是一部探討性幻想與性現實的電影，徹底揭露人性的欺罔與脆弱。如今，台灣版的《性·謊話·錄影帶》則公然在國會殿堂裏上演。台灣版的「性」，無關乎色情，卻更能暴露人性的醜陋。劇本中的男主角，正是立法院長梁肅戎。他的自編自演，誠然是一部充滿諷刺嘲弄的官場現形記。

梁肅戎惹起的「敷衍兩句」風波之所以趨於複雜，在於他即使想承認錯誤，也已失去時效了。梁肅戎只好在錯誤的事實之上繼續製造錯誤，而終於走上了不歸路。無論他願不願意下台，他的名字在歷史上鐵定是永垂不朽了。

立法院長為行政院長護航，原是國民黨固有的傳統。梁肅戎繼承這樣優良的風俗習慣，



並不值得訝異。所以，十月十七日郝柏村上台接受質詢時，梁肅戎向他低語：「敷衍兩句就好了。」這種交頭接耳的景況，是相當尋常的事。在場記者聽見了，錄影帶也攝影下來了，報紙也刊登出來了。

民進黨立委謝長廷，認為這種語言損害了國會尊嚴，因此第二天要求梁肅戎道歉。對於這種事，梁肅戎只要說明一下，就可避開風波。問題就出在他「既要面子，又要裏子」，拒絕承認他說過那樣的話，反而指控報紙「造謠」，又指控謝長廷「有陰謀」。這是梁肅戎說謊的第一步。

謝長廷爲了澄清真象，遂召開記者招待會，並公佈錄影帶。梁肅戎指控謝長廷的錄影帶是「變造」的，同時又出示他自己剪接過的錄影帶。這是他說謊的第二步。國民黨立委王志雄爲了打圓場，提議成立專案小組調查，梁肅戎竟然利用混亂的會場逕行裁定表決，王志雄等人的提案調查終於被打消。至此，梁肅戎的謊話已完全沒有轉圜的餘地。

十一月六日爆發的確定議事錄風波，以及警察進場圍堵民進黨立委，都足以證明，即使沒有錄影帶，梁肅戎已經無法在謊話的問題上自我澄清。他已經需要軍系立委與警察的聲援，謊話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人證與物證反而變成多餘的了。相貌堂堂的立法院長，裸裎般坐在議會殿堂上，色相可謂露盡了。

### 敷衍的立法精神

立法院長的謊話風波，牽涉到整個立法精神的成敗。因爲，在立法院通過的任何法案，將成爲台灣社會兩千萬人民的生活準則。過去制定的無數法案，往往由於立法者的貪婪與欺瞞，使無辜百姓葬送無數的基本權益。國民黨同時經營行政、立法、司法，相互支援，又相互掩護，人民從來不能揭穿整個欺騙的結構。妨害台灣人權的「國安法」、「集遊法」，都是以犧牲人民利益爲前提而制定的。這些法律，往往都出自沒有民意基礎的資深代表之手。他們只要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則任何法案都可舉手表決通過。

梁肅戎是資深代表中的領導者，他的言行舉止正是整個國民黨的具體而微。長期以來，他們的立法大多是以敷衍搪塞的態度制定出來的。只要敷衍兩句，臨時條款就可出籠，戡亂體制就可建立。只要敷衍兩句，三民主義就可統一中國，中華民國就可重返大陸。這樣敷衍了四十年，台灣人民卻從來不知道如何揭穿真相。

這次梁肅戎被抓到的辮子，其實與四十年的謊話比較起來，還是微乎其微的。謝長廷緊咬梁肅戎不放，目標絕對不是在梁肅戎本人，而是在整個欺罔的體制。梁肅戎奮不顧身抵抗下去，恰如其份反映了國民黨掙扎的尷尬景象。

梁肅戎指控謝長廷「有陰謀」，這並不正確。謝長廷做的是陽謀，並不是陰謀。他就是要從梁肅戎的例子，來反映國民黨官場的現實。在這場「人性·謊話·錄影帶」的劇本中，謝長廷只不過是從旁協助而已。梁肅戎的罪狀，都在他的自我表演中，主動向台灣人民招供了。國民黨立委集體掩護梁肅戎的行爲，反而使鑄成的錯誤投射出更大的陰影。

不要說警察拯救不了梁肅戎，即使是上帝也無法拯救他。這種事情若是發生在日本，就必須切腹自殺；若是發生在美國，就必須引咎辭職。唯獨中華民國的國情，至大至剛，梁肅戎依然可以敷衍苟且下去。他這樣做是對的，只有如此蠻幹下去，才能應驗朱高正所說的：「把國民黨葬送掉！」從此立法院通過怎樣的法案，人民都不會瞧得起了。梁肅戎的人格與風格，將牢牢寫在歷史圓柱上。

一九九〇·十一·七 聖荷西

## 學術面具下的權力追求

——「民主基金會」對國民黨的衝擊

另有所圖的基金會

代表國民黨非主流派勢力的「民主基金會」，在關中的籌劃主導之下，於十一月十日正式成立。這個以外省籍國民黨員爲主體，以反對台獨爲訴求的政團，在成立之後，將使已經明朗的黨內省籍裂痕更加深刻化。「民主基金會」的誕生，證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並沒有結束；相反的，它正好預告了更爲細緻的權力角逐即將到來。

在爭取黨內民主的口號之下，「民主基金會」顯然不是黨鞭可以控制的了。因爲，任何阻撓、勸告的舉動，都有可能被反控爲「獨裁」或「反民主」。如果連身爲黨主席的李登輝都不敢對這個政團發出任何議論的話，這更可反映國民黨的紀律已經完全瓦解了。李登輝在十一月九日接見關中時，特別提到「黨的團結」很重要，也提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並且希望

「民主基金會」能夠為黨所用。這種談話都只是點到為止，然而，話中卻含有欲言又止的苦衷。

關中對外表示，成立基金會的理念是「反台獨」，是「民主、統一、保台灣、救中國」。如果這就是「民主基金會」的基調，這等於是把國民黨本身貶損下去了。四十年來在台灣統治的國民黨，一向不就是強調「反台獨」與主張「中國統一」嗎？近兩年來，國民黨對台獨運動者的誣告、逮捕與判刑，其激烈程度是歷年所僅見。國民黨對「中國統一」的頑固態度，也在這一年無限升高。姑且不談強硬派的郝柏村，即使溫馴如李登輝者，尚且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來突出中國統一的立場。事實顯示，國民黨的黨務系統與行政系統早就在實行關中的政治理念了。

關中在黨外面成立一個基金會，揭示的理念可以說與國民黨完全沒有兩樣。這證明了基金會的「反台獨」與「統一中國」，絕對不是它另起爐灶的主要理由。倘若國民黨大量逮捕台獨人士，並努力宣揚統一中國的主張，還不能使關中稱心如意的話，「民主基金會」成立的目的顯然另有所圖。

在未來一、兩年內，資深代表被迫退職之後，國民黨的外省籍黨員在黨內的發言權將會大大減低。因為，資深代表都是以外省籍人士為骨幹。他們退職之後，必將讓出大量的權力空間。關中籌組的「民主基金會」，就是為了填補這樣的真空而成立的。

### 「我們」與「他們」的對立

「民主基金會」強調反台獨與統一中國，其對象並不是台灣社會，而是國民黨內部。以外省籍為中心的國民黨員，對台籍的李登輝充滿了不信任。關中接受記者訪問時，態度是相當倨傲的。他說：「如果我真的計較起來，他們擔得起嗎？」他口中的「他們」，是指李登輝而言。從關中的談話，就可探測其內心的不滿。他提到李登輝之所以能夠順利當選主席，乃是由於「李煥以及許多大老、先進全力支持」。關中把自己歸於「我們」的陣營，就清楚表示他是李煥派系的人馬。

在「我們」李煥派系與「他們」李登輝派系之間，已經不可能有團結和諧的機會了。從二月政爭的風潮至今，李煥欲振乏力，終於不能不由第二代外省籍出來代打。「新國民黨連線」先在島內打省籍戰爭，以「誰在出賣台灣人」的旗幟聲討李登輝；繼而又由海外國民黨員高舉「興中會」的名義，對李登輝的獨台路線進行抨擊。「民主基金會」的誕生，便是這種前仆後繼的風潮中湧起的另一波戰爭。

如果關中執意要繼續鼓動風潮的話，李登輝絕對是承擔不起的。過去十餘年來，關中在李煥的培植之下，其力量已貫穿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黨務系統。今天許多所謂的民意代表，

有那一個不是經過李、關二人的提拔與提名。相形之下，李登輝絕對無可比擬。佔多數的台灣籍國民黨員，他們所得的恩寵並不是來自李登輝，而是來自外省籍的高級黨官。關中敢於擺出傲人的姿態，便是擁有這樣的歷史背景。在關中眼裏，甚至是李登輝也是「我們」支持的。言下之意，李登輝沒有順從李煥派系的意旨，那等於是過河拆橋，等於是公然背叛。

國民黨內部「我們」與「他們」的分裂，是無可挽回的。這樣的分裂，並不一定要離開國民黨；利用黨的名義反而可以控制或爭取社會資源，比起離開黨還更容易辦事。現在關中以「民主」的名義成立基金會，以「學術」的面具追逐權力，正是國民黨四十年來在台灣社會統治模式的翻版。關中對這種手法是相當熟悉的，李登輝派系若想急起直追，恐怕還必須向「民主基金會」學習。

一九九〇·十一·九 聖荷西

## 「民意調查」的時代已經到來？

——冷眼看丁庭宇的表演

### 黨分裂後的副產品

自從國民黨因權力鬥爭而發生派系分裂之後，台灣就適時出現了所謂的「民意調查」。這種歷史巧合，絕對不會是偶然的。在蔣經國當權的時代，台灣民意是一致的，是赤誠效忠的，根本無需調查。在那安定的、幸福的時代，蔣經國領導下的國民黨受到全民擁戴，民心的向背完全接受黨意的支配。因此，從外國進口的民意調查，當然就屬於多餘的了。

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國民黨的權力開始分配不均。黨鞭再也不能控制黨意，而黨意也不能再支配民意了。從前的黨鞭、黨意到民意，是一以貫之的。蔣經國病逝之後，竟然出現一位台灣人總統，這使得以外省籍為主體的統治集團突然變得非常不能適應。再加上台灣社會瀰漫一股強烈的李登輝情結，民心的向背終於不再以外省籍統治者的意願為轉移。國民黨

內部缺乏民意資源的外省籍黨員，果然及時從國外輸入一種叫做「民意調查」的東西。上帝說，要有光，光就來了。「民意調查」的機器說，要有民意，民意也就源源不絕出現了。

丁庭宇教授輸入一部品牌叫做「蓋洛普」的民意調查機器之後，國民黨非主流派從此就受到台灣民意的熱烈支持。在這部機器還未進口以前的舊時代裏，國民黨所製造的新聞，如果要取信於民，往往先把消息輸出，再經過外電輸入，於是「台灣人民反對台獨」，或是「台灣民眾對目前生活感到滿意」之類的外電消息，就成為國民黨的宣傳品。這種做法，自然反映了國民黨信用的破產，所以才不得不求助於外電。國民黨的新聞製造業，既然不能具有說服力，那麼透過外國媒體來報導，就比較信用可靠了。

經過外電報導的迂迴宣傳手法，似乎太慢了，而且手續也太麻煩了。國民黨的非主流派乾脆就引進一個民意跨國公司，生產加工都在台灣進行，只要把產品貼上外國標籤，就可在台灣打開市場了。丁庭宇教授的發言，可能難以使民眾信服；但是，在丁庭宇的嘴巴貼上「蓋洛普」牌的貼紙，發言的分量就大大不同了。明明是丁庭宇、丁守中、呂亞力在說話，台灣報紙卻說「根據美國蓋洛普市調公司的一項民意調查」。這就像台灣的沙士汽水貼上可口可樂的商標，味道雖然不同，但至少，還有一個可靠的招牌在支撐。

「蓋洛普」牌的民意，目標非常精確，從來不會有失誤。從二月政潮發生以來，李登輝受到非主流派攻訐之際，蓋洛普牌的民意機器也會緊跟後面補上一刀。非主流派在吹捧趙少

康之際，蓋洛普牌的機器也會巧合地錦上添花。這樣優良的服務品質，似乎找不到第二家了。

### 予取予求的民意調查

關中主導的「民主基金會」，在日前委託丁庭宇教授做一項「民意調查」。蓋洛普牌的調查報告，果然又照例在十一月十九日的星期一發佈。因為，星期一往往沒有重要新聞，報紙可以用來大幅報導，在聲勢上足夠震懾讀者。這次調查報告是為「民主基金會」造勢的，所以「美國蓋洛普公司」又一次準確獲得這樣的結果：「面對目前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政黨的表現，有四成三的受訪民眾可能在下屆縣市長選舉和增額立委選舉中，將選票投給這兩黨之外的第三黨候選人。」

蓋洛普牌機器在滿足顧客要求的服務上，是無微不至的。根據調查對象所顯示的「第三黨選民」，乃是「多數具大專程度，年齡在廿至廿九歲之間，外省籍，而且不支持特定政黨」。關中看到這樣的調查報告，應該感到欣慰的。他理想中的支持者，既是受過高等教育，又是屬於少壯階層；而最重要的，竟然又都具備外省籍。這種結果，實在太令人滿意了。原來第三黨的發展空間是如此廣闊；「民主基金會」的成立，經過美國蓋洛普公司證明，誠然是符合天時、地利、人和的。

在丁庭宇教授的調查之下，台灣民意如探囊取物，真的是予取予求。不過，丁庭宇的跨國公司對台灣社會並不具任何意義，它重要的信息主要是公佈給國民黨中央看的。因為明年國民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以外省籍黨員為中心的「民主基金會」，不能不開始做鋪路工作。蓋洛普牌民意顯示，第三黨的發展空間已準備就緒。黨中央如果不尊重民意的話，國民黨恐怕要受到第三黨勢力的挑戰。丁庭宇領導的跨國公司，意思就是這樣明白。

當台獨的信仰者受到誣控、逮捕、判刑之餘，蓋洛普牌的民意顯示，台灣民衆不贊成台灣獨立。當國民黨非主流派抨擊民進黨的政治主張時，蓋洛普牌民意也顯示，台灣民衆對民進黨的執政能力表示懷疑。丁庭宇進口的這部機器，真是善解人意。倘然有一天國民黨的「獨台」路線變成國策時，贊成「中國統一」者都必須受到監禁，未知蓋洛普牌的機器又要提供怎樣的服務？

當前台灣民意受到扭曲、鎮壓、污辱之際，如果想知道民心的向背，報紙是不可信的，國民黨也是不可信的。唯一可以相信的，是丁庭宇教授。請認明他的外國商標，真正老牌的蓋洛普。

一九九〇·十一·廿 聖荷西

## 朝向「自民黨化」的國民黨

### ——從邱創煥成立政團談起

#### 保衛李登輝的新集團

邱創煥在元月廿四日宣佈成立了「中華民國國家發展策進會」，這項行動，等於宣告國民黨內部派系分裂至此終於定型。在此之前，國民黨內部製造噪音的人士，大多是來自非主流派的陣營。尤其是關中在去年十一月十日成立「民主基金會」時，非主流派「砲打黨中央」的架勢是非常清楚的。現在邱創煥另組政團，公開舉起保衛李登輝的旗幟。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對峙，由於有了明確的據點而更加強化了。

邱創煥的國策會，清楚表明如下的立場：「擁護國民黨，支持李總統，配合郝院長。」這完全是當權派的立場，較諸關中的「民主基金會」還更具實力。不僅如此，國策會這個政團，也把一些支持關中的政治人物拉進自己的陣營，這等於是在瓜分非主流派的力量。

在國民黨陷於「憲政改革」危機之際，邱創煥政團的出現具有幾個意義。首先，這是國民黨內台籍黨員對外省籍黨員的一次回應。省籍問題，隨著權力爭奪的日益劇烈而更加深刻化。自李登輝上任總統以來，台籍黨員一直處於挨打的局面；關中、趙少康、郁慕明表現出來的囂張、狂傲的態度，簡直如入無人之境。李登輝在痛定思痛的情況下，果然學習了「民主基金會」的模式，另組一個政團予以對抗。國民黨內的省籍裂痕，從此更無可彌合了。

其次，邱創煥政團的誕生，給予社會上一般具有李登輝情結的人士一個嚴正的教訓，特別是對民進黨內部的李登輝情結，更具一種警惕的作用。在去年李登輝「競選」總統時，就在陷於圍困之際，許多非國民黨籍的台灣人，都為此感到無比驚慌。在民進黨裡，在民主運動陣營裡，一些政治領袖都踰越了本身的立場，而公開支持李登輝。事實上，為李登輝操心的台籍國民黨員，早就裡裡外外忙著部署；他們的李登輝情結，比起社會人士或民主運動人士還嚴重。他們對李登輝的支持，自然是超過任何人。民進黨與民主運動人士的焦慮，顯然是多餘的了。如今邱創煥政團的成立，等於是宣告李登輝情結人士的死亡。支持李登輝是屬於國民黨內部的事，民主運動人士豈有插足的餘地？

## 「自民黨」的圍困

### 為政治分贓鋪路

邱創煥政團公開保衛李登輝，其目的並非止於李登輝一個人而已，他們其實是在保衛既得的地位與利益，進而角逐更多更大的權力。邱創煥表示要「配合郝柏村」，是相當可圈可點的。李郝之間的政治婚姻，出現多次危機。李系人馬現在既然已明言要「配合」，這更可顯示郝柏村的高壓手段政策，將獲得台籍國民黨員的默許。具體一點來說，郝柏村對台灣社會的鎮壓，是需要有台籍人士來協力執行的。邱創煥政團的「共犯」性格，現在也難以掩飾了。因此，李登輝所領導的國民黨主流派，雖然大部分都是由台籍黨員所組成，但是他們為了政治利益，為了未來出路，並不一定就會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如果台灣社會的意願與「支持李總統」的立場發生衝突時，邱創煥政團當然是選擇「支持李總統」。同樣的，台灣人民的民主改革要求若與「配合郝院長」的立場發生矛盾，邱創煥政團自然也是站到郝柏村的那一邊。因此，「國家發展策進會」宣稱要「協助政府實踐民主憲政」，要「落實地方自治」，要「增進人民福祉」，這種種主張，關中的「民主基金會」也同樣可以提出來。所不同的是，邱創煥支持李登輝，而關中支持李煥。在他們的眼裡，人民只是被當做政治玩物而已。

最典型的政治玩物，便是那批可憐的政客與資本人家。他們為了本身的利益，為了將來的

回收，在現階段只好兩邊都同時押寶。所以，我們看到這種離奇的現象：在連署支持「民主基金會」成立時，有一批資本家與地方政客、士紳都參加了簽名；現在，同樣的名字也出現在「國策會」的行列裡。因為，他們還看不出誰是贏家，只好到處投資。這種現象，充分顯示了政客的投機性格。他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所以就被權力者牽著鼻子走。

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分裂，從最初的模糊界線，發展到現在的定義分明，已漸漸畫出一條清晰的軌跡，那就是國民黨越來越像日本的自民黨。日本自民黨長期騎在人民的脖子上，以派系分贓方式支配戰後的日本社會。國民黨開始學習使用政團的模式，為未來的政治利益進行規劃。這種發展，對台灣民主政治是非常不利的。台灣民主運動曾經因李登輝情結而偏離了人民的意願，現在應該警惕到國民黨內部的分贓模式。拒絕參加或支持國民黨的政團，避免在國民黨政團上押寶，可能是今後台灣社會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九九一、一、廿五 聖荷西

## 一本護照換取一張選票？

——「僑選民代」的荒謬劇

海外的幽靈人口

台灣的外交部、內政部、僑委會，以及國民黨的海工會，目前正在統計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華僑人數，並且也在研究如何從僑團中產生僑選民代的可行性。這是以林洋港為首的國民黨「憲改小組」，在最近設計出來的改革方案之一。

以護照來決定投票資格，以護照來換取選票，可能是國民黨對廿世紀民主政治的最大貢獻。凡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者，無論是在天涯海角，或在蠻荒絕域，都可以決定在台灣島上生活的住民命運。可以想像的，一位遠在南非的廚師，或在舊金山的幫派分子，只要擁有一本護照，就有可能獲得權利，影響台灣住民的政治生活。

自從國民黨被迫必須從事政治改革以來，就一直不肯以落實的方式來實施真正的民主；



從兩年三階段的退職方案，到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方案；從今年底到明年初的投票日不確定案，到現在推出的一本護照一張選票的構想，國民黨並沒有一個精確的、肯定的、可以信賴的修憲途徑。種種設計，都只是考慮到如何使國民黨的私利延年益壽。即使只是簡單的終止戡亂時期，國民黨也必須以各種理由來制定「過渡時期」的法律，也企圖想出各種名稱來取代所謂「叛亂團體」的稱號。

現在，國民黨又千方百計要使用護照來計算投票人頭，繼續要利用海外的力量來干涉台灣民主的運動；其荒謬絕頂，早已脫離了民主政治的正軌。國民黨以為，只要舉行了投票，就必然是屬於民主的，也就必然會得到人民的相信。它從來不去考慮，這些海外選民並沒有在台灣定期納稅，早就不能擁有政治發言權。進一步來說，海外選民即使選出代表是合乎民主程序的，這些代表回到台灣制定法律，並不是要讓海外選民遵守，而是要規範島上住民的政治活動。僑選代表訂好法律後，又回到僑居地；這種不負責任的代表制，是偽民主的，也是徹底違反憲政精神的。

國民黨四十年來在海外已發出不計其數的護照。爲了反共，爲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僑胞，護照之發行，已到了泛濫的程度。這些護照，在國際社會不能獲得承認，如今卻用來製造海外的幽靈人口，以便抵擋台灣民主運動的力量。這種做法，台灣住民絕對不會同意的。

### 依舊是「外來政權」

使用護照來控制海外僑民，是國民黨惡名昭彰的統治手法之一。在海外，爲了取得「中華民國護照」，爲了保持「中華民國國籍」，僑民都必須對國民黨表示忠貞。凡是不符國民黨利益的僑民，便以「異議分子」處理，或吊銷其護照，或勒令簽寫「切結書」以示其忠貞。因此，在海外持有護照者，必然是受國民黨控制，或是親國民黨分子，或是對政治未敢有任何意見的。

在這種情況下，海外僑團如果可以成爲選區的話，必然成爲國民黨的「鐵票區」。不僅如此，護照的發行既然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上，則爲了應付選舉，其護照也可以臨時緊急發出。在島內，可以使用鈔票換取選票；在海外，則使用護照換取選票。這樣的裡外通吃，幾乎已可保證國民黨的全面勝利。建基在這種不公平的選舉之上，國民黨「憲政改革」的內容與品質，已是不堪想像。

住在海外的僑胞，如果真的熱衷於問政，如果真正與台灣命運共生死，大可以回台定居，與台灣住民呼吸一樣的空气，與台灣住民共同盡公民義務。然後，參加島內選舉，由島上選民依自由意志來投票選擇，這才符合民主的精神。

然而，對於這種符合真正民主的做法，國民黨反而用心良苦地予以刁難阻撓。它一方面限制海外僑民返台設籍，一方面又以黑名單方式阻止海外僑民回去。這種倒行逆施，清楚暴露了國民黨的自私自心態。對國民黨而言，僑民回台設籍以後，反而不易控制；只有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時，才能辨識誰是忠貞分子，也才能夠控制整個選情。

七折八扣的修憲方式，絕對不能叫做「憲政改革」。到目前為止，國民黨所做的一切，都只能稱為「黨務改革」。所以，它設想出來的方案，都在拯救國民黨自身的危機，並非是在解決整個台灣政治的危機。四十年來，國民黨一直被視為「外來政權」，是有道理的。現在，這種外來政權的性格，將因荒謬的僑選民代的產生而更強化了。國民黨既怯於認錯，又死不悔改，恐怕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一九九一·二·廿一 聖荷西

## 國民黨的「僑變」疑雲

### 「僑選」的歷史夢遊症

一群沒有民意基礎、不知民主之為何物的所謂遴選立委，在三月十四日以「環球會」的名義，在台北邀請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座談，請求國民黨小組翻案，使「僑選制度」能夠繼續保存下來。他們認為，憲改小組設計出來的僑選方式，不僅縮減了華僑的「參政權」，而且也認為這是一種「違憲」。他們又進一步威脅說，過去堅決反共的老僑團，已準備要降旗了；再加上中共方面的拉攏與示好，僑界政情可能有變化。

這一小撮遴選立委的需索無度，從這樣的請求與恐嚇就可發現。國民黨爲了證明它是代表中國的，當初就製造了這種嚴重違背民主精神的畸型產物。國民黨以官祿拉攏示好，少數僑領也自甘充當從犯角色。雙方的這種聯姻關係，早就預告了始亂終棄的結局。遴選制度，

是國民黨統治台灣的一種工具，本來就與整個中國毫無任何關係。

中共在北京建國，自始就是代表中國。他們從來不必製造所謂僑選代表的制度；沒有僑領的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在國際上建立穩固的地位。國民黨既不能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又不能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所以就只好在海外僑界製造政治零件，並營造違章建築。經過四十年全球華僑的「四海歸心」，國民黨仍然不能代表中國；更不堪想像的是，國民黨在國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甚至到了要代表台灣都成問題的地步。

國民黨藉用僑界的力量，自始就不是要代表中國，而是爲了阻擋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這一個秘密武器，最後果然就證明是一種騙局。吃盡甜頭的海外僑領，今天繼續要求國民黨必須維持既有的分贓制度，並不是使人訝異的事。揚言被拋棄之後，他們就可能有「降旗」之舉，也不是出人意料的。

過去四十年來，國民黨之遭到降旗，這並不是首度發生。降旗歸國，是國民黨的重要政治傳統；過去是外國政府爲其易幟，如今是華僑更換旗色。這種傳統之延續與擴充，乃屬必然的趨勢。這些沒有代表性的海外代表，聲稱「參政權」被縮減，聲稱國民黨嚴重違憲，希望回到歷史的夢境，希望國民黨與之白首偕老。這種情況，恰恰反映了他們的嚙語與夢遊。

### 民主運動無需華僑

有位僑領甚至揚言：「台灣之有今日，華僑的貢獻衆所共睹。」這樣的招供，恰如其暴露了「遴選制度」的共犯性格。原來台灣今日憲政之落後、民主之遲緩，乃是由於這些人的貢獻。就是因爲有他們在台灣的「參政」，國民黨才能夠在台灣自誇是代表中國的。

華僑如果有能力與智慧參政的話，早就應該在僑居的國家出人頭地，根本無需眷戀台灣的一官半職。僑居國給他們充分的參政權，他們沒有能力去執行；卻反而回頭要求國民黨給他們參政權，這樣的以逸待勞，這樣的不勞而獲，正是違背憲政精神的最大罪人。

事實上，國民黨改小組設計出來的方案，比起過去四十年還更膨脹海外代表的參政比例。以國大代表爲例，在第一屆的三〇四五人之中，僑選者六十五人，僅佔百分之二。憲改小組規劃的第二屆國代，將選四〇二人，僑選者達二十人，竟佔百分之五。同樣的，第一屆立委人數爲七七三人，僑選者十九人，僅佔百分之二；擬議中的第二屆立委人數是一六一人，僑選者達六人，竟佔百分之四。這種高昇的比例，已經超過台灣社會所能忍受的程度。貪婪的海外僑領，對此還不滿意。可以預見的，未來的台灣政治衝突，必然還會持續下去。

歷史已經證明，華僑參政絕對不能代表中國；歷史也已證明，國民黨的分贓制度，更不

能代表中國。充當民主罪人的國民黨憲改小組，在今天仍然還在玩弄僑選制度的勾當，終有一天必然不能逃過人民的譴責。

少數自稱代表僑界的僑領，原是國民黨一手扶植起來的。他們在台灣招搖撞騙，習慣成自然。現在又進一步以「降旗」來要脅國民黨，這實在是好得很的表現。原來他們的忠貞純度，是以官爵祿位來試煉的。他們要更換旗幟，一定是受到台灣人民的歡迎。最好他們也能建議北京的中國領導人，設置幾張遴選代表的席位，以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真正代表中國的。

國民黨如果有膽識能夠讓這些僑領絕裾而去，那麼憲政改革的誠意才有可能受到台灣人民的首肯。台灣民主運動的成長，原就沒有依賴過華僑的支援；在國民黨與華僑的分贓制度未能廢止之前，國民黨的「外來政權」罪名就不可能洗刷。

一九九一·三·十五 聖荷西

## 郝柏村的華僑觀

### 準備投共的遴選代表

國民黨與華僑之間的關係，已從明朗變成黯淡，也從堅定明快化為猶疑不決。其中最大的關鍵，在於國民黨與華僑之間的分贓制度，出現了不平衡的現象。由於國民黨在台灣社會壓力下，被迫進行憲政改革之際，已不可能繼續分配過多的僑選民代名額給海外。

在上次遴選中，僑界爲了名額的分配不均，早已累積不滿的情緒。現在國民黨又把名額削減，權力來源大大縮減，其心理之不平衡自是可以想見。但是，華僑之受到不尊重，又不只來自國民黨而已。整個台灣對騙吃騙喝的僑領人士，已公開表示了鄙夷態度。

去年國民黨慶祝雙十節時，空運了一些所謂愛國華僑回台參加遊行活動。他們在高雄街頭就遭到市民的奚落與辱罵。國民黨閉門遴選出來的所謂僑選立委，也在議會裡受到台灣有

民意基礎的代表的強烈抨擊與抵抗。「愛國華僑」在過去能夠到台灣予取予求，原因無他，他們乃是憑恃了國民黨實施戒嚴令，使台灣住民不能對他們有所怨言。如今，台灣民主運動的力量逐步昇高，一度被壓抑的民間聲音終得發抒出來。這群狐假虎威的愛國華僑，其地位之一落千丈，已非國民黨能夠搶救的了。

國民黨在密室裡設計出來的憲改內容，仍然刻意維護海外代表的既得利益。名額數目表面上縮減，但是與過去的比例相較之下，反而是大為增加。對於華僑如此曲意奉承，竟然還遭到一些僑界人士的反彈。他們堅持認為，國民黨必須繼續維持過去戡亂時期的名額，也必須維持過去的遴選方式。爲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們公開勒索；如果國民黨不能使其心願順遂，不僅海外僑社要更換旗幟，一些遴選立委也要轉赴北京擔任中國政協委員。

國民黨參養出來的僑領，會說出這種狠話，絕對不是偶然的。他們很清楚，國民黨之所以能夠「代表中國」，能夠在台灣壟斷政權如此之久，便是有愛國華僑的共襄盛舉。這種相互利用、相互牟利的共犯結構，只能維持在反民主、反人權的國度裡。對於追求民主政治特別強烈的台灣社會而言，它自然就難以存續下去了。

愛國華僑會去投共，會下降國民黨的旗幟，是遲早的問題。「華僑是革命之母」，是正確的；國民黨在僑社即將被革命，不是令人意外的事。

### 離奇的「尊重華僑」論

對於這種利慾薰心的愛國華僑，國民黨並沒有給予譴責。相反的，郝柏村在立法院答詢時說：「中華民國與華僑間有特殊的感情，僑胞自中華民國開國以來，即有特殊的貢獻，當然也應有特殊的地位。」如果這是出自一位僑領所說，實無足驚奇。令人駭異的是，這居然是行政院長在國會殿堂說出的。

華僑確曾幫助過國民黨建立中華民國；但是，建國成功後，國家並不是屬於國民黨一黨私有。倘然國民黨要對華僑的特殊貢獻有所回報，至多也只能在黨內提供特殊的地位給他們，豈可剝奪人民的權益做爲政治酬庸？何況，華僑協助建立的中華民國，早已在一九四九年於中國大陸滅亡了，國民黨豈可搾取台灣人民的血汗供其揮霍！

郝柏村說：「我們在復興基地的同胞，對僑胞的貢獻；無論是歷史，或是現實，皆應予以肯定，應相互容納與合作。」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愛國華僑如果還有絲毫貢獻的話，那就是幫助國民黨製造「代表中國」的假象。國民黨與華僑的相互容納與合作，便是制定「遴選代表」的畸形體制，彼此狼狽爲奸。這才是國民黨與華僑之間的特殊關係。

美國猶太人曾經協助以色列建國，從來沒有聽說過特拉維夫國會，設立所謂的「僑民代

表制」。如果猶太人那麼熱愛以色列，他們早就收拾行囊，回到故土與以色列共生死。只有國民黨扶植起來的愛國華僑，才敢厚顏無恥宣稱對中華民國有如何的貢獻；也只有國民黨的行政院長，才敢自私而愚蠢地要依賴華僑如此這般的貢獻。

只因爲海外僑社有人宣稱要「降旗」，只因爲遴選立委有人揚言要「投共」，國民黨就如此緊張地露出惶惶不可終日的神色。中華民國墮落到這樣不堪的地步，果然就有行政院長對華僑發出惺惺相惜之言。國民黨與華僑，真是門當戶對，珠聯璧合。

對台灣民主制度有所貢獻的海外台僑，國民黨不思爭取，反而製造許多陋規，阻撓海外同鄉回台參政。台僑敢於面對台灣住民的投票抉擇，國民黨竟然心生畏懼。國民黨寧可開後門，與華僑陳倉暗渡，給予特殊地位，保持特殊關係。由於關係太特殊了，所以愛國華僑宣稱要另結新歡時，國民黨就開始哀求了。這種景象，無疑是人類政治的一大奇觀。

一九九一、三、廿一 聖荷西

## 省籍戰爭蓄勢待發

### 省籍裂痕無可縫合

在今年年底二屆國代選舉中，將以政黨比例方式產生八十名「全國不分區」的代表名額。國民黨國大黨部書記長謝隆盛在三月廿八日表示，國民黨中央有意挑選三十名至五十名「法政素養、道德文章」皆佳的外省第二代菁英出任。這個構想，將使台灣社會裡的隱性省籍裂痕再次擴大。對於未來的憲政改革，不僅將構成阻礙，而且也將使過去的省籍問題延續到無窮盡的未來。

國民黨逃亡到台灣時，是一個典型的外省集團政權。爲了長期保護其統治中心的鞏固，國民黨不惜在社會中劃分省籍界線。從官吏的陞遷，到文官的錄取，都是依照省籍分配的原則，遂行其統治利益的維護。

在外省集團支配的時代，國民黨的政治宣傳都盡力散佈「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沒有省籍區分」之類的論調。但是，外省集團的優勢開始改觀時，國民黨就寧可揭穿過去政治宣傳的謊話，放膽把省籍問題暴露於政治鬥爭之中。去年國民黨總統選舉的風波裡，省籍的界線終於在其黨內儼然浮現。到了國是會議結束以後，外省籍第二代的國民黨立委，更是以省籍問題來攻擊其黨中央。

省籍界線，原是无關統獨問題，而是台灣社會內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最大分野。等到國民黨領導階層被李登輝取代之後，省籍糾紛才又從台灣社會轉移到國民黨的內部。外省籍第二代，仍然耽溺於過去支配地位的舊夢，仍然憧憬著「高等華人」的種族優越感。因此，他們開始結盟，組成聯合陣線，在「黨內民主」與「改造中國」的名義下，對黨中央進行圍剿。

經過長達一年的努力，外省籍第二代構築的攻勢終於產生了效果。爲了討好外省籍萬年代表，也爲了討好第二代外省人，李登輝爲首的黨中央，果然創造了所謂「全國不分區」的制度，這種制度便是「大陸代表制」的偽裝。國民黨以爲，這樣做就可安撫其內部的不平。

國民黨憲改小組在密室裡構思出來的「憲法增修要點」，上面就有如此的規定：「中央民意代表之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這條規定，現在已經證明是爲了「外省籍第二代」與「愛國華僑」設立的。

所謂全國不分區，並不是說從此不再劃分界線；相反的，在「不分區」的面具下，省籍界線是分得清清楚楚的。這證明了憲政改革，完全沒有改造台灣政治結構的意義；它恰恰是爲了維持省籍的區別而設計的。

### 憲改會議無可樂觀

從去年以來，國民黨在省籍問題上，一再以語言、以行動、以政策重新強化與分割。如今，又把省籍界線正式制度化，這對於未來社會的發展將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

無論年底的選舉過程有多公平，只要摻入了省籍因素，許多政治問題都將被染色。所謂「法政素養」與「道德文章」的背後，其實已經暗藏了省籍的偏見。如果沒有省籍的「膚色」，他們的素養與道德，是否能夠獲得青睞，當是值得懷疑的。

「大陸代表制」，是在國民黨外省籍萬年代表的勒索下製造出來的。憲改小組以「全國不分區」的名義來替代「大陸代表制」，顯然是爲了避免在社會裡再度挑起省籍糾紛。不過，這次國民黨中央如此露骨對外省籍第二代愛護有加，必定會遭到台籍黨員的反彈，而且也會遭到整個社會的譴責。

以外省籍身分進入憲改會議之後，在許多議題上，也會在省籍的問題上造成分裂。這將

不只是「修憲」與「制憲」的爭執而已，同時也將是一場「外省人」與「台灣人」對決的戰爭。長期以來，台灣人從來不敢在省籍的問題上仗義直言，反而寧可忍受省籍的歧視，讓外省統治集團予取予求。

相形之下，在政治鬥爭上，在權力分配上，外省人毫不留情地把省籍偏見搬到檯面。在台灣定居了長達四十年以上，他們對「省籍」如此百般珍惜；原因無他，全部都是為了政治利益。如果外省籍貫與政治利益沒有掛鉤的話，試看還有多少人願意自稱外省人？國民黨的省籍政策，與北京的對台政策，是可以平分秋色的。中共領導人為了宣稱其對台灣有主權，遂不惜在中國境內製造「台灣人」這樣的人種。許多第二代、第三代的台灣人，早已不會說台灣話，甚至不知台灣是什麼情況，他們也以「台灣人」自居。因為，在中國扮演「台灣人」，就一定可以享有特殊的政治利益。

同樣的，國民黨不斷在台灣製造「外省人」的人種，也是與政治利益有著密切的聯繫。省籍之間的對峙，是一種變相的種族糾紛。可以預見的，明年憲改會議裡的省籍戰爭必將慘烈無比。以「省籍」優越感換取的代價，必定非常昂貴。

一九九一、三、卅 聖荷西

## 李登輝政府對外關係的展望

### 第三輯·國民黨的統與獨



## 李登輝政府對外關係的展望

### 「一國兩府」的提出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將是李登輝政府對外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新取向。國民黨在台灣統治四十餘年，從來沒有一位元首或高級官員對北京政府直呼其國號。在長期反共心態的指導下，中共是「匪」、是「叛亂團體」，台灣對中國的關係是處在「戡亂時期」的狀態。基於這樣的立場，國民黨對內、對外都堅持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政府」；也是基於同樣的立場，國民黨才不斷更改其政治口號，從「反共抗俄」、「光復大陸」，一直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內容一再調整，卻從未正視北京存在的事實。

但是，隨著李登輝的連任總統，國民黨的政治立場立刻發生劇烈的變化。中國不僅不是匪區，中共不是叛亂團體，李登輝還進一步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這可以從三個事實

來印證：

第一、今年五月十六日，自北京訪問歸來的國民黨立委丁守中，向李登輝轉達中國副總理吳學謙的談話說，中共願與國民黨展開「黨對黨」的接觸對話。李登輝答覆說：「黨對黨不可以，要談就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政府對政府，雙方對等地位來談。」李登輝又表示了個人的立場：「我是都可以談的，只是中共一直要貶低我方為地方政府，他們根本沒有誠意和我們對等來談。」在這次談話中，李登輝並沒有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但至少，已經把「叛亂團體」的中共提昇到政府的層面。

第二、在五月二十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雙方可以接觸談判的三個條件，亦即「中共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制度，放棄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在這三個如果實現之後，李登輝政府才「願以平等地位，建立雙方溝通管道」。

第三、五月二十二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李登輝提到他所推行的「務實外交」，認為台灣的經濟力量已經到了不能不到國際發展的階段。他說：「這個問題，事實上，和中共批評的『兩個中國』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們一直強調『一個中國』。中共也一直強調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是中華民國，但是中國只有一個。這表示什麼呢？表示有一天應該要統一，不統一不行。」李登輝的答覆，值得注意的是，並不在於強調「統一」的問題，而在於把中華人民

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相提並論。這個立場已全然超越了長期以來所宣傳的「漢賊不兩立」的原則，也超越了國民黨極力主張的「一個合法代表政府」的範疇，甚至也超越了郝柏村所說的「一國兩區」的內容。如果是屬於「一個中國」的話，絕對不會出現兩個國號；李登輝的談話等於揭露兩個國家、兩個政府的事實，而這個事實不是任何理論可以駁倒的。

從國民黨的統治立場來看，自然是不能公開接受「兩國兩府」的原則。在法律基礎上，國民黨必須以「一個中國」做為掩飾。郝柏村在回應李登輝有關「對等政府」的談話時，就說「現在是一個國家，兩個政府」。不僅如此，郝柏村還解釋他對這個客觀事實的了解，他說：「從美國到大陸設置聯絡辦事處，與中共發表上海公報後，就形成一國兩府的情況，那邊有辦事處，這邊有大使館，兩岸就是一國兩府，到現在已經十六、七年了。」

郝柏村的闡釋，證明了國民黨的權力核心人物很早就已準備好要接受北京政府存在的事實。在這十六、七年中間，台灣發生無數政治衝突與政治冤獄事件，那是因為台灣社會比國民黨決策者更勇於面對客觀現實的問題。但是，國民黨為了維持既得的統治利益，遂採取高壓手段來阻撓任何符合台灣社會現實與台灣人民意願的民主運動。國民黨決策者明明知道台灣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但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仍然使用暴力手段製造高雄事件，並逮捕美麗島人士入獄。這說明了台灣的人心走向與民主運動，其實一直都走在國民黨的政策之前。今天，李登輝與郝柏村才公開提出「一國兩府」的原則，並不能掩飾這個口

號背後犧牲台灣人權、民權、主權的事實，而且也還不能趕上台灣社會對於海峽關係正常化所提出的要求。

現在李登輝政府提出「一國兩府」的說法，從戡亂體制的觀點來看，可能是一種強烈的調整；然而，從政治現實的立場來看，「二國兩府」仍然還是沒有正視當前問題的存在。現在的政治現實就是兩個國家、兩個政府、兩個制度，絕對不是中共所說的「一國兩制」，也絕對不是國民黨所說的「一國兩府」。國民黨進一步要克服的障礙，便是如何在台灣主權與台灣代表權的問題上獲得發言權。

### 戡亂體制的終止

即使僅僅是提出「一國兩府」的立場，國民黨對外、對內的政策就必須有相應的措施。對外而言，便是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對內而言，便是準備刪除國安法中有關「不得主張分裂國土」的規定。

李登輝在總統就職演說詞中，已承諾將在最短期間內，「依法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這個承諾，一方面是基於整個世界潮流已經開始走向和解，一方面則是為了舒緩台灣內部憲政改革的人心要求。不過，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的最大暗示，便是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

當中共不再是叛亂團體時，國民黨立即觸及兩個問題：第一、「國土分裂」是一無可辯駁的客觀事實；第二、中國代表權的問題至此宣告結束。此後，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必須有所調整，那就是從模糊不清的內政關係，邁向對等政府的國際關係。

事實上，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對台灣內部民主的衝擊較為重大。戡亂體制從此成爲歷史名詞，所有箝制台灣人民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行動自由與經濟自由的相關法律，其中最大的法令包括「臨時條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都必須取消、刪除或修正。特別是國安法裡有關「不得主張分裂國土」的規定，至此已不具任何政治意義。過去實行國安法的三年中，許曹德、蔡有全的「台灣應該獨立」事件，以及鄭南榕發表新憲法草案的事件，都證明是國民黨的政治祭品。國民黨應該在這兩個事件上，對許、蔡家屬與鄭南榕家屬公開表示道歉，並給予人格上、精神上的補償。

除此之外，「懲治叛亂條例」也在李登輝政府提出與中國「政府對政府」的談判建議之後失去了立足點。長達四十年來的台灣人權與民權，在「懲治叛亂條例」下受到很大的損害。在李登輝就職當天，多位主張台獨或參加台獨、共黨活動者都得到特赦。現在又由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以及宣告戡亂時期的終止，主張台獨與共產主義的言論，不僅不會再觸犯國安法，即使是懲治叛亂條例也完全不符政治的發展了。

台灣反對運動進入戡亂時期終止之後的階段，顯然必須重新調整。在台獨的言論上，將

逐漸失去抗爭的訴求，這是因為戡亂體制改變以後，國民黨的「獨台」路線已經具體浮現。台獨與獨台的重疊點，就在於二者都是以台、澎、金、馬為政治實體，而在這個政治實體上，國民黨又掌握了政治權力。如今，在「一國兩府」的底牌掀開以後，國民黨會以更放膽的態度從事彈性外交或務實外交的推展。今年年初，國民黨以台澎金馬的名義向關貿總協（GATT）提出入會的申請，正說明了國民黨有意把中華民國與台澎金馬結合在一起。從這個觀點來看，台灣反對運動在台獨問題上的發言空間，顯然就縮小了許多。

在反對運動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民進黨，如果要與國民黨競爭「台獨」與「獨台」的發言權，恐怕就有必要在內部民主方面提出有力的主張。甫於五月廿一日出獄的許信良對這個問題就有精闢的看法，現階段的反對運動，應該先爭取在台灣「建立一個由人民選出的政府與議會」，應該爭取使國民黨「讓出壟斷的特權」。因此，他認為民進黨在今後兩三年要加強公共政策與領導組織的設計。換句話說，民進黨必須在內部民主方面的工作上開闢更大的空間。

### 外交政策與對中國關係

然而，這並不是說反對運動從此不必注意台灣的對外關係。到目前為止，國民黨還不敢在台灣主權與台灣代表權上表明真正的立場。李登輝政府仍然侷限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之

下進行獨台路線與彈性外交，仍然懼於使用台灣名義重返國際社會。這種格局，自然還留下一些空間讓反對運動去運用。

在李郝體制正式確立之後，值得注意的一個發展，便是李登輝就職演說中表達的兩個願望，一是「願以對等地位」，與中國建立雙方溝通管道；一是「願意在實質關係基礎上」，與友好國家加強合作。這兩個願望突出了李登輝政府對外關係的路線。

在過去四十年來，國民黨的外交政策一向與海峽關係劃清界線。也就是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與對國際關係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國民黨不僅不承認北京政府的存在，而且還要堅持台灣是「代表中國」的。這兩、三年來，這種矛盾性就在務實外交與大陸政策的推動之中暴露出來。國民黨一方面宣稱「中華民國」的領土是包括中國大陸的，另一方面卻又以台澎金馬的實體申請加入國際組織。奧會模式、亞銀模式，以及GATT模式都是如此。尤有進者，國民黨在制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暫行條例」草案時，許多條文都分不清到底是內政關係或國際關係。

這種矛盾現象，就在這次李登輝就職之後有了一次廓清，那就是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定位在兩個對等政府的關係之上。這自然是屬於一種突破性的作為，而且也是對十年來蔣經國確立的「三不政策」的一大挑戰。

現在的問題是，李登輝要在「政府對政府」的基礎上與北京談判，究竟是要談什麼？對

台灣人民的利益而言，李登輝避開「黨對黨」的接觸，固然是一個明智的決定。不過，在一個代表民意的政府還未產生之前，「政府對政府」的談判實屬一種過早的說法，甚至會引起台灣社會的憂慮。在這個問題上，民進黨與台灣全民必須密切監督李登輝政府在這方面的發展。特別是民進黨，除了加強催生民主體制的早日到來，還有必要在對中國政策與對國際關係的問題上建立更明確具體的方針，以防止國民黨做出錯誤偏差的政策。

### 美國與中國的回應

對於李登輝政府對外關係的新取向，美國與中國表達了極其不同的回應。美國國務院在五月廿一日正式肯定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的立場，認為「李登輝總統欲與中國建立溝通管道，是和平解決的一項積極步驟」。這樣的評論，符合美國多年來對台灣與中國實行等距外交的雙軌政策。華府所採取的立場是，「台灣問題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的事」，美國所關心的是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李登輝承諾在最短期間內宣告終止戡亂時期，固然是對中共、對台灣人民而言，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向華府表示願意以「和平」方法解決台海的爭端。

這次李登輝任命郝柏村組閣，事實上也是為了向美國與中國兩方面有交代，郝柏村的「反共」立場，使華府知道國民黨的親美路線沒有改變；而郝柏村的「反台獨」立場，這又使北

京方面對國民黨的獨台路線不致產生疑慮。郝柏村的內閣，以錢復擔任外交部長，以蕭萬長擔任經濟部長，他們都是親美政策的執行者，這種陣容自然受到華府的歡迎。

美國的雙軌政策，在李登輝政府確立後就更加清楚。華府在最近就宣佈延長一年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企圖透過經濟關係的聯繫，來達到影響北京政策的目的。同時，華府也開始改變其僵硬立場，有意協助台灣申請加入關貿總協。這是希望在支援中國經濟之際，也能在台灣這邊尋求一個平衡點。

對照於美國的正面做法，中國對於李登輝政府就表示了許多反面的態度。對於郝柏村的出任閣揆，北京自然是喜憂參半。就樂觀方面來說，郝柏村鮮明的反台獨色彩，使中國領導人不必過於擔心國民黨會立刻轉向宣佈台灣獨立。但是，從悲觀方面來說，郝柏村的保守大陸政策，恐怕會使日益昇高的兩岸交流倒退。

北京的最大憂懼是，李登輝政府最後會公開舉起獨台的旗幟。到目前為止，中國決策者都排斥李登輝的「政府對政府」接觸的說法。他們從來不會認為有兩個政府的存在，北京堅持只有「一個中國」的立場，中國與台灣的差異應容納在「一國兩制」的脈絡裡。五月廿二日，鄧小平會見西德前總理施密特時，仍然還在推銷「一國兩制」的說法。他表示，「統一後，台灣和香港一樣，都會受益於一國兩制」。他又指出，「中國統一後，台灣將比香港享有更高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這可證明，北京在「一國兩制」的立場上從來沒有動搖過。

北京認為，如果承認兩個政府的存在，台灣等於是從中國分裂出去。五月廿二日香港的《文匯報》，就代表北京立場發表社論說：「如果台灣要搞彈性外交與一國兩府，又要求中國『不阻撓台灣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要中共承認北京中央政府與台灣當局是『對等關係』，那無疑是搞『兩府兩席』了。」因此，社論說：「這只會造成一個更加獨立的台灣模式，在分裂的路上愈走愈遠，而不會有利於國家統一。」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五月廿七日與台灣的國民黨立委張平沼會見時也表示，北京難以接受台灣提出的「一國兩府」。對於台灣加入關貿總協的問題，江澤民也說，中共並不反對台灣加入，但反對台灣藉此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他指出，「同是一個中國，何必中國與台灣個別加入GATT？等中共加入後，台灣可以再用另一名稱申請入會。」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態度，就可反映出北京對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與「一國兩府」的政策完全不能接受。自從一九八四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原則以後，北京從來沒有改變過這個立場。從這些事實來看，李登輝企圖與北京進行「政府對政府」的對談，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努力。

### 台灣社會必須發出聲音

李郝體制與雙李體制的最大不同，在於郝柏村支持李登輝「一國兩府」的立場，而李煥

則急著要與北京建立溝通關係，完全不顧台灣社會民心的反應。因此，就整個台灣政治利益而言，李郝體制較諸雙李體制更具現實的觀點。但是，李登輝政府並不因為這樣，就能夠在對外關係上進入順境。

在政治上，能夠解決的問題，應該優先解決；不能解決的問題，則可等待恰當的時機著手進行。同樣的，對於中國問題，並不是台灣能夠立刻解決的。現在可以優先在國際上建立台灣的主權，可以優先加入其他的國際組織。目前正在擬議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暫行條例」，似可定位成爲「對中國關係法」，以確立兩岸對等的關係。

由於國民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台灣社會在對外關係上一直不能表達恰當的心聲。國民黨的「大陸工作小組」，已在五月十六日通過籌設兩岸「民間中介團體」，反對運動者與民進黨必須爭取加入這個機構，以便建立日後對中國的發言權。

然而，最重要的是，民進黨所領導的反對運動必須發展更大的政治實力，能夠使台灣的統治機構早日變成能夠輪替的政權。只有這樣做，台灣主權與台灣民權的基本利益才能合而爲一，台灣的對外關係才能符合台灣全民的利益。

李登輝政府的對外關係，必將篤定朝向獨台的路線發展。在總統選舉中，李登輝被迫必須在獨台的問題上表明立場。如今，他以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顯然是爲了沖淡他的獨台色彩。然而，無論他如何以「統一中國」的口號來掩飾，如何以「一國兩府」的藉口來辯護，

獨台路線是李登輝政府對外關係的唯一出路。這樣的路線有其一定的限制，並不能真正建立起台灣主權。只有在台灣與中國的對等政府關係建立之後，台灣才有可能重塑真正的國際人格。要達成這個目標，還有賴台灣民主運動繼續成長壯大。

一九九〇、五、卅 聖荷西

## 關係法應提昇到國格的地位

中共不只是一個政治實體

李登輝提出「一國兩府」的概念之後，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往來關係並沒有獲得澄清。雖然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表示，日後台灣海峽兩岸的接觸將定位在「政府對政府」的對等基礎上，但是「一個中國」的架構卻限制了這方面的突破。

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長馬英九，在日前接受台北的報紙訪問時說，當動員戡亂時期宣告終止後，他知道中共不是什麼，但不知道它是什麼。身為國民黨的決策者，如果都會發生思考混亂的現象，那麼一般人民就更不知道要對中共採取怎樣的立場。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倘若中共是什麼都不清楚，恐怕馬英九對國民黨是什麼也不甚了然吧。

在國民黨的圈子裡，馬英九並不是唯一故做糊塗的決策者。根據報載，「台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暫行條例」草案，目前又送回法務部重修。法務部的官員認為，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之後，中共政權的叛亂團體之認定，有必要修正。「人民關係暫行條例」的重修，就是要改變對中共角色的認定，而視其為一個政治實體。

以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來概括中共，自然是一個相當婉轉的說法。當年美國在制定「台灣關係法」時，也是把台灣視為政治實體。這種政治學上的用語，並不能實際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問題。這種用語的提出，主要在於避開敏感的主權與代表權問題。過去是華府以政治實體看待台灣，如今是台灣以同樣方式看待中共。

然則，中共僅是一個政治實體嗎？從「暫行條例」的設計來看，中共不只是一個對等政府，並且是一個對等國家。法務部官員說，如果視中共政權為政治實體，台灣現有的涉外民事法規就可適用。例如，目前適用於香港人的台灣法規，也可適用於日後的中國大陸。

如果關係法的設計是依照這種方向去發展的話，很明顯的，這不但是為了解決目前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尷尬關係，而且也是為了日後要承認北京所做的一個伏筆。

### 台灣不只是一個地區

由於「人民關係暫行條例」必將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各個層面的問題，因此

整部法案的構思與制定必須非常慎重。在政治上如何確立國家認同，在社會上如何維持內部穩定，在經濟上如何保護人民利益，都有賴這部法案的規定。

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命名來概括海峽兩岸，自然會產生誤導。倘若政府官員已準備把中共視為政府與國家，則台灣豈可以「地區」自居？馬英九只敢說中共不是「叛亂團體」，而不敢說出中共是一個政府，一個國家，那是因為他已熟悉國民黨官場虛偽、駝鳥的脾性。也就是為了這樣的脾性，使台灣在國家認同與國際地位上足足混亂了四十年。

隨著國是會議的來臨，台灣已逐漸邁入國家改造的階段，則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必須具有前瞻性與持久性。把台灣稱為「地區」，必難獲得人民的認同；把法律稱為「暫行條例」，又更難見容於台灣社會。台灣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如何能夠訂立一個法律來矮化自己？

今天，台灣與中國之間尚難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再加上中國對台政策仍然具有敵意，現在的台灣涉外法律顯然不敷使用。然而，中國在經濟地理上是如此接近台灣，顯然有必要制定法律加以規範。「暫行條例」經過擬議再擬議，終於還是送回法務部重修，充分說明了決策者的掙扎與猶豫。原因很簡單，至今國民黨仍然搞不清自己是什麼，中共是什麼？

台灣再也不能停留在「暫行條例」的階段，過客心態與租界地心態必須徹底摒除。同樣的，稱台灣為台灣，是一客觀現實，何苦要在台灣之後加上「地區」的尾巴？這種扭曲國格的變態心理，也不再為人民所接受。



透過人民關係法案的訂立，可以使海峽兩岸未來「政府對政府」、「國家對國家」的接觸奠下初步的基礎。決策者應該有勇氣把這部關係法案提昇到國格的地位。克服這種心理障礙後，法案的位階就可確定。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將有大原則、大方向可以遵循。

一九九〇、六、四 聖荷西

## 面臨考驗的「一國兩府」政策

### 北京昇高姿態

李登輝政府推動的彈性外交政策，似乎開始面臨嚴重的考驗。這樣的考驗，一方面來自中國昇高恫嚇的姿態，一方面則是由於日本、韓國、新加坡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轉向。長此以往，務實外交是不是能繼續務實下去，頗令人懷疑。

在五月二十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李登輝曾經提出兩個願望，一是願與中共在「政府對政府」的對等基礎上進行接觸談判，一是願與友好國家發展實質關係。但是，自從發表演說不到一個月以來，情勢的發展都與李登輝的願望背道而馳。

就日本方面來說，李登輝在五月廿二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特地表示要與東京建立進一步的接觸關係，但日本不僅沒有表現出呼應的行動，反而在毫無照會的情況下，宣佈廢除台灣旅

客過境日本七十二小時免簽證的優惠待遇。就韓國方面來說，韓國大統領盧泰愚在舊金山與蘇聯戈巴契夫會談之後，漢城與北京的外交正常化似乎已提上了日程表。就新加坡方面而言，該國與北京的建交就要在今年完成，台灣僅能繼續維持辦事處的地位。就沙烏地阿拉伯方面而言，中國已加強對沙國軍事武器的銷售，雙方的外交關係不斷昇高，台灣的政治地位已急劇降低。

伴隨著對外關係的萎縮，中國也在這一個月來對李登輝所提對等政府的構想展開抨擊。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先後對李登輝的政治訴求表示不能接受。香港出版的六月號《爭鳴》月刊報導，楊尚昆與江澤民都堅持要採取高姿態，認為沒有武力做後盾的話，國民黨不會和談。六月十一日發行的《瞭望》，則直接指控李登輝所提「一國兩府」的說法，是獨台路線，也是台獨路線。就在同一天，江澤民在北京的統戰工作會議上，公開抨擊「一國兩府」的提法，他說：「所謂一國兩府，實質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是走向分裂，不是邁向統一。」江澤民又指出，「我們主張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對等商談，這是從兩黨目前的地位、作用等現實情況出發的，也是爲了避開台灣方面感到不方便的問題」。

## 面臨考驗的「一國兩府」政策

### 以民主體制替代統治情結

江澤民的說法，自然是饒有興味的。從他的談話，可以發現其強烈的統治者心態。他主張僅由中共與國民黨直接談判，因爲這兩黨的地位與作用都不是以民意爲依歸。在兩邊社會內部的民意還沒有發揮力量之前，兩黨有必要加速討論權力的分配問題。不僅如此，北京還特別體諒國民黨的不方便立場，因爲只要透過兩黨談判的方式，國民黨就可以避開「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虛構立場。

純粹就國民黨的利益來看，北京的考慮顯然是仁至義盡了。但是從整個台灣社會的利益來看，中共領導人再一次暴露其蔑視人民地位的粗野心態。對楊尚昆、江澤民這些人而言，只要能讓國民黨走向談判桌，則人民的利益受到出賣也在所不惜。

國民黨到目前爲止仍然以自我辯護的方式來掙脫這種尷尬的局面，並沒有想以主動積極的方式讓台灣人民共同來迎接這種挑戰。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說，李登輝的演說中並沒有提及「一國兩府」的說法，而只是提到將以一國爲前提開展對外關係。行政院長郝柏村，則在六月十二日於立法院答詢說，他從來不贊成「一國兩府」的主張。郝柏村說，「一國兩府」是一個政治現實，而始作俑者是中共。

邱進益與郝柏村的辯白，都停留在文字遊戲的層面，根本沒有勇氣去面對現實。自五〇年代以降，「兩個中國」就是國民黨賴以生存的最高政策，這個政策由於美國與中國的建交而發生動搖。四十餘年來，台灣海峽兩岸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國兩府」的政治現實；真正的現實，根本就是兩國兩府。

國民黨始終不敢承擔兩國兩府的政治責任，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它把「代表中國」的宣傳說得太滿了，以致尾大不掉，失去了迴旋的空間；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國民黨的統治從來沒有以台灣民意為依歸，它所制定出來的對外政策，完全沒有以人民的意願為基礎。

中共領導人便是看準國民黨這種空虛的統治基礎，企圖趕在台灣民意力量建立起來之前，能夠與國民黨直接談判，以達到兵不血刃而併吞台灣。只要國民黨不能真正建立民主體制，中國的叫囂與恫嚇就會不止不休。每隔一段時期，中共領導人就會輪番向國民黨喊話。反正這種漫天開價的統戰，完全無需任何成本。

要徹底解決來自中國的威脅，台灣只有建立民主制度一途。以台灣民意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後，北京就會失去「黨對黨」談判的立場。民主政府的政策，是民意的直接反映。企圖以黨意代替民意，那只發生在獨裁的國家。由這個觀點來看，北京的統戰並沒有多大的意義。能使海峽關係發生作用的，當屬台灣民主運動無疑。

一九九〇、六、十三 聖荷西

## 兩岸談判豈可視同兒戲？

——駁斥梁肅戎的謬言

### 對等談判與兩黨談判

拒絕退職的國民黨立法委員梁肅戎、張希哲、穆超，以及國是會議籌備委員余紀忠，在六月十七日公開表示，現階段海峽兩岸的談判，以「黨對黨」方式進行，應為較可行的途徑。他們的談話，正好與李登輝的「政府對政府」的主張構成強烈的對比。在整整一個月之前，亦即五月十六日，國民黨立委丁守中為中國副總理吳學謙傳話，表示中共願與國民黨展開「黨對黨」的談話。對於這項提議，李登輝認為，「黨對黨不可以，要談就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政府對政府，雙方對等地位來談」。

梁肅戎背後所代表的非主流派，以及李登輝領導的主流派，在中國關係的問題上，已公開呈現雙方的分歧。李登輝提出對等政府的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只有在政府層面上進

行接觸，才有可能維護台灣主權與代表權的完整。梁肅戎之贊成「黨對黨」的談判，則是相當無可理解。梁肅戎認為，若以「國家對國家」，正會被人說是搞台獨，對我們有傷害；若以「政府對政府」，中共自認是中央政府，要把台灣矮化為地方政府，亦有不妥。因此，梁肅戎贊成應該進行「黨對黨」的談判。

國民黨對待中國問題的政策，無論是主流派或非主流派的主張，都頗有可議之處。不過，李登輝的政府對等接觸的主張，至少還兼顧了台灣社會的主權與尊嚴；梁肅戎在這種時候竟然還眷戀「黨對黨」談判的方式，這不僅是一種時空倒錯的主張，而且也是對台灣兩千萬人民的一大污辱。梁肅戎之所以主張「黨對黨」，理由極為冠冕堂皇，既可避開「台獨」的罪名，又可避開被矮化為「地方政府」。這樣的理由，似乎無懈可擊。

然而，梁肅戎忘記了一個事實，如果進行「黨對黨」談判的話，國民黨更加被矮化為為中共統治下的一個所謂「民主政黨」。在這種層面上進行談判，國民黨將被納入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裡，而與其他北京御用的「民主黨派」平起平坐。

梁肅戎即使記憶再壞，也不應該遺忘中共在六月十三日的攻勢，它在北京唆使政協的各民主黨派首腦，如「民盟主席」費孝通，「台盟主席」蔡子民等，表態支持江澤民所提國共兩黨談判的主張。在現階段，如果堅持要與北京做黨對黨的接觸，國民黨既不是代表國家，也不是代表政府，而只不過淪為中共領導下的民主黨派而已。梁肅戎非得如此自我矮化才甘心

嗎？

務實外交始自務實內政

拋棄黨政混淆的妄想

在國是會議來臨之前，梁肅戎諸人之所以迫切要表達他們的主張，無非是爲了延續既得的政治利益。香港《文匯報》在六月十四日公佈一項史實，那就是在一九五七年間，蔣介石曾經派遣國民黨立法委員宋宜山（即降將宋希濂胞弟）做爲特使，前往北京與周恩來談判。當時的談判中，中共允諾「台灣自治」，並仍由蔣介石統轄。這項史實，說明了國民黨內部的「黨對黨」談判，誠然有相當長遠的傳統。

自李登輝繼任總統的這兩年來，國民黨元老欲與北京掛鈎的企圖越來越顯著，從陳立夫、蔣緯國倡議以外匯支援中共，歷經熊玠爲北京中共領導人的傳話，一直到美國報紙揭露蔣緯國有意與鄧小平合作爲止，國民黨內部主張國共談判的傳統，可謂不絕如縷。

所謂「黨對黨」談判的主張，乃是一種黨意施暴於民意的心態。梁肅戎到今天仍然緬懷黨意至上的時代，仍然以爲國民黨單獨一黨的權力就可決定台灣人民的前途，這種倒退的思想豈是現代化的台灣社會所可接受的？在民意高漲的今天，國民黨能不能代表台灣都還是一個疑問，國民黨談判的能力也更是一個疑問。

退一步說，當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國民黨分裂之際，誰能代表國民黨也都成爲一個問題了。國民黨中央主張「政府對政府」的談判，國民黨非主流派則贊成「黨對黨」的談判，這種各說各話的局面，恐怕國民黨內部非得先進行「政治協商」不可。即使雙方協商成功，國民黨也仍然不能代表台灣人民。以梁肅戎本人爲例，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毫無代表性的「代表」。梁肅戎能不能代表他本人，又是另外一個問題。過去四十年來，梁肅戎耗費民脂民膏的最主要理由，是因為他要反共，甚至還要戡亂。在台灣人民勒令他退職的前夕，梁肅戎突然不再反共，不再戡亂，竟然還主張要「黨對黨」談判。這不就證明梁肅戎在過去四十年都在說謊？一個構築騙局的政客，他能夠代表誰？

在國民黨非主流派的十三全代表盛傳訪問北京之際，梁肅戎在這個關鍵時刻提出「黨對黨談判」的主張，是值得注意的。不僅如此，梁肅戎還以立法院台獨言論高漲爲由而拒絕退職。這種種動作，更加暴露其把持權力與違背民意的心態。歷史的巨輪是不斷前進的，人民的力量也是不斷上昇的，梁肅戎的言談看來是多麼可恥而可鄙。

一九九〇、六、十八 聖荷西

## 務實外交始自務實內政

### ——論沙烏地阿拉伯斷交事件

當一切都已太遲

沙烏地阿拉伯不會是最後一個與台灣斷交的國家。國民黨的斷交傳統，自一九七〇年就已經累積下來。只要國民黨繼續維持這個傳統，都不可能使台灣的對外關係起死回生。在國際社會，台灣的命運彷彿死刑犯一般，隨時等待宣佈斷絕邦交；即使再如何奔走遊說，也無法拯救。

面對沙國斷交的事實，外交部長錢復認爲，這次斷交並不是務實外交的結果，今後政府仍將朝務實外交努力。這種見解應該是正確的，如果不能根本性改造國民黨的政策方向，即使推出「彈性外交」或「務實外交」的方案，也絕對不能使台灣的外交出現轉機。

不過，錢復顯然也沒有提出更好的辦法，以補救當前政策的偏差。他說，未來外交工作

將全力以維護現有邦交國為重點，凡是不適任的大使都要換掉。如果這就是國民黨今後外交工作的重點，那麼可以預見的，台灣的死刑犯命運必然得不到任何改變。在現階段，台灣的外交門面，僅剩南韓與南非兩國可以支撐。究竟錢復有何辦法維繫這兩國的情誼，頗值得懷疑。

更換不適任的大使，就可使問題解決嗎？提昇外交工作人員的薪水與地位，就能夠使現有邦交國不會變心嗎？這種對整個國民黨外交結構毫無影響的調整，並不可能為台灣帶來新機。即使讓郝柏村擔任總統，即使讓錢復出任行政院長，這種陞遷又能對台灣命運產生何種作用？

總是等到一切都太遲的時候，國民黨領導人才搬出各種理由來搪塞。台灣就要進入二十世紀了，國民黨卻仍然保持二十世紀五〇年代的心態，不肯面對必須在台灣生根的事實，不肯面對全世界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實，不肯面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已經改變的事實。這種逃避，是死刑犯的逃避。國民黨等待的，只不過是清晨的一聲槍決。

### 務實外交始自務實內政

要改變這種日益頹廢的無助命運，國民黨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使台灣這個國家的主體性建

立起來。從當前權力人物的心態來看，他們只不過是把台灣當做租界地而已。所謂「台灣並非久安之地」，所謂「我愛台灣，但更愛大陸」，所謂「今日台灣人的多數是明日中國人的少數」，這些荒謬欺罔的言論，正是宣判台灣為死刑犯的做法。不能使台灣在國際社會站立起來，就已經妄想要「更愛大陸」，就已經要成為「中國人的多數」，請問，這不是投降心態又是什麼？

在政治學、社會學的領域裡，從來沒有存在過「一國兩府」的說法，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彈性外交」或「務實外交」的理論。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政府。所謂「一國兩制」、「一國兩府」、「一國兩席」、「一國兩區」的說法，是統治者合理化自身錯誤的一種遁詞。國民黨如果不能確立自己是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國際社會如何為台灣尋找正確的定義？

只有確立台灣是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之後，才有可能在國際社會找到立足點。現在，台灣能夠做的，便是優先在內政方面進行心理建設。

第一、加速取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的敵對行為。除了終止戡亂時期的法律條款之外，有關「中共空軍官兵起義歸來辦法」、「大陸民運人士來台定居辦法」等等製造緊張關係的陋規，都必須廢止。所有中國來台人士，都應先取得台灣的簽證。這種做法，在於承認中華民國的護照，使海峽兩岸的國際關係明朗化。

第二、加速改訂台灣的教育政策，對於偏重中國歷史、地理、語言的教材，應有所調整，

強化台灣學生對台灣歷史、地理、文化的認識。使年輕一代接受以台灣為主體國家的概念，以便迎接日後對外關係的任何調整。

國民黨從國內法與國內教育的改革做起，逐步使以台灣社會為主體的國家概念建立起來，台灣的死刑犯命運才有可能得到拯救。繼沙烏地阿拉伯之後，南韓、南非與中國的建交也就在不久。國民黨如果不把台灣當做久安之地，則不僅不能在國際社會苟活，即使在台灣社會內部，國民黨也只有等待清晨的槍決。

一九九〇、七、廿二 台北

## 李鵬外交對台灣的衝擊

### 彈性外交的解體

中國總理李鵬的東南亞之行，證明了台灣的彈性外交是不能推展的。從八月七日至十四日，李鵬先後訪問了印尼與新加坡，使中國在東南亞的政治地位再次獲得提昇。雖然李鵬被公認為去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劊子手，但是這種罪名並未妨礙他在外交工作上的努力。國際畢竟是講求現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擁有的幅員與資源，絕對不是國民黨以「代表中國」的宣稱就可替代的。

在歷史審判與現實政治之間，國際社會顯然選擇了後者。李鵬在東南亞不僅得到了禮遇，而且也成功地與印尼建立了外交關係，從而也為日後與新加坡的建交奠下了基礎。印尼、新加坡原來就沒有與台灣維持任何外交關係，因此，這兩個國家分別與北京建交並沒有絲毫的

政治包袱可言。不過，印、新兩國與北京的修好，卻對台灣的外交前景具有高度的暗示。

整個國際趨勢的發展是很明顯的，當冷戰結構在這一兩年中次第崩潰之後，各國外交再也不是接受霸權國家的操縱控制，而是依據各國的個別需要去發展自主性的外交。相對於這種客觀形勢的變化，國民黨的對外關係似乎還是停留在五〇年代冷戰的時期。當全世界開始尋求和解，建立自主性外交時，國民黨仍然還在堅持對抗性的政策，仍然還在「中國」的虛幻概念上支配對外的關係。

國民黨所謂的彈性外交，事實上是一種變相的「國獨」，也是坊間所說的「獨台」。在理論上，這種外交仍然不放棄對中國的主權；在實際上，則只不過是為了保護國民黨的統治利益。只要國民黨在「中國主權」的問題上糾纏不休，台灣對外關係就不可能有開創性的前景。北京在與沙烏地阿拉伯建交之後，又立即與印尼恢復正常化關係，這正可說明國民黨的彈性外交已失去轉圜的空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種政治現實的存在，國民黨如果不去面對，那就只剩一條絕路，絕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 國民黨的姑息逆流

每當其他國家與北京建交時，國民黨都一律指控這是國際姑息逆流促成的。這種指控，

全然罔顧客觀形勢的變化。在舉世滔滔之際，唯國民黨仍自囚於象牙塔裡。可以預見的，在新加坡與中國建交之後，南韓也就要與北京修好了，在未來一兩年，南非內部的黑人問題也解決之後，北京也將尋求與南非建交。這是必然的趨勢，不是任何言詞可以抵擋。

從這個觀點看來，如果有所謂姑息逆流存在的話，那並不是發生在國際社會，而是存在於國民黨的內部。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始終拒絕面對國際社會與台灣社會的現實，始終在落後的中國主權問題上做白日夢。這種做法不僅是姑息，而且是養奸。今日國民黨內已有一部分人發出敗北主義的聲音，開始企圖與北京勾結，企圖在保護既得的利益上犧牲台灣的地位。

要在國際社會生存的第一要務，就是要發展出有立場、有自主性的外交。放棄對中國主權的幻想，放棄對強權的依賴，而真在台灣社會尋找力量，否則台灣外交的命運將無可挽回。今年十月之後，北京必可藉亞運的舉行來洗刷天安門事件的血腥形象。國際社會是現實的，也是健忘的。每個國家不能遺忘的，無非是自身的利益。李鵬的東南亞之行，已證明這一個事實。國民黨的彈性外交，何時能轉化為自主性的外交？

一九九〇、八、十六 聖荷西



# 國民黨「大陸政策」的危機

## ——評郝柏村「一國兩區」的概念

### 「國統區」與「解放區」

行政院長郝柏村向立法院本會期提出的施政報告中，決定使用「一國兩地區」的概念，來處理台灣人民與中國人民之間的民事法律問題。這是繼「一國兩席」、「一國兩府」之後，國民黨針對大陸政策所設計的新構想；其目的在於避開政治層面的敏感性，以便界定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

郝柏村在提出這個構想之前，早就由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在七月國是會議期間先放出「一國兩區」的空氣，足證這樣的設計並非在這次施政報告中才定案的。對郝柏村來說，只要把台灣與中國變成地理名詞，則國民黨所要承擔的政治責任就可減輕。這種一再逃避現實、一再逃避責任的施政方式，正好可以反映出郝柏村的政治格局，較諸任何行政院長都還沒有氣

魄，也更沒有膽量。

國民黨對於「一國兩席」或「一國兩府」的解釋，從來沒有明白確定「一國」是指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只是以模糊抽象的「中國」來掩護國民黨的獨占政策，其重點是放在「兩席」與「兩府」之上。「兩席」是對國際社會而言，亦即在國際組織佔有兩個席位；「兩府」則是指對中國的政策而言，亦即海峽兩岸存在著兩個政府。這兩種說法，都是把台灣與中國放在對等的地位上，比起郝柏村的「一國兩區」的設計，至少還能維護台灣的立場，儘管這種政策是如何脫離現實。

郝柏村以為，地理名詞是沒有政治意義的，所以他才會別出心裁設想出「兩個地區」的說法。這種設計，其實既沒有前瞻性，也沒有歷史知識的基礎。如果郝柏村稍微了解現代史的話，就可知道「一國兩區」的說法，早就被中國共產黨使用過了。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從來就沒有承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體制；因此，對於國民黨的統治地區，就稱為「國統區」；對於中共革命根據地，則稱為「解放區」。

中共的「一國兩區」概念，是鑑於當時中國境內還未完全被解放，所以才創設如此的名詞。「國統區」又稱白區，也就是指白色恐怖的地區；「解放區」也稱為紅區，是用來概括中共的統轄範圍。這是因為中共知道自己還未建立人民所承認的政府，而國民黨則是被人民所否定的政府，所以才以「解放區」與「國統區」來劃定界線。

郝柏村的「一國兩區」，顯然也是在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北京提出「一國兩制」的政策時，非常清楚表示這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心，而以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來界定中國與台灣。郝柏村卻是以刻意的模糊來區分，把台灣與中國的相互關係倒退到「國統區」與「解放區」的時代。依此來看，台灣地區誠然是國民黨的統治地區；在這個地區裡，並不存在任何政府。

### 「一國兩區」的困境

自從海禁政策被台灣人民突破之後，國民黨的「大陸政策」一直是乏善可陳的。面對中國的外交攻勢之下，國民黨失去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承認。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國民黨也將失去南韓的外交關係。台灣的對外關係之所以日漸孤立，完全是由於北京政府的擴張所致。這說明台灣的外交政策與大陸政策是息息相關的，國民黨如果沒有明確的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就不可能在國際關係上有所作為。

國民黨如果繼續要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做文章，絕對不會得到明確的結論。在模糊不清的政治學基礎上，企圖制定外交政策或大陸政策，無疑是一種奢望。這次郝柏村創造的「一國兩區」，不僅又落入「一國」的窠臼，而且又避開政府層面不談，卻只把台灣視為一個

地區。這種政策等於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屈服。因為，北京從來不稱自己的統轄範圍是一個地區，它自始至終就是一個有法理基礎的政府。郝柏村的最新發明，等於是拭去了中華民國政府的人格，這真是值得回味的設計。

一個不存在任何政府的地區，竟然可制定法律來處理民事問題，這種情況應該是屬於權宜性的法律。在臺灣地區裡，國民黨法律的制定，並不是要面對現實，而是爲了蒙蔽現實。只要符合這個地區的統治方便，國民黨當然會不辭辛勞制定更多暫時性的條規。所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暫行條例」，完全不可能使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定位，更不可能幫助台灣開拓國際關係。這份條例，只不過是國民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藥方而已。

「一國兩區」的說法，可能會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因爲這比較接近北京「一國兩制」的策略。郝柏村貪圖一時的方便，反而把台灣帶入新的困境，這將使日後台灣的對外關係難有轉圜的餘地。對國際社會來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的兩個地區。因爲，北京從來不必避開政治層面來制定政策，只有郝柏村才具有如此空前絕後的智慧。這樣繼續逃避下去，據說就是爲了中國的統一，這是多麼豐富的想像力。

一九九〇、九、四 聖荷西

## 國民黨對中國的敗北主義

——據說鄧小平抨擊李登輝

### 上京告狀的效應

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已經發展到北京了。九月十九日香港《南華早報》報導，鄧小平在最近一次黨內元老和政治局委員的非正式會議中說，「李登輝的思想和行爲有提倡獨台的味道」。這項消息傳來，台灣總統府發言人郭岱君立即表示，「李登輝對中國統一的信念、決心與做法，是有目共睹的」。雙方的這種間接對話，究竟意味著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對李登輝的點名批判，這並不是第一次。自今年三月台灣總統選舉以來，北京對李登輝的態度，就改變了從前拉攏的手段，而改以批判性的抨擊。在此以前，中國領導人都利用居住於北京的台灣人，如吳克泰、蔡子民等人，儘量向李登輝喊話。他們透過同學的關係，透過舊日的情誼，對李登輝進行溫情式的政治統戰。

北京正式對李登輝表示失望，是在今年台灣總統選舉的前夕。中國態度的改變，一方面固然是李登輝在「中國統一」的立場上一直沒有積極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國民黨內部的反李登輝陣營的成員不斷赴北京告狀。這種上京告狀的工作，是兩年多來漸漸累積起來的。他們在北京對李登輝的指控，自然強化了中國領導人對李登輝的敵意。北京在今年三月會支持蔣緯國，進而公開譴責李登輝，無非是國民黨員告狀後所獲得的成就。

這次《南華早報》傳出鄧小平抨擊的報導，如果是事實的話，並非是出人意料的事。北京的對台政策，擅長使用縮小打擊面的分化手法，以達到「穩、狠、準」的宣傳效果。昇高對李登輝的批判，是今後北京的方針，其目的不外如下幾點：

第一、每過一段時期對李登輝點名批判，可以收到牽制效果，一方面逼李登輝表態，一方面使其不致部分偏向「獨台」的路線。

第二、更重要的是，讓國民黨內部的「親北京派」或反李登輝派得到安撫與補償的作用，既可使上京告狀的工作能夠持續不衰，又可使他們在心理上有一個「靠山」。

第三、對李登輝的警告，是對台灣內政干涉的具體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派出一兵一卒，國民黨在北京的恫嚇下，就已經屈服了，就已經慌亂做各種澄清解釋了。

## 國另黨慳中國內頗非主義

### 統一約合唱與民主的變調 中國只有鷹派路線

中國領導人只不過在非正式會議上發言，台灣的總統府發言人就必須立即公開彙報，向北京保證李登輝是「品學兼優」的，這種國格是怎樣的國格？這樣的主權是怎樣的主權？國民黨必須向它所宣稱的「叛亂團體」公開表明立場，則國民黨對台灣人民、對台灣社會持的又是什麼立場？

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政府，從來不敢以人民的力量做為它的後盾，卻反而持續不斷依賴敵人的力量來合理化自身的統治，無怪乎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權沒有信心，無怪乎國民黨的「親北京派」才膽敢放出如此的狂言：「今日台灣的多數，是明日中國的少數。」無怪乎北京道上會絡繹不絕出現國民黨黨員朝貢與告狀的行列。

因此，《南華早報》的報導是否屬實，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敗北主義的屈服心態。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和平關係，絕對不是建立在北京中共領導人的誠意之上，絕對不是建立在「一國兩府」或「一國兩區」的文字遊戲之上，也絕對不是建立在兩岸人民的文化與經貿交流的行動之上；要使台灣海峽和平的到來，必須是台灣當權者要有與中國領導人平起平坐的信心，要有自主自立的決心。以目前國民黨這種桎梏的心靈與敗北

的態度，不要說和平不會到來，中國還會更進一步，軟土深掘，予取予求。

台灣新聞界報導北京領導階層的結構時，往往以「鴿派」與「鷹派」來區分。這種劃分的方式，適足顯示台灣傳播媒體的幼兒症。在對台的政策方針上，北京從來沒有出現過「鴿派」，自始至終中國領導人走的都是鷹派路線。被視為保守派的陳雲、李鵬，或被視為改革派的鄧小平、趙紫陽，從來沒有偏離過「武力解放台灣」的基本原則。他們沒有動武，不是因為不願意動武，而是沒有能力出兵。

面對好戰的中國領導人，台灣當權者必須有應戰與決戰的信心。這種信心，不是來自國民黨內部的主觀願望，必須是建立在全體台灣人民力量的基礎上，才是正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平共存，是台灣對外關係拓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和平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不會從奴顏婢膝中出現；真正的和平，是有主權有國格的政府才能獲得。

一九九〇、九、十九 聖荷西

## 統一的合唱與民主的變調

——評李登輝、楊尙昆、郝柏村的談話

### 假象與錯覺

立法院在九月五日開議的第一天，就充滿了統一的論調與反對台獨的聲音。李登輝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訪問時，提出「一個國家，兩個實體」的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楊尙昆接受台北《中國時報》的訪問時，重彈「一個國家，兩個制度」的主張；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立法院做施政報告時，信誓旦旦強調「絕對不容許國土分裂的出現，將對台獨逆流予以制裁」。

李登輝、楊尙昆與郝柏村三人的混聲合唱，在現階段是值得注意的。北京爲了洗刷去年天安門事件的血腥形象，自今年以來就努力在國際社會打開新的空間。這可以從幾個事實表現出來。第一、北京刻意釋放異議學者方勵之，以換取美國貿易的最惠國待遇。第二、北京

相繼與阿拉伯、印尼建交，以證明它在國際社會並不孤立，並且也嚴重打擊國民黨的彈性外交政策。第三、北京在長考之後，終於與美蘇兩國站在同一立場，譴責伊拉克的侵略科威特；因此而獲得國際的正面評價。第四、北京積極對其國內鼓吹「亞運意識」，對外換取比賽友誼。在這種種努力之下，北京的天安門事件負面形象似已完全沖淡了。

就在中國重新突破國際封鎖之際，國民黨不僅未能固守自己的立場，反而還隨著亞運的音樂跳舞。台灣的媒體大量傳播亞運活動的盛況，不但協助中共擦拭天安門的血跡，而且也給國際社會一個錯覺，似乎台灣與中國之間已開始進入和諧、和解、和好的階段了。這種假象，必然使台灣在國際上的立足越來越困難。國際社會如果認為台灣與中國的和解就在旦夕，而國民黨又主張中國必須統一，那麼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際承認沒有理由不歸趨於北京。

楊尚昆在亞運期間，重新施放「一國兩制」的論調，可能如國民黨所說，是「沒有新意」的。然而，這種話說在天安門發生之後，尤其在國際的一致譴責之後，中國領導人對「一國兩制」的堅持就顯得意義特別新鮮。這種堅持的態度證明，無論中國國內的情勢與國際客觀形勢如何改變，北京「一國兩制」的政策完全沒有改變。

### 李登輝的錯亂脚步

中國的對台政策之所以沒有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領導人認為無需改變。因為，在「一國兩制」的攻勢下，國民黨的對外政策反而一變再變。李登輝就任總統以後，台灣的對外政策從彈性外交、雙重承認，一直到「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國兩體」的說法，都停留在文字魔術的演變階段。國民黨的大陸政策一改再改，兩岸關係法也一修再修，得到的結果卻只是在國際上的日益孤立。

李登輝對《亞洲華爾街日報》的答覆，可以說到了語無倫次的地步。他說：「在現實上，不可否認中國有兩個政治實體，但中國終將統一，但我無法預知什麼時候。」李登輝的這種表態，既是說給北京聽，也是說給國民黨的非主流派聽的。

誠如《亞洲華爾街日報》指出的，「李登輝在台灣出生，因此他在台灣及中國兩地均被懷疑有贊成台灣獨立的情結」。這項報導顯示，國際報人也知道李登輝是多麼可憐可悲。只因爲他是台灣人，所以他是有罪的。如果說李登輝有台灣獨立的情結，倒不如說他有一「台灣人原罪」的意識。他就任總統兩年多來的談話與措施，無不努力在洗刷他個人的原罪。李登輝早已被權力制約定型了，即使在面對外國報人時，他也是在澄清自己的罪名。

最可憐的是，談到「總統民選」時，李登輝更是支吾其詞。當記者問他是贊成總統直接民選，或是美國式的選舉人團間接選舉，李登輝回答竟然是：「我喜歡那一種方式並不重要。我不認為此時應該談此問題，以攪亂政治問題」。李登輝的談話，顯示他已失去言論自由了。被批鬥得體無完膚的李登輝，竟然以害怕「攪亂政治問題」為理由，拒絕回答總統民選的問題。李登輝談「中國統一」，就不怕發生問題，卻擔心「總統民選」的討論會發生問題，這是多麼怯懦、無能的總統。

「總統民選」是國是會議中的共同結論，李登輝曾經允諾要貫徹實施，現在居然連討論都不敢了。相形之下，郝柏村在立法院揚言要制裁台獨逆流，態度就強硬許多。郝柏村的言論，固然是說給台灣社會聽的，但更重要的，是在嚴厲警告李登輝，明白要李登輝必須壓抑自己的台獨情結。

楊尚昆警告台灣社會，郝柏村也警告台灣社會，李登輝就成了雙重壓力的「待罪羔羊」。什麼是憲政改革，什麼是總統民選，什麼是台灣民主，都在統一的混聲合唱中淹沒了。

一九九〇、九、廿六 聖荷西

## 台灣是國際的棄兒

### ——蘇聯與南韓建交的聯想

#### 朝鮮半島的啓示

整個世界形勢的演變，越來越證明台灣是國際的棄兒。蘇聯與南韓在九月卅日正式建立邦交之後，再一次暴露國民黨推行的彈性外交與「一國兩區」政策，絕對不能開拓全新的外交局面。如果國民黨仍然企圖停留在五〇年代的冷戰體制裡，仍然想要沈緬在「兩個中國」的美夢裡，將只有使台灣悶死在國際孤立的絕境。

冷戰體制的瓦解，始於一九七九年華府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自此以後，所謂共產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對立，就漸漸變成歷史名詞了。一九八九年，「蘇東波」的時代潮流衝垮歐洲的冷戰體制後，一個尋求和解、尋求恢復邦交、尋求建立新秩序的時代正式到來。在亞洲，這樣的變化也開始出現，如果國民黨不予以重視這種新的形勢，如果國民黨還要繼續

兜售所謂「一國兩區」的文字遊戲，則台灣就要錯過這種歷史上難得一現的重要契機了。在東北亞，蘇聯是這個和解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一九八九年五月，蘇聯的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簽訂「中蘇友好條約」，結束了一九六〇年以來兩國的敵對的狀態。緊接著，蘇聯也開始與日本提起歸還北方四島的問題。如今，蘇聯又與南韓正式建交，朝鮮半島的緊張形勢至此轉為緩和。

造成朝鮮半島緩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日本在最近派遣金丸信前往北韓，為日本在戰前的韓國殖民統治表示道歉；而北京也正式考慮即將在南韓的漢城設立辦事處。這些事實顯示，即使南、北韓沒有進行統一的工作，整個東北亞的和平局面已是隱然可見。南韓在五〇、六〇年代最辛苦的時期，從來沒有推行所謂的彈性外交與「一國兩區」政策。他們拋開「統一」的咒箍，積極努力開拓對外關係的空間，而終於造成今天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的和解時代也跟著到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李鵬，在八月與印尼簽下建交條約之後，就立即訪問新加坡。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北京與新加坡的建交也是指日可待。更值得注意的一個發展，就是美國與越南的和解。長達十年的越戰，以及十五年越戰結束後的仇視，並沒有使美、越兩國失去尋求和平的機會。美國的行動是一重要暗示，因為北京極有可能在美越和平之後，也會派人到越南商議兩國友好關係的重建。

### 停留五〇年代的台灣

德國、韓國、越南的情勢發展，說明了戰後冷戰體制已經成為歷史的灰燼。這三個國家在走向統一之前，都各自發展獨立的國際關係。他們從來沒有說要代表敵對的一方，也從來沒有以「正統」或「法統」自居。在統一的時機沒有到來之前，他們更從來也不會走入國際孤立的絕境。

台灣是屬於亞洲的國家，但是打開亞細亞的地圖來看，竟然沒有一個國家與台灣建立邦交；事實上，在整幅世界地圖上，能夠找到與台灣建交的國家，也變成一件極其稀罕的事。為了「代表中國」，國民黨把台灣搞得如此淒慘，讓台灣從世界歷史上擦拭淨盡，到今天居然還有顏面推銷強勢內閣、推銷中國統一的說法。新聞局長邵玉銘日前又殷勤舉行記者招待會，揮汗解釋「一國兩區」較諸「一國兩制」或「一國兩府」還要優越；彷彿國際關係在文情並茂的解釋中就可建立起來。

台灣與中國不是能夠統一，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台灣在國際社會沒有立足點的話，就沒有資格妄談統一。在國際組織裡，只見到國民黨忙於更改國號、國旗、國歌；台灣在亞銀的旗幟，就完全不同於亞運的；在奧運裡的「中華台北」，就完全不同於申請關貿總協



的「台澎金馬」。這種自我扭曲、自我矮化的事例，從來不會發生在德國、越南或韓國。

郝柏村獨創的「一國兩區」，是五〇年代「兩個中國」政策的翻版。當冷戰體制還未解凍之前，國民黨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政策；如今，國際間已經拋棄冷戰體制的心態，國民黨卻又堅決要讓時光倒流。然而，「一國兩區」的說法在台灣沒有市場，在國際也是沒有市場的。創造這種違背國際潮流的名詞，只是爲了使閉門構思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暫行條例」能夠偷渡成功。

同樣屬於反共國家的南韓，已經向中國、向蘇聯重新出發；唯獨自我囚禁的國民黨仍然蟄居在「中國統一」的巨夢裡。相對於國民黨的落伍與保守，民進黨在最近提出「我國主權不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的提案，是符合台灣社會格局的落實做法。民進黨也開始研擬憲政改革方案與「中國關係法」，這些構想是跨出白色五〇年代的第一步。國民黨寧可爲自己的利益，繼續在國際上孤立下去，使台灣成爲國際的棄兒。台灣人民不會允許這樣墮落下去的，有一天台灣社會一定會站起來的，國民黨就要變成歷史的棄兒了。

一九九〇、十、一 聖荷西

## 金門模式與國共秘密談判

### 「金門模式」的政治陰影

國民黨會不會與中共進行秘密談判，是長年以來的台灣政治陰影。隨著海峽兩岸紅十字會在金門的接觸商討，這個陰影似乎變得至深且鉅。國民黨立委張世良於九月卅日自北京回到台灣，傳達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副主任孫曉郁的談話，表示中國希望台灣能藉由紅十字會在金門對談的模式，進行討論成立兩岸中介團體。張世良在亞運比賽臻於高潮之際採取如此的行動，已使國共談判的事實呼之欲出。

張世良前往中國的身分是台灣游泳協會理事長。利用體育競賽的偽裝，而從事真正的政治交易，這是國共接觸的一個新模式。在過去，國民黨並非沒有與北京密談的先例；但是，那如果不是通過秘密管道，便是透過外籍人士，例如陳香梅、熊玠、李光耀等等，可謂不一

而足。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爆發，終於使自甘充當北京線民的國民黨員一一暴露身分。國民黨親北京派人士，一方面逼迫李登輝必須在「獨台」立場上表態，一方面則積極與北京拉關係。這一年來，國民黨日益向北京靠攏，日益仰賴北京的顏色，不就是爲了爭權奪利而造成的結果嗎？

張豐緒與李慶華在亞運之前遠赴北京，希望能堅持「中華台北」的名義。然而，亞運開幕以後，北京所有媒體都把台灣代表隊直呼爲「中國台北」。名稱被更改後，卻沒有聽到國民黨任何一位決策者提出抗議，李登輝默不作聲，郝柏村也噤若寒蟬。國民黨委屈求全地想擁抱「中華台北」的名義也不可得。國格喪失一至於此，國民黨竟然還在島內不斷製造各種叛亂罪名。長此發展下去，國民黨之成爲中共的附庸政權，幾乎就要變成事實了。

台灣與中國紅十字總會，於九月十一日在金門「仁愛之家」，就遣返偷渡到台灣的大陸客進行會商。代表國民黨的是，屬於軍方系統的律師陳長文；代表中共的，包括中國國務院對台辦公室樂美真，以及中國紅十字會的秘書長韓長林與總會主任張希林。雙方談判的過程，完全沒有對外公開。這種黑箱作業的方式，由於缺乏代表台灣人民立場的人士予以監督，使得這種接觸變成不折不扣的國共秘密談判。

### 秘密談判的嚴重性

就像這次亞運期間，北京刻意把「中華台北」改成「中國台北」，兩岸紅十字會接觸的「金門模式」，也將成爲北京所追求的國共談判模式。金門是屬於敏感的戰爭地帶，金門百姓的出入尚且受到國民黨法律的阻撓與騷擾，然而被國民黨視爲叛亂團體的中共官員，卻能夠在戰地自由出入。國民黨嚴格規定的「國安法」，以及自我宣稱的「三不政策」，就在這種接觸中失去了立足點。

金門模式的嚴重性，並不止於國民黨的自毀立場而已；它還有一個更爲深刻的暗示，便是國民黨已準備開門接受談判了。張世良自北京歸來所帶回的信息，顯示中國有意擴大金門模式；亦即把非官方的接觸，升級爲官方的談判。從張世良的傳信中，可以看出北京的動作：

- 第一、北京希望兩岸中介機構必須有公權力爲後盾，才能有效解決兩岸事務性的問題。
- 第二、國民黨擬議的「兩岸關係法」，如果沒有獲得中國方面的認定，這份法律形同虛設。
- 第三、台灣漁船在蘇聯被扣事件，北京已經循外交途徑與蘇聯進行交涉，在近日內台灣漁民、漁船將可獲釋。

北京敢於如此昇高姿態，便是因爲看清楚國民黨在這一兩年的退縮與讓步，也看清楚國

民黨需要北京的撐腰以維持在台統治。特別是國民黨在最近正高舉「中國統一」的旗幟，更使北京樂於順水推舟。在上述的三個問題中，北京對國民黨的誘導，是循序漸進的。從協助被扣的台灣漁民開始，北京有意在國際上造成台灣是中國內政問題的假象。與此同時，北京也要國民黨草擬的「兩岸關係法」必須經過北京的認定。此例一開，台灣的法律將置於北京的監督之下。「兩岸關係法」將從台灣的國內法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法。最後，北京又要求正在構思的中介團體升格為官方機構，從而通過這個機構鋪下國共談判的道路。

一九八七年華航劫機事件所引起國共雙方的接觸以後，國民黨在表面上雖然仍維持「三不政策」的立場，但是種種實際的行動卻完全與此立場背道而馳。李慶華利用體育的名義，直赴北京談判，終於使國民黨接受「中國台北」的國號。陳長文利用紅十字會的名義，在金門與中國官員談判，終於使北京食髓知味，而要求進一步官方的接觸。

台灣與中國的和解，有一天是必須完成的。但是，這樣的和解絕對不是依賴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來達成，而必須經過有民意基礎的政府來進行。然而，國民黨利用體育、紅十字會等等名義的掩護與中國從事政治交易，已完全背離台灣人民的立場。在這些接觸裡，雙方提出何種條件，達成何種協議，台灣社會完全蒙在鼓裏。有一天，北京突然宣佈台灣「天亮了」的事情，也不是不會發生。這樣繼續發展下去，台灣還有國防安全可言嗎？

一九九〇、十、二 聖荷西

## 還未收復的領土：釣魚台

### 對「國統會」的考驗

釣魚台是台灣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到今天還不能收復這塊島嶼，是台灣人民的恥辱。國民黨如果還要重蹈二十年前的錯誤，表現顛預無能的态度，則釣魚台就有可能在最近落入日本人手中。台灣北邊的國防，將因釣魚台的喪失而暴露致命的缺口。

釣魚台是台灣歷史上的傷口，這個小島的命運，其實與整個台、澎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釣魚台的地位未定，幾乎就等於是台灣的地位未定。因為這是日本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問題，國民黨應該解決而不去解決，曠日持久的結果，將使台灣人民更加看不起當權者的作為。

由於日本政府最近擬批准右翼的「日本青年社」正式在釣魚台上建立燈塔，台灣與日本之間的領土糾紛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在二十年前，爲了保獲釣魚台的領土主權，島內學生與

海外留學生投入大量的人力、金錢與時間。國民黨在當時從未表現任何國家的魄力，終於使學生大失所望。釣魚台運動的結果，支持國民黨的學生有不少轉而支持北京政府，這是所謂統派運動的歷史根源；而反對國民黨的學生也有許多人公開參加台灣獨立運動的行列。統獨之爭的糾葛，終於出現於戰後的歷史舞台。

國民黨以鴛鴦政策的態度來處理釣魚台的問題，結果並不能使歷史停止，也不能使釣魚台的問題消失。這個被掩蓋長達二十年的歷史傷口，終於又暗疾復發。當台灣人民要求收回釣魚台時，國民黨不可能視而不見，不可能袖手旁觀。國民黨果真強調「國家統一」，果真出現「強勢內閣」，勢非對釣魚台問題採取行動不可。

尤其是李登輝在十月七日召開「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又於十月十日發表祝辭，一再宣稱「中國必將統一」。那麼，面對近在咫尺的釣魚台列嶼，李登輝不應該默不作聲。國家要統一，應該先收回釣魚台。

李登輝曾對《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訪談記者表示，他對日本的擴張非常擔心。李登輝的這種擔心，並非毫無緣由。從兩個事實，就顯示日本有意擴張國力，一是日本將於明年收回北方四島，這是蘇聯鑑於日本經濟力的成長，也鑑於全球冷戰體制的瓦解，遂準備歸還北方四島，以與日本建立友好關係。一是日本國會開始討論修改憲法，以便使日本自衛隊能夠成為聯合國的和平軍隊進駐中東，這是日本在政治、經濟居於領導地位之後，又企圖在軍事上

返回國際社會。

台灣所面對的日本，不再只是經濟強國了，而是一個可能成為具有國際軍事干預力量的日本。倘然釣魚台落入日本人手中，則台灣北方海域即將憑日本海軍力量進出，對於台灣國防必然構成重大威脅。

### 對「強勢內閣」的考驗

當國民黨酷嗜宣揚「國家統一」時，也應該拿出手段與本領來維護台灣國土的完整。在二十一世紀到來之前，台灣如果要避免繼「日本經濟俘虜」之後，又淪為日本軍事俘虜，就有必要在釣魚台的問題上表現堅定的立場。倘然北京宣稱要侵略台灣是一威脅的話，則日本以實際行動佔領台灣領土，更是立即而明顯的威脅。

民進黨中央黨部在十月十二日發表聲明，指出「釣魚台列嶼是我國事實的主權領土」。這項聲明，代表了台灣社會的心聲，也是民進黨在十月七日通過「事實主權」決議案後的延伸。聲明指出，「行政院長郝柏村爭取領土主權的責任應大於整頓治安，尤其郝柏村出身軍人，軍方一直認為釣魚台列嶼為神聖領土。數十年來，軍方每年耗費百分之五十國家預算，現在該做點有意義的事了」。民進黨的聲明，對「國統會」、對郝柏村的「強勢內閣」都是一大挑戰。

不過，民進黨將不只是挑戰國民黨而已，並且也已向台北「亞東交流協會」遞交抗議書，同時將進一步發動民衆力量保護釣魚台。

受到民進黨行動的啓發，十月十三日國民黨非主流派的「反共愛國聯盟」、「歸國學友協會」，也與統派的「中國統一聯盟」暨美國的「保衛釣魚台基金會」結合起來，計劃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

從這些行動來看，民間的、在野的政治團體，無論其政治立場爲何，都一致強調釣魚台必須受到保護。國民黨在一切都變得太遲之前，不能再在這個問題上推拖下去了。台北外交部已表示，「目前無力與日本或美國就釣魚台主權問題爭取談判」，因爲台灣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內政部也說，「無法在釣魚台立國界碑」，因爲對安全問題並無把握。郝柏村則只是表示，將採「必要措施」，而此必要措施，只不過是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而已。

在「強勢內閣」的領導下，外交部與內政部都沒有具體的立場。國民黨關起門來時，總是宣稱「中國只有一個」，宣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但是，把門打開來面對國際社會時，就立刻表示「我國政府不被承認」。因此，鎮壓內部人民，國民黨總是綽綽有餘；面對外國力量，總是落荒而逃。現在釣魚台問題是立即的考驗，國民黨不能再逃避下去了。眼睛閉起來，白天還是亮著的。

一九九〇、十、十六 聖荷西

## 中國只有一個

### ——國民黨統一情結的糾葛

#### 「國慶祝辭」的信息

「中國只有一個」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基本共識，也是國際社會所共同承認的客觀事實。「中國」絕對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而是有政治體制、有經濟內容、有社會基礎、有國際人格的實體。這個實體，不能做抽象的推理演繹，不能放到虛無飄渺的時空。談到中國，一定是指在現階段存在於現實環境裏的中國。

李登輝在今年的「國慶祝辭」中說：「中國只有一個，應當統一，也必將統一。」他在國慶大會致詞中也同樣表示，「我們一向堅持：中國只有一個；我們一向肯定：中國必將統一。」在「中國只有一個」的立場上，李登輝的談話是極其正確的，也非常符合當前台灣海峽兩岸的客觀現實。「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際接受的中國，是聯合國成員之一的中國。

不過，李登輝所說的「中國必將統一」，這句話是無可理解的，對當前台灣的政治困局也是無所幫助的。因為，中國早就統一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內，中國在理論上、在實際上、在經濟基礎上已經統一。因此，李登輝說「中國必將統一」，其意涵乃是要把台灣的領土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如果這樣的理解是正確的話，李登輝的立場是有問題的。反過來說，「中國必將統一」的意思，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併入台灣的領土，那麼李登輝的談話是脫離實際的。基此，李登輝在「國慶祝辭」與「國慶致詞」所說的「中國」，顯然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概念中的「中國」，是抽象的，是從來不曾、將來也不會存在的中國。

選擇在國慶日的場合主張「中國統一」，是國民黨一貫的傳統。這樣的語言由李登輝來傳達，並沒有新鮮之處。換了郝柏村或林洋港來擔任總統，他們也一定講同樣的語言，因為這是要做國民黨領導人的最低錄取標準。不過，在國是會議結束之後，李登輝再三強調「中國統一」的立場，意義就顯得有些特殊了。

雖然李登輝在演說中也提到國是會議的「寶貴的共識」，但是他對總統直選的問題卻不敢觸及，而只是說：「國民黨為落實這些共識，成立了憲政改革策劃小組，積極研擬憲政改革工作，務期於預定期間內完成。」這透露了一個信息，亦即憲政改革是國民黨黨務的一部分，不是台灣全民的工作；憲政改革與「中國統一」銜接在一起，就可知道未來的憲政體制仍然還是以中國為中心，而不是以台灣社會為主體。

### 「統一」與台灣人民無關

如果憲政改革是國民黨的家務事，「中國統一」的工作就更與台灣人民毫不相干了。在人類歷史上，只有國民黨把憲政改造的問題當做黨務工作來辦理，也只有國民黨把「憲政改革」與「國家統一」銜接在一起。

以中國統一的藉口來縮小憲政改革的幅度，並且把人民的意願摒除於這樣的改革之外，國民黨可能稱快於一時，但是，經過這種關門主義所製造出來的憲政體制，絕對不會得到台灣人民的承認。沒有人民的普遍認可，國民黨閉門修改的憲法，仍然是臨時條款的體制，仍然不能擺脫四十年來憲政危機的陰影。

李登輝以總統身分的名義召開國是會議，並邀請在野黨、無黨籍人士，以及社會菁英參加，其目的在於協助他解決國民黨所面臨的政治危機。然而，國是會議結束以後，李登輝就未再提及他在會議中做過的承諾，反而又回到黨內，以處理黨務方式來處理憲政改革的問題。李登輝的這種做法，等於是失信於民，等於是背叛台灣人民的意願。他的信用，至此可謂全然崩盤。

可以預期的，直接牽涉到人民利益的憲政改革承諾都可以背信的話，則偏離人民利益更

為遙遠的「中國統一」，當然就變得無關緊要了。即期支票都可以公然跳票的話，還有誰會接受遠期的支票？自七月以來，李登輝一誤再誤，把「國家統一」置於「憲政改革」之前，又是成立「國統會」，又是四處宣揚「中國統一」，完全遺忘了今日台灣內部的政治危機。

憲政改革的工作既然已決定不讓人民參與，則所謂統一的問題自然就屬於國民黨黨務的一部分了。誰在台灣社會裏製造統獨問題，現在可以說不辯自明了。國民黨要在統一情結中

自我糾纏，國民黨必須設法自我克服，台灣社會將只有袖手旁觀。

民進黨在十月七日通過「我國主權不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決議案之後，台灣主權的定位，已經有更明朗、更清楚的解決方式。民進黨的決議，符合台灣社會的需要，也符合海峽兩岸的客觀形勢。這次民進黨也等於指出「中國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建立台灣的國格，就必須從尊重他國的國格做起。中國只有一個，台灣也只有一個，這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識。

一九九〇、十、十 聖荷西

## 國民黨的蒙古症

### 永遠的時光隧道

國民黨的蒙古症，在最近有病情惡化的趨勢。外交部長錢復於十月十六日在立法院表示，「聯合國早在一九五三年通過控蘇案，隨即立法院也決議撤銷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一連串的动作之後，外蒙古的公民投票已無法律基礎。因此，外蒙古仍為中華民國的領土，這立場至今仍未改變」。

外蒙古的問題之所以在最近變成熱門話題，主要有兩個背景，一是民進黨在十月七日通過「我國主權不及中國大陸及外蒙古」決議案，一是「全球蒙藏會議」即將在台北舉行，有兩位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學者準備赴台，國民黨要求他們必須比照「大陸人士入境辦法」，要先在第三地區獲得簽證。

對於民進黨提出的事實主權決議，國民黨完全無法提出有力的反駁，而只是在「不放棄中國大陸主權」的理論上反覆申述，並把這種事實主權等同於台灣獨立的理論。國民黨不能以事實、以法理、以國際承認來證明它是代表中國的，卻只能以想像來支持其中國主權的觀念。

對於外蒙學者入台一事，外交部一再重申不承認外蒙獨立的地位，甚至還像錢復宣稱的，外蒙古是「中華民國領土」。國民黨的堅定立場，並不能改變整個客觀的歷史。國民黨不能代表台灣，都還是一個爭議性的問題；現在竟然還要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外蒙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及人民。中華民國的偉大，可謂大而無當。

外蒙人民共和國所獲得的國際承認，絕對不是中華民國能夠望其項背的。外蒙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之一，國際地位遠遠凌駕於中華民國之上。外蒙學者所持護照，是具有尊嚴的國家人格與國際人格。除非這兩位學者自動放棄其護照，否則國民黨必須尊重其人格。這次他們計劃入台參加「全球蒙藏會議」，並不是為了支持國民黨的「中國主權」，而是站在蒙族立場來出席的。

國民黨拒絕其入境，固情猶可原；現在居然又要求變更他們的身分，視同「大陸人士」，這是對其人格的一大侮辱。錢復還進一步在立法院做歷史翻案的工作，宣稱當年外蒙的公民投票沒有法律基礎，所以外蒙古人民仍然是「中華民國國民」。沒有人民的同意，就沒有法律

基礎。公民投票本身，就是最大的法源。倘然公民投票還不能獲得法律基礎的話，則從未在中國與台灣實施公民投票的國民黨，其統治基礎就更值得懷疑了。

### 外蒙古與釣魚台

在外蒙古問題的立場上，國民黨的態度表現得堅定異常；但是，最近釣魚台主權糾紛發生時，國民黨對這個問題卻又表現出軟弱得近乎反常。對遠在天涯海角的外蒙古，國民黨能夠做出措詞強烈的宣稱；對於近在咫尺的釣魚台領土，國民黨反而表示，「基於主客觀因素，台灣甚難在國際公認立場上爭取到釣魚台主權」。

這一硬一軟的對外態度，顯示四十年來國民黨的雙重人格。在應該爭取的時候，國民黨總是畏懼退縮；在不必爭取的時候，國民黨就表現得理直氣壯。凡是牽涉到台灣人民的直接利益，從未聽說當權者據理力爭；對於一些無需耗費成本或不會動搖國本的事，國民黨必然推出堂皇之詞。因此，像「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外蒙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之類的語言，國民黨必然說得毫不吝嗇，說得慷慨激昂。因為，此等情事是遙遠的、不必兌現的。相反的，類似台灣漁民被扣、釣魚台被佔領等事，國民黨總是支吾其詞，顧左右而言他。

西藏流亡政府駐紐約辦事處新聞官員，最近與甫獲釋放的施明德討論西藏的主權問題。



他們表示，在台灣設立的「蒙藏委員會」不具合法性；在台灣所有的藏籍立委、國代都無權代表西藏人民。他們也明白表示，「中華民國主權」不及於西藏。

一個流亡政府尚且不承認國民黨的合法性與主權，則外蒙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又如何能接受國民黨的改變身分。台灣外交部不承認外蒙護照，其立場是可以成立的；倘然國民黨還要把外蒙問題當做「中華民國內政問題」，其心態，其格局，都不能符合整個世界演變的客觀現實。

對越遙遠的土地，對越遙遠的歷史，國民黨往往一廂情願耽溺於夢境中；對於在其統治下的領土與人民，國民黨也不能真正面對現實。把門關起來，中華民國就是最偉大的；這是典型的「蒙古症」與「自閉症」。

一九九〇、十、十八 聖荷西

## 釣魚台與「朝野合作」

### 「沒有想到」的外交

釣魚台主權問題的糾紛爆發之後，國民黨照例又推出「相忍爲國」、「朝野合作」、「一致對外」的說詞，理由是「國家處境日益艱難」。至於釣魚台是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國民黨並沒有以具體行動來表達立場；卻只是發表聲明與抗議，就算是對人民有所交代了。相形之下，日本政府在「維護領土」的問題上是相當堅決的。

同樣是爲了護土，日本派遣海軍自衛隊巡邏釣魚台，並且驅逐了前往繞島的台灣區運聖火船隊。釣魚台究竟是誰的領土，在這樣的行動上就已相當清楚了。國民黨在事後不斷宣稱確實派遣海軍護航，也宣稱絕對不許日本在釣魚台興建燈塔，這些文字上、口頭上的說詞，並不能改變國家尊嚴受到羞辱的事實。

國民黨在釣魚台的問題上之所以不能理直氣壯，主要是「中華民國」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郝柏村對外表示，將透過外交途徑與日本交涉，以解決這項領土糾紛。郝柏村的談話是空洞的，沒有實質內容的。在國際上，如果「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那麼所謂「外交途徑」根本是不存在的。這是最基本的國際常識，日本政府不會不了解這一點。

日本人在釣魚台附近的活動並非始自今日，台灣漁民在島嶼四週被武力驅逐也不只是發生在這一次。郝柏村不許這樣不許那樣，只是擺姿勢給台灣人看而已，在國際上完全不具任何意義。過去十餘年來，台灣漁民遭到日本自衛隊的驅趕時，台灣的軍隊何曾盡到保護的責任？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台上活動時，台灣的外交部何曾採取任何措施？

這次台灣聖火船隊前往釣魚台，完全是國民黨在幕後一手導演的。驅使人民為「中華民國」探險，原是國民黨最擅長的手段。成功的話，榮耀歸於國民黨；失敗的話，那是人民「自取其辱」。這種模式已發生在「大陸政策」之上，也發生在天安門事件之際，並發生在「民主女神」廣播船事件之上。國民黨利用人民來探測對外關係的虛實，原是無需訝異的。不過，這次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國民黨竟然在事先照會日本，告知日方將有聖火船隊前往釣魚台一事。

外交部長錢復在事後辯稱，日方曾經承諾不會干涉，他沒有想到日方會改變態度，甚至還驅逐我方漁船，日方反應實屬過當。原來台灣漁民前往「中華民國領土」，是經過日本政府

同意的。無怪乎在出發之前，國民黨籍的高雄市長吳敦義會做出「如果出事我負責」的保證。在又是照會，又是同意，又是保證的情況下，台灣漁民終於還是被武力驅逐。錢復沒有想到的事，多的是。

### 「朝野合作」的條件

釣魚台的探險行動失敗之後，郝柏村又立刻擺出強人的姿態，將要維護中華民國領土的主權，維護釣魚台的主權。郝柏村又說，朝野上下應團結一致，以理性、外交方式解決釣魚台問題。類此義正辭嚴的工作，國民黨是永遠不會缺少的；但是，這種做法只是更加暴露「中華民國」的領土與主權是有問題的。

國民黨在過去十餘年，未嘗在釣魚台的問題上表示堅決態度，卻突然於一夜之間挑起主權問題，乃是為形勢所迫。由於民進黨才在十月七日通過「事實主權」決議案，國民黨不得不在主權的問題上表態。沒有民進黨的施壓，國民黨寧可對釣魚台採取迴避的政策。

郝柏村在十月十九日答覆立委質詢時，還表示「沒有台灣主權，只有中華民國主權」。這是郝柏村把自己逼到牆角的一個例證，也是國民黨走投無路之際的一種詭辯。台灣主權是相當有明確定義的概念，它包括了台、澎、金、馬等實質領土的範圍，也包括台澎金馬人民在

這領土上活動、生存的權利。民進黨要確立這樣的主權觀念，爲的是要讓日後的憲政改革有一定的規模可循，與所謂統獨之爭毫不相干。

然而，國民黨卻不願就主權、領土的問題下精確的定義。使中華民國主權的觀念越模糊，國民黨所能承擔的責任就越小，台灣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發言權也就越小。凡屬中國大陸、外蒙古、西藏的土地，都屬於國民黨的業務。國民黨不必實際去管理，但國民黨可以利用這些遙遠的地區做爲拒絕改革的理由。

民進黨與國民黨的主權領土觀念是如此分歧，則「朝野團結」一詞就變成落空的說詞。國家權力既然操在國民黨手上，那麼保護台灣領土完整就是國民黨的責任，做爲在野黨的民進黨，當然有鞭策國民黨負起責任的義務。問題就出在國民黨並沒有「台灣主權」的觀念，而且也沒有具備國際人格的條件。

主權觀念不同，國際人格又缺乏，再加上缺乏外交常識，國民黨根本不可能在釣魚台主權問題上會有明確的態度。國民黨的立場是如此模糊，則所謂「朝野團結」就只剩下文字的意義了。空洞的辭令與空洞的國家人格，將阻礙國民黨與台灣社會的合作。釣魚台的問題，實在釣出太多的問題，這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一九九〇、十、廿五 聖荷西

## 當蘇聯不再是魔鬼時

### 通往北國的道路

國民黨企圖與蘇俄建立經貿關係，在最近已出現一些端倪。莫斯科市長卜波夫於十月廿七日飛抵台北訪問，爲台灣新聞界掀起了一陣蘇聯熱。這種罕見的現象，距離一九七〇年外交部長周書楷「要與魔鬼握手」的談話，整整二十年；距離一九八八年國民黨的派遣赴蘇商務考察團，也整整有兩年。這條通往北國的道路，是漫長的，也是不樂觀的。

只因爲有一位蘇聯的市長來訪，台灣政界、報界就陷入如痴如狂的狀態，這正好顯示台灣在國際社會上孤立情況之可憐與可悲。不僅如此，各式各樣的推理演繹也紛紛出籠，彷彿是務實外交的一大勝利。在海外代表國民黨聲音的《世界日報》，甚至還在十月廿九日發表社論宣稱：「今後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的逐步開展，與東歐各國關係的繼續增進，不僅是務實

外交、彈性外交的成就，更是對外關係的大突破。」這種近乎夢囈的想像，十足反映國民黨坐井觀天的悲情。

台灣與蘇俄的絕緣，是蔣介石、蔣經國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德政。從「反共抗俄」口號的提出，到《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出版，是蔣介石主持反俄、仇俄的最盛時期。蔣經國當權時，由於他的留蘇背景，曾一度使國民黨內部有浪漫的幻想。蘇聯軍艦的通過台灣海峽，俄國記者的訪問台北，都曾經發生在蔣經國時代，這引起了國際的矚目。

蔣經國的俄國管道之所以沒有建立起來，主要是北京恐嚇的結果。北京曾經警告，如果台灣宣佈獨立或聯結蘇俄，中共極有可能武力犯台。這樣的威脅，迫使蔣經國不得不公開他對外國關係的三原則，亦即「不獨立，不聯俄，不談判」。蔣經國的這種做法，開了國民黨此後必須向北京表態的先例，也使台灣對外關係必須俯仰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鼻息。

國民黨立委的陸續前往北京朝貢，以及這次莫斯科市長的訪台，已經使蔣經國立下的「三原則」發生了動搖。所謂「不聯俄」與「不談判」，國民黨已積極在進行了，至於「不獨立」的原則，國民黨則是只做不說。這些事實證明了過去四十年來台灣之所以在國際社會難以立足，全然是國民黨本身的阻撓與劃地自限。

## 當蘇聯不再是魔鬼時

### 無需膨脹蘇聯關係

外交部長錢復在廿九日答覆立委質詢說，台灣與蘇聯發展關係沒有設底線。錢復的說法，暗示了國民黨對蘇聯存有幻想，便是如果雙方能夠發展到建交的話，國民黨也是樂觀其成的。他還進一步表示，對於中共威脅如果國府打蘇聯牌就要武力犯台一事，「國人用不著懼怕中共的恫嚇」。

當年蔣經國提出「不獨立」與「不聯俄」，為的是懼怕中共的軍事侵略。如今，錢復在「聯俄」的立場上能夠站得如此堅定，則可以預見的，朝向「獨立」的道路也並不是那麼崎嶇困難了。以北京的恫嚇語言來保持統治利益，是國民黨壓制台灣社會的長技。錢復的談話，等於揭穿國民黨長期以來的欺罔真相。他現在能夠清除北京的魔障，無疑是一種心理復健。

然而，台灣並不可能因此就幻想與蘇聯建立更上層樓的關係。最主要原因，國民黨的外交政策仍然有障礙存在。「代表中國」的立場如果不能改變的話，不要說與蘇聯建交是不可能的，即使與其他國家恢復友邦關係也是不可能的。何況，去年莫斯科才與北京簽下了友好條約，蘇聯不可能對台灣有任何重視之舉。對於莫斯科市長的訪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已在十月廿九日發佈了一份聲明：「我們堅決反對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與台灣發展任何關

係或交換官方性質的討論。」這些客觀因素，絕對不是國民黨的能力足以克服的。

障礙還不止於此，因為來訪的卜波夫是屬於反對黨的成員，其反對領袖葉爾欽正是當政者戈巴契夫的政敵。國民黨欲透過反對黨的管道來建立正常關係，實屬不可能。因此，對蘇聯關係的發展，國民黨無需過於一廂情願。只由於一位市長的到來，就遺忘了與沙烏地阿拉伯斷交的教訓，就遺忘了新加坡與北京建交的事實，就遺忘了南韓與中國互設辦事處的行動。在全盤皆輸的局面下，務實外交還有什麼勝利的滋味可嚐？

台灣對外關係的重建，並不可能從虛幻的「務實」之夢做起。在憲政改革還未真正落實之前，在台灣民意還未伸張之前，台灣絕對不會出現務實的外交。在現階段，台灣的外交工作仍然只是屬於國民黨黨務的一部分，實際上與台灣社會並沒有掛鉤。國民黨的黨務已惡化得零落不堪了，對外關係就沒有明朗的前景。真正的魔鬼不是蘇聯，而是國民黨本身。

一九九〇、十、卅 聖荷西

## 唯有民主才有國防

——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的想法

對於中共武力侵犯台灣的可能性，台灣國防部在日前發表評估。國防部次長在十一月十四日的立法院稱，中共可能因伊科戰爭產生之鼓誘，助長武力犯台的決心。國防部又說，中共將調整原先的海空封鎖，改為對台外島進行奇襲，再採以戰逼和的方式進行。

國防部的這項評估，是值得重視的。台灣當前最大可能的外敵，當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疑。伊科戰爭在八月二日爆發時，北京的中共領導人遲遲不表示態度；最主要的原因，不僅是中共是伊拉克的長期軍火供應商，而且伊拉克以大吃小的方式，頗近於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模式。北京終於在八月七日才譴責伊拉克的侵略行爲，乃是爲了從美國及其他大國獲得最惠國的待遇。中共由於對伊拉克有譴責之舉，果然換取了國際集體制裁措施的取消。因此，伊科戰爭的最大受益者，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不但洗刷了天安門事件以來的血腥形象，並且還得到各國的貸款與經貿關係。

中共反對伊拉克出兵侵犯科威特，並不表示從此對台灣就不再存有覬覦之心。相反的，

北京外交形象的改變，正是中國對台政策的最好偽裝。當國際社會對北京印象最好的時候，可能就是中共出兵攻打台灣的最佳時機。所以，台灣國防部最近提出的海峽評估，並非是沒有根據的。

中共要不要犯台，並不只是決定在台灣本身的安定與否，同時也是決定於北京領導人的政治需要。四十年來，國民黨對台灣言論思想的箝制，總是以北京的武力陰影做為雄辯的基礎。事實上，中國如果沒有政治需要的話，即使台灣發生何等變化，北京仍然還是按兵不動。同理可證，即使台灣社會全然聽命於北京的指揮，如果中共領導人有政治需要，還是會藉各種理由發動攻擊的。

北京出兵攻台的模式，根本無需借鑑於伊科戰爭。早在一九八五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北美研究所所長李慎之（現在已被整肅下台），就已提出一篇論文表示，台灣內部發生不安時，用武力奪取台灣，動作要快，國際就來不及干涉了。這裡說得很清楚，在國際不能干涉的情況下進行武裝侵略，正是今年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模式。

在長期面對中共武力恫嚇之下，台灣社會必須有健全的心理準備。然而，健全的心理準備並不意味台灣人民有必要犧牲言論自由或思想自由。國民黨在最近十年來，不斷重複中共攻台的可能行動。在做這種宣傳同時，國民黨總是毫不掩飾地對台灣民主運動大事鎮壓。台灣社會還未接觸外敵之前，早已飽受台灣內敵的欺侮。當國民黨受到民主聲浪的壓力時，

就會及時發出中共武力犯台的宣傳。

今年國民黨發生二月政爭的風潮時，台灣報界立刻發佈一條消息說，中共正恢復福州軍區的設置。事後證明，中共從未有成立福州軍區之舉。最近民進黨通過「事實主權」決議案之後，台灣報紙又發佈消息說，中共正集結一萬五千名會講閩南話、穿台灣軍隊制服的部隊，進行大規模戰爭演習。這樣的消息，中國國務院已正式否認，認為這種報導「既不確實，也不負責任」。

從這兩次例子，就可以了解國民黨擅長製造各種謠言來維持台灣的「安定」。所謂「安定」，便是國民黨準備武力鎮壓台灣社會的一個警訊。

中共確實有犯台的可能，但是國民黨不能永遠自甘停留在「狼來了」的製作之上。國民黨對台灣社會的恐嚇，暴露本身既有「恐共症」，又有「恐台症」。這種併發症，只在證明國民黨對自己是相當沒有自信心的。

國民黨要祛除恐共症的最佳辦法，絕對不在於國防部應增強硬體，也不在於改善軍隊的軟體，最重要的是健全台灣的民主政治。國民黨對台灣沒有信心，乃是因為它一直不能得到強有力的民意支持；國民黨沒有民意基礎的主要原因，則是因為它長期違背民主精神與憲政精神。在這種孤立的情況下，國民黨只好時時依賴外敵侵犯的恫嚇，以維持在台的統治。

中共的福州軍區或是傘兵演習，絕對敵不過台灣全體人民的共同力量。國民黨製造各種

謠言來鎮壓台灣社會，最後一定會被揭穿謊話的。台灣的最大憂患是內敵，而不是外敵。民主是祛除內敵的良方，是國防的最好保證。國民黨要拯救自己的最佳途徑，就是不要使自己淪為人民的公敵。

一九九〇、十一月、十七 聖荷西

## 利益的橋樑·民意的堵牆

——「海峽交流基金會」的可疑角色

### 從捐官到買辦

滿清的官僚制度發展到了末流，就出現了捐官制度與買辦制度。凡是鄉紳捐給官方足夠的錢額，不必經過文官考試，就可獲得一官半職。腐敗的政府藉此可以賺錢，鄉紳也因此得到半官方的地位。買辦制度，則是為西方與中國之間貿易的一種中介機構，買辦為洋行和中國商業的交流提供必要聯繫。這種買辦制度發展出來的行商，最後就獨佔了對外貿易的巨大利益。

十九世紀出現的瓊記洋行、旗昌洋行、怡和洋行，是眾所周知的買辦貿易組織。他們最後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只在經濟活動方面產生作用而已，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也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晚清的鄭觀應、盛宣懷，都是最顯明的由買辦變成資本家，又變成官僚的例子。

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的台灣，一種新的捐官制度與買辦制度也開始形成。最近成立的「海峽交流基金會」，便是國民黨爲了擺脫它在大陸政策方面所應承擔的責任，遂設計一種所謂的民間中介機構，來處理中國與台灣之間的貿易文化交流事務。凡是資本家、財閥能夠捐出一筆龐大的金錢，就可在這個中介機構裡謀得重要職位。國民黨的資本家兼中常委辜振甫，能夠出任「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董事長，絕對不是偶然的。這個基金會以民間財團法人的形式做爲掩護，代理國民黨難以出面掌理的事務，代辦兩岸人民入出境與經貿的工作。一個現代版的「買辦洋行」，至此宣告成立。

由於它是「民間」的買辦機構，因此可以逃避民意機構的監督。由於它將承辦對中國的貿易事務，因此可以壟斷海峽商業交易的巨額利益。國民黨設計出來的這種捐官與買辦合一的制度，完全不必負起任何政治責任，但又可以爲其大陸政策找到出口。

行政院長郝柏村說，這個基金會的功能，不僅在於保障兩岸人民往來的順暢，並且也是兩岸邁向統一過程中一項關鍵性的步驟。他說：「它是海峽兩岸之間的一座橋，而不是一堵牆。」這是可以相信的，因爲通過這個中介機構，兩岸統治者的利益終於能夠結合起來；再也沒有第二個橋樑能夠證明，台北與北京的統治者心態是多麼一致。

### 沒有立場的中華民國

就像清朝的買辦制度那樣，買辦最後主導了對外貿易的方向，「海峽交流基金會」將可優先獲得對中國的海運權、航行權、貿易權、投資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直接通航，在九〇年代期間將會開放。國民黨在「三不政策」的禁律下，禁止民間與中國建立直接接觸的關係。所以，一旦通航開放之後，與這個基金會相關的利益團體必定比任何民間機構還更早得到特權。

在過去四十年來，海峽兩岸的秘密、間接貿易，完全由國民黨一手獨佔。在民間的壓力下，國民黨不得不開放門戶。爲了維持長期以來的壟斷利益，也爲了顧及國民黨本身的政治立場，基金會的設計乃應運而生。

行政院在十一月廿二日成立一個沒有法律基礎的「大陸委員會」，就立即宣佈要將九十三項事務性的業務分批委託給海峽交流基金會。從業務性質與項目來看，它與「亞東交流協會」、「北美事務協調會」並沒有兩樣。不過，亞東交流協會與北美事務協調會，是經過雙方政府正式同意設立的。現在成立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完全是國民黨片面的意願；既沒有得到國會的立法，又沒有得到北京對等的回應。這種做法，純粹是要逃避國民黨所自稱的「中國代表



權」，也純粹是要逃避「中華民國」的主權立場。

行政院趕在「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制定之前，就設立這個基金會，是有其理由的。郝柏村顯然是擔心李登輝的「國統會」將搶去他的權力，而且也擔心其他國民黨立委的兩岸團體分散其專利。

李登輝的「國統會」，似乎已經發展到如何設計與中共談判的問題。李登輝如果在大陸政策上佔了上風，郝柏村在未來與中共談判的發言權將被削弱。同樣的，國民黨立委成立的兩岸團體，包括張平沼的「兩岸商務協調會」、張世良的「兩岸工業協會」、丁守中的「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已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一定的管道。如果行政院再不設立基金會的話，其他買辦機構就有可能搶奪其既得的利益。

從「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設立，就可發現中華民國越來越沒有政府的立場，它所暴露的是一個買辦政權的立場。在中國主權的問題上，國民黨既沒有台灣民意的支持，也沒有中國民意的基礎，中華民國已經淪落成爲一個利益團體了。

一九九〇、十一月、廿四 聖荷西

## 政治問題豈能用文字解決

### ——評所謂的「國家統一綱領」草案

#### 「中國」是被架空的名詞

李登輝所領導的「國家統一委員會」，爲考慮宣佈終止戡亂時期以後兩岸的新形勢，目前正閉門草擬所謂的「國家統一綱領」。草案中值得注意的字眼，便是「中國」與「政治實體」兩個名詞的使用。國民黨在台灣建立一個政權已經超過了四十年，對於國家的定義到今天還是不能明確掌握。在面對「統一」的問題時，也只能耽溺於文字遊戲之中來逃避客觀的現實。

戡亂體制的存在，使得國民黨無需費力就攫取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利益與資源。在民主運動的壓力下，戡亂體制終於不得被迫要放棄。然而，台灣人民逼迫國民黨終止戡亂時期，目的在於使台灣成爲真正公平、開放的社會。李登輝成立的「國統會」，並沒有依照台灣人民所要求的方向去做，反而還是依照國民黨既得利益的需要，設計如何使舊有的戡亂體制獲得

全新的包裝。

在過去四十年中，國民黨從來沒有一天是實際從事「戡亂」工作的。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叛亂團體」，只不過是為了反證中華民國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對於北京政權，國民黨並沒有能夠動搖絲毫。真正受到「戡伐」的，是台灣人民的人權、生命與尊嚴。在台灣，「中國」是一個欺負人民的虛構名詞。在人權方面，國民黨使用「中國」來剝奪人民的自由、剝奪人民的親情、剝奪人民生存的權利。在思想方面，國民黨利用「中國」來施行黨化教育，來封鎖台灣人民對整個世界形勢的認識。今天台灣教育會呈現荒蕪貧困的一面，正是國民黨濫用、誤用「中國」之後而產生的惡果。

這樣一個「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經過了四十餘年對人民的欺負與欺罔，終於還是要再重申一次「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然而，「中國」是什麼呢？「大陸」的定義又是什麼？對於這些問題，「國統會」並沒有具體的答案。如果「國家統一」是可以欲求的，能夠實現的，所謂的「統一綱領」就必須寫得清清楚楚。只在文字上寫下「中國」兩個字，就宣稱是追求統一。這種做法，只是把過去四十餘年不負責任的態度繼續延伸擴張罷了。

從現實條件來考察的話，就可發現戡亂體制消失之後，中華民國是不可能再代表中國了。

「中華民國」這個名詞，如果有具體內容的話，那也只是台、澎、金、馬而已。

### 「國家」定義有待統一

既然是要在台澎金馬的土地上立足，則「統一綱領」必須清楚揭示，「中國」乃是一個理想的、抽象的名詞，在現階段的現實中並不存在。被架空長達四十餘年的「中國」，用來做為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早已證明是行不通的。在國際社會，在台灣社會，「中國」已越來越失去其說服力。倘然要找出「中國」的真正內容，則必須將之與以北京為首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起來。對國際人士與台灣人民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具體而落實的中國。

中國絕對不在台灣這一邊，而是在海峽彼岸。在這種現實的考驗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僅僅是「政治實體」而已；它具備了國格與國際人格。「國統會」既然在條文中明白寫出：「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的政治實體，以建立良性的互動關係」；那麼，綱領草案就不能避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不尊重北京的國格，否定對方的國家名稱，又如何能夠建立「良性的互動關係」？

現在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未來是否能夠與中國統一，而在於「中華民國」能否在台灣立足？這不是用文字可以解決的，國民黨必須以更嚴肅、更實際的態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在過去，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是一條線等同起來的。在台灣受教成長的青年學生，都是這樣被灌輸的。但是，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國際承認，而中華民國被

排斥以後，台灣社會裡的國家認同便開始分裂了。國民黨本身也因為派系的惡化分裂，黨的成員對國家認同也產生了分歧。今天，台灣內部的國家定位問題，已更迫切考驗著每個人的思考。

中華民國不能成為台灣人民一致認同的國家，將是一個越來越不能逃避的一個問題。國民黨在設計「統一綱領」草案時，只想到如何與對岸如何互惠，卻從未考慮到如何與台灣人民互惠。國民黨如果不能與台灣人民互惠，則「中華民國」只不過是國民黨政治利益的代名詞。確切一點來說，「中華民國」也只是用來剝奪台灣人民的人格與國格的工具而已。

「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之不能生存，已是無需辯論的事實。台灣人民的國際人格，在國民黨壟斷政治利益之下，早已遭到埋葬。戡亂體制終止之後，台灣人民是不是願意與國民黨繼續陪葬下去，是很值得懷疑的。「國統會」提出的「國家統一綱領」，並不能解決台灣的未來出路。文字中的「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接受，台灣人民也不會接受。因為，北京找不到他們的國家，而台灣人民也找不到他們的國家。草案裏出現的「維護兩岸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其實都是在維護國民黨早已攫取的利益。

台灣內部的國家定義還未清楚之前，就奢談「中國統一」。這種矇騙、虛偽，必定經不起人民意志的考驗。「國家統一綱領」寫得再完備，再周密，「中華民國」仍然是一個空洞的名詞。

一九九一、二、二 聖荷西

## 勿以「停火協議」掩護國共談判

### 談判時機言之過早

郝柏村在二月十二日的年終記者會上，回答有關戡亂時期終止以後中共的定位問題時說：「我認為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並不表示放棄反共的基本國策，也不表示交戰狀態停止。」郝柏村的答覆，相當模糊不清。因為，國民黨的「基本國策」，在過去四十年中已有多次更迭；所謂「反共」的立場，既不符合國民黨的現狀，也不符合台灣社會的現實。至於海峽兩岸處於「交戰狀態」的說法，更是一種脫離政治現實的反映。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政經交流日益昇高的今天，郝柏村仍然熱心宣揚「反共國策」與「交戰狀態」，不免是時空倒錯的。

那麼，郝柏村談話的重點究竟在什麼地方？他說「所謂交戰狀態，就是金門隨時有砲戰的可能，或是有空襲警報，如果雙方要終止交戰狀態，就要有正式的停火協議。」把「停火協

「放在交戰狀態的脈絡裡，才是郝柏村談話的用心所在。自金門紅十字會談判以降，國民黨與中共兩黨之間的接觸已正式建立起來。這種初步的會談，由於雙方都以「紅十字會」的名義接觸，談判的內容又以「交換偷渡人口」做為偽裝，他們的會談究竟涉及怎樣的範圍，至今仍難獲得澄清。

在金門談判之後不到半年，郝柏村就提起「停火協議」的構想，這不能不啓人疑竇。國民黨立委張世良，在去年九月卅日訪問北京返台之後，就替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副主任孫曉郁傳話，表示中國希望藉金門十字會談判的模式，與國民黨進行討論兩岸中介團體設立的問題。從一九八六年的「兩航談判」，到一九九〇年的「金門談判」，國民黨正加速昇高與北京的官方接觸。在沒有民意的監督之下，國民黨在談判中的行為動作，都是不能獲得信任的。

現在郝柏村再次強調海峽的「交戰狀態」，只不過是為了引出「停火協議」的構想。從表面看，「停火協議」的說法，極其冠冕堂皇；但實際上，郝柏村只是用來掩護兩黨談判的企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九年與美國建交以後，就已經廢除了福州軍區，並且也從金門、馬祖的對岸正式撤軍。十年來，台灣海峽的和平狀態，遠勝戰後的任何一個時期。尤其是全球冷戰體制的瓦解，交戰的條件已日益消失。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有備戰狀態；但不能因為台灣在備戰之中，就可宣稱這是「交戰狀態」。以戰爭的陰影來恐嚇台灣社會，進而控制思想、控制資源，這是國民黨統治的伎倆。

### 談判不是國民黨的事

郝柏村企圖以「停火協議」的面具，來掩護國共談判的進行，是顯而易見的。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國民黨要與中共談判？從其迫切的程度來判斷，國民黨內部正遇到很大的困難。

爲了配合戡亂時期的終止，國民黨必須訂立許多新的法律與機構。但是，國民黨提出的種種構想，都一再遭到中共的否決。從兩岸關係法的草擬，中介團體的設立，海峽交流基金會的組成，「一國兩府」或「一國兩區」的主張，一直到最近「國家統一綱領」的推出，北京的中國領導人都再三予以抨擊並否決。如果這種構想要得到北京同意的話，恐怕非得通過雙方的談判不可。

「兩岸人民關係法」的草擬，已歷時一年多，至今仍然不能定案。同樣的，國民黨提出「一國兩府」或「一國兩區」的說法，也已超過半年，結果也難以贏得北京的首肯。國民黨「大陸政策」的制定，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完全不符現實需要。要使「大陸政策」定案，國民黨似乎有必要與北京談判。

然而，「國共談判」一詞正式提出的話，必定引起台灣社會的騷動。郝柏村以「停火協議」來包裝，當可避過世人的耳目。這是國民黨之所以強調「交戰狀態」的根本原因。只要國共

官員正式接觸之後，談判範圍必將隨之擴大。這樣的談判，一定是依照兩黨的統治利益去進行。果真如此，台灣人民權益的受害，將不堪設想。

國民黨在最近一年的統治，已越來越困難。它的「統一綱領」既得不到中共的承認，它的「憲政改革」也得不到台灣社會的支持。對內對外，都同時陷於兩難之中。因此，以「國共談判」方式來尋找出路，並非是不可能的。

對於中共的一再退讓，是國民黨發展出來的趨勢。其國策從「反攻大陸」變為「光復大陸」，從「光復大陸」變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又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變成「和平、均富、民主統一中國」。國策不斷在變；唯一不變的是，台灣人民不斷受害、不斷受到「戡亂」。

現在，郝柏村又說要與中共談判，直接受害的必是台灣人民無疑。

兩岸交流或兩岸談判的問題，絕對不屬於國民黨的黨務。若以為「停火協議」就可解決國民黨的困境，那是過於樂觀的想法。國民黨不願與台灣人民和解，不願落實制憲改革以贏取人民支持，卻反而選擇與中共接觸來引起人民猜忌。國民黨的困境，必更加惡化了。

一九九一、二、十四 除夕於聖荷西

## 台灣的政治實體與政治虛構

### ——論北京對國民黨「中共定位」的回應

#### 「台灣當局」的統一綱領

由於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的日子即將到來，國民黨內部正陷於舉正無措的局面。對內而言，「憲政改革」的工作，已經引起國民黨派系的紛爭與決裂，也引起整個台灣社會的憤怒與不滿。對外而言，視中共為「叛亂團體」，在過去乃屬於國民黨統治基礎的重要一部分；在「戡亂」時期結束後，國民黨有必要構思新政策來合理化今後的統治地位。

為了應付新形勢的出現，李登輝領導的「國統會」在設計了「統一」三階段之後，終於開始考慮到要如何來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如果在草案中直呼其國號，則不僅有「放棄大陸主權」之嫌，「中華民國」即使沒有淪為地方政府的危險，至少也有可能遭到製造「兩個中國」的指控。

「國統會」決策者，據說將選擇「中共當局」或「北京當局」一詞做為解決之道。這樣做的原因，乃是由於中共統治中國是一個事實，是一個「政治實體」；因此，根據國際法的慣例，使用「北京當局」或「中共當局」是屬於中性的稱呼，既含有避免正式承認的意味，也使兩岸關係的發展可以建立在「對等」的基礎上。

從這個巧妙的設計，國民黨似乎可以擺脫許多政治上的包袱。不過仔細考察的話，就可發現不少虛構的成份。「國統會」引用國際法的行為，等於是暴露一個事實：台灣與中國之間存在的是一種國際關係，而不是內政關係。如果海峽兩岸的關係屬於國際關係的層面，則北京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台灣則是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國民黨不敢直呼北京的國號，實在是因為牽涉到它在台灣的合法地位。所以，以「北京當局」稱呼北京，然後以「台灣當局」自居，其用意是很明白的，這完全是為了掩飾國民黨的心虛。

美國政府在一九七九年制定「台灣關係法」時，就完全拭去「中華民國」的稱呼，而改用「台灣當局」的名詞。當時國民黨極力反對這個名詞，認為是對其主權的一大侮辱。然而，經過十年之後，國民黨不但緊緊擁抱「台灣當局」的稱呼，甚至還要擴大使用，企圖要在虛構的「對等」基礎上，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降格為「北京當局」。他們以為這樣做，就已經把問題解決了。

### 自我定位重於「中共定位」

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王兆國，在獲悉「國統會」的這種設計之後，立刻明快回應說，「台灣不是實體」。王兆國的回答，頗能顯示一個有國家人格、國家尊嚴的官員，在發言時相當準確地掌握了分寸。他無需辯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否為「當局」，也無需爭論本身是否為「政治實體」；只要拒絕承認台灣是「政治實體」，就立刻瓦解國民黨的理論推演與閉門設計了。

一個有國家人格、國家主權的政府，原就不必拐彎抹角來構思「政治實體」、「台灣當局」之類的代名詞，如果「中華民國」具有國際地位與國家尊嚴，就直接以國號自稱，為何必須自我矮化成為「台灣當局」之類的中性稱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個會員國，是國際社會共同承認接受的國家。北京政府的地位早已確立，而且也存在了四十餘年，根本無需國民黨來為它定位。「國統會」殫精竭慮為北京政府定位的原因，在於國民黨不能找到自己的地位。

中國領導人的台灣政策是很清楚的，國民黨必須接受「一國兩制」的主張，並且奉北京為中央政府。凡不接受「一國兩制」的種種藉口，或自稱「一國兩府」，或自稱「一國兩區」，

或自稱「政治實體」，或自稱「台灣當局」，都是在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所以，「國統會」設計得無論如何周密，絕對不可能得到中國的承認。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的「自我定位」，顯然比忙著要為中共定位還來得重要。

國民黨自己應該使用何種稱號，到現在竟然莫衷一是。過去四十年來，國民黨對台灣自決、台灣獨立的言論趕盡殺絕，果然就換來今天毫無旋轉的餘地；甚至還淪落到在閉門制定政策時，也把「中華民國」的國號完全擦得一乾二淨。

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為「政治實體」或「北京當局」，事實上並不是要說給北京聽的，而是爲了繼續矇騙台灣人民。國民黨以爲，「國統會」制定一套統一綱領之後，人民就會相信它是「代表中國」的，相信它是主張「中國統一」的。這樣的欺騙，在四十年前就開始營造了。謊話說久了，就變成習慣。國民黨不能自我定位，只好自我欺騙。「國統會」的向壁虛構，越來越暴露其想像力之貧乏了。

一九九一、二、十二 聖荷西

## 「國統綱領」的新版本與舊問題

### 那一國的國家統一

「國家統一綱領」的新版本，在二月廿日正式出爐。有關中共定位的問題，已在這次改寫的版本中全然避開，而以「政治實體」一詞來來概括兩岸政權的稱呼。所謂「中華民國」的國號，也從新稿本中擦拭淨盡。李登輝所領導的「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於寫出一份不知是屬於那個國家的統一綱領。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發展。

新綱領的「原則」第一條說，「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乃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從第一個原則開始，就失去了客觀事實的準則。「大陸」的定義爲何？在這份綱領裡，完全沒有確切的答案。就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中國的領土並不包括外蒙古。但是，宣稱「代表中國」的國民黨，則至今仍堅稱外蒙古是「中華民國領土」。在領土的觀念上，

雙方就有很大的差距。那麼，「大陸」一詞能否成立，本身就是一個懸案。

「原則」第四條又說，「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意願，並顧及台灣地區的安全與安定」。這也是極其虛偽的一個原則。倘若台灣人民的意願受到尊重，為什麼「國統會」竟然閉門撰寫統一綱領？在訂定這份綱領之前，國民黨何曾徵求過台灣人民的意見？過去數十年來，台灣人民的意願早就遭受國民黨的鎮壓與扭曲。「台灣自決」與「台灣獨立」的聲音，在國民黨粗暴的消音政策下，完全躲不過羞辱、摧殘的命運。

這份綱領，既宣稱「維護人性尊嚴」，又表明「保障基本人權」，但證諸台灣的政治現實，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到現在仍呈現一片廢墟的狀態。這樣慘痛的台灣經驗，實令人感受不出所謂國家統一，是「以全民的福祉為依歸」。

因此，在台灣人民意願還沒有受到尊重之前，「國統會」就逕行設計「統一」的近程、中程、遠程的目標，權力人物的主觀意志之傲慢與強悍，可謂暴露無遺。在綱領中，擅自寫下「尊重人民意願」的字眼，此舉已構成了對人民意願的最大侮辱。

李登輝領導的「國統會」，如果對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稍具認識的話，其近程階段的首要工作，應該是優先徵詢台灣人民的意見，是否贊成「中國統一」？對於台灣的前途是否還有其他的選擇？而更重要的，如果人民同意「國家統一」的話，這樣的統一是一個國家的統一？究竟是「中華民國」的統一，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

### 假平等的對等原則

新綱領的文字中，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刪掉之後，雙方就變成「政治實體」，從而雙方就站在「對等」的地位之上了。這樣的文學政治，這樣的敷衍兩句，不免是幼稚而可笑的了。

海峽兩岸之間的對等關係，絕對不是閉門造車就可達成的。這牽涉到整個「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也牽涉到整個國際關係的問題。只有在國際關係的層面上，才有所謂「對等」問題的提出。倘然，國民黨認為統一屬於「中國內政」的層面，那麼就只有誰統一誰的問題，根本無需「對等」。

國民黨既然自認為是代表中國，對於「統一綱領」的制定，原就無需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在對等的地位，而只要依照國民黨本身的需要去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就不必憂慮本身是否代表中國，從來也不必在「對等」的問題上自我糾纏。自從一九八四年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之後，北京就是以中央自居。

在法理上，在現實上，在國際地位上，海峽兩岸從來就不可能構成平等或對等的關係，除非台灣提昇成爲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否則，在現階段談「兩岸對等」，都只不過是畫餅充



饑而已。

因此，「國統綱領」的近程階段說：「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進入互信合作階段。」這些字眼，北京的中國領導人是看不懂的，而且不能接受。至於在中程階段，綱領也說：「兩岸應建立對等的官方溝通管道。」又說：「推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以創造協商統一之有利條件。」這完全是近乎神話的妄想。

從整個綱領的設計來看，國民黨其實是在期待北京能夠承認現狀，亦即承認國民黨繼續統治台灣的事實。換句話說，國民黨在過去都一直祈求美國支持其統治地位，如今則轉而希望北京能夠協助它維持現狀。這樣的向外他求，絕對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國民黨對於台灣內部的憲政改革，一直停頓於推拖延緩的階段，對海峽兩岸的「統一」，則又如此草草了事。從這一內一外的行事態度來看，國民黨只不過是不斷在逃避其政治責任。一部新版本的「國統綱領」，仍然充滿了無法解決的舊問題。陳舊的包袱不能卸除，新的時代是不可能到來的。

一九九一、二、廿三 聖荷西

## 這是變相談判的開端

——論《人民日報》對「國統綱領」的回應

### 非正式的「對談式」

國民黨發表「國統綱領」後，北京先是有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王兆國的評語，繼而有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的正式回應。這先後不同的聲音，正顯示海峽兩岸統治者之間，嘗試建立一個非正式的、但公開的對話。雙方都在創造對本身有利的條件，而這樣的條件便是不要驚動台灣人民的疑慮。

中國的對台辦公室，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設立的。當時，中共領導人首先向國民黨內失勢的蔣緯國、陳立夫等人招降，但北京似乎發現找錯了對象。因為，權力既然不在非主流派手上，國民黨的政策就不可能受到影響。這種錯誤政策，一直施行到去年三月「山中傳奇」的風潮過後，才告一段落。

國民黨李郝雙元體制鞏固起來以後，北京的對台政策不能不跟著調整。自去年七月北京擴大統戰會議結束，中共領導人才開始重新評估李登輝的地位，統戰策略至此又回到「常軌」。也就是說，北京對台政策是跟著台灣的權力中心移動；李登輝既然是權力重心，其對台政策就不能不對他多下功夫。

李登輝設立的「國統會」，幾乎是等於中共黨內的對台辦公室。郝柏村設立的「大陸事務委員會」，就等於是相對於中國國務院對台辦的組織。海峽兩岸統治者都設立了性質相同的機構，很清楚表示了雙方已有對談的準備。談判會不會制度化，值得注意。

在雙方對談還未開始之前，「國統綱領」的發表，簡直就是在向北京開出條件。現在《人民日報》的回應，也彷彿是在討價還價。從表面上來看，兩邊的官方人員並沒有接觸；但是，通過對「國統綱領」的議論，就已達成了溝通對話的事實。

### 不統一的「統一觀」

國民黨的「國統綱領」，以及《人民日報》的回應，其內容都是不符台灣社會的需要。國民黨仍然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框框裡打轉；北京則仍堅持「一國兩制」的教條。他們從來沒有要在各自統轄的社會裡，真正建立起民主制度，雙方卻只在「祖國統一」的文字上

相互推敲。

《人民日報》批評說，國民黨在綱領裡要求兩岸「在互惠中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其目的就是要讓台灣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進入國際社會，謀求外交上的雙重承認。北京的觀點是不錯的，國民黨在台灣統治原就是要維持既得利益的「獨台」。這種維持現狀的方式，在蔣家時代就稱為「蔣獨」，在李登輝時代就稱為「獨台」。

如果國民黨贊成與中共統一，它的利益就全部要拱手讓給北京；如果國民黨贊成台灣人民的獨立運動，它的利益就必須與台灣社會分享。因此，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讓國民黨維持現狀，建國民黨式的「獨台」。「國統綱領」提出的內容，重點不在「統一」，而在如何延續國民黨的統治地位。這是為什麼綱領條文出爐之後，並沒有得到台灣人民的歡迎。

《人民日報》以「一國兩制」來抨擊綱領條文，絲毫不具說服力。該報評論員說，「兩岸經過數十年的對立、隔閡，已各自建立起一套不同的社會制度。我們不迴避這一客觀事實」，所以提出「一國兩制」的統一方針，達到「河水不犯井水」的境界。

中共評論員所堅持的是「一國」的原則，而在制度的內容。但是，恰恰就是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獲得台灣人民的首肯。台灣人民對於國民黨的制度是非常不滿的，甚至是憤怒的。中共以為，維持了目前的制度，就可討好台灣民心，這是很大的錯覺。

誠然，中國與台灣已相隔很久了，但這不是數十年的事，而是數百年的累積。雙方既然

這是變相談判的開端

有不同的社會制度，自然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價值，不同的國家認同。這些才是真正的客觀事實，中共領導人是不能迴避的。

因此，中共雖指控國民黨未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存在的事實，但卻忘記了本身也未能承認台灣社會與台灣國家認同已經改變了的事實。中共的統一觀與國民黨的統一觀，互有歧異之處；不過，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地方，便是他們的政策都在逃避現實。

這次雙方就「國統綱領」的討論而造成的非正式對話，將是未來兩岸變相談判的開端。這種離開現實的對談，無論變得有多正式，都不能代表台灣人民的意願。對於未來的發展，台灣人民必須謹慎注意。他們從公開對話轉入地下談判，才是台灣社會要警覺的。

一九九一、三、十九 聖荷西

## 沒有國防就沒有海防

——論台灣保安員警被挾持的事件

曖昧不清的海峽界線

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沒有釐清，不僅使無辜的百姓受害，也使無知的法律執行者受損。三月八日發生的台灣保安員警遭到中國漁民的挾持，就很典型地反映了當前海峽關係的嚴重問題。三位台灣員警在彭佳嶼查緝中國漁船的走私，他們登船搜索，又擊斃一名漁民，終被中國漁民挾持前往福建。目前，正由新成立的「海峽交流基金會」準備進行交涉。三位員警何時能夠返回台灣，中國漁民被擊斃事件又如何處理？仍在未定之天。

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草案」的擬訂，到「國統綱領」新版本的確定，一直到郝柏村宣示的「後戡亂時期」五大原則，都顯示出國民黨「大陸政策」的設計，已是方寸大亂。在昧於政治現實的情況下，國民黨仍然把中國大陸視為一己的領土。因此，台灣員警敢於登上中

國漁船，並且持槍擊斃中國漁民，都是由於受到這種心態的影響。台灣海峽的防線，原是屬於台灣國防的一部分。在與中國漁船接近時，台灣的保安警察卻以為在執行國內的治安，所以就毫無謹慎戒懼地登船而上。

對中國漁民而言，他們也並不認為在走私。因為，北京既然宣稱台灣是中國內政的一部分，而國民黨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他們載運貨品到台灣，也只是在從事「國內通商」而已，根本沒有「走私」的行為。所謂「走私」，是國際行為，國內的通商，不能視為走私。因此，台灣警察登船查緝，絕對不可能使中國漁民信服。雙方的認知既有如此的差距，衝突的發生自然就無可避免了。

台灣警察在台灣海峽執行任務，根本分不清楚是在國內執勤，或在國際巡防。這種模糊的界線，乃是根源於國民黨制定政策的曖昧不清。如果是依照國際慣例，登上他國漁船，視同進入他國領土；持槍進入他國漁船，無異於武裝侵犯他國主權，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然而，台灣員警一方面把中國漁民當做本國人民，另一方面又要把他們運載貨物視為國際走私。這種自我矛盾的做法，很明顯就使他們的執行任務完全失去公信力。

### 國防海防混淆不清

國民黨的「大陸政策」之所以保持如此模稜兩可的態度，完全是為了保護本身的地位。視中國大陸為其領土，主要是表演給台灣人民看的，以便製造仍然「代表中國」的假象。同樣的，國民黨對待中國漁民時，則視之為異國人民，以防止過多中國人民闖入台灣。

現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及偽民間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在處理這個事件時，也是使用玩弄兩面手法的方式。台灣報章說，中國大陸漁民挾持執勤的員警，已明顯構成中華民國法律的「妨害公務」與「妨害自由」罪。國民黨使用的這兩個罪名，有意製造這是屬於「內政」的問題，用以誤導台灣社會的認識。

與此同時，「海基會」則開始研擬如何與北京談判。可以預料的，雙方在暗中談判時，「海基會」絕對不敢引用「中華民國法律」。究竟是使用國際慣例，或是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可能有待兩邊的討價還價。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中華民國的法律必然上不了枱面。

目前負責執行國民黨大陸政策的「國統會」、「陸委會」與「海基會」，在台灣內部的官僚機構裡，身分也是難以定位的。這些機構能否完全包辦海峽交流的一切事務，到現在仍還沒有定案。「海基會」目前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努力收編其他民間的「中介團體」。即使能夠

收編成功，「海基會」的地位仍然是相當可疑的。

以這種可疑的機構來代理政府權力，其本身就是對公信力的重大傷害。再加上國民黨制定出來的有關海峽交流的草案、政策、原則，也都沒有確切的定義。不定的權力與不定的政策，應用在不停的關係上，其結果當然就是一場災難。

在兩岸交流極為高漲的今天，台灣企業家到中國從事商業活動，到現在仍然分不清他們是在進行國際投資或國內投資，而且也分不清應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還是台灣的法律。國家權力可以使用到如此泛濫而混亂的地步，受害的台灣人民當然就只有繼續受害了。

被泛濫的國家權力任意驅使的三名員警，他們淪落在中國福建的監獄時，可能也不清楚究竟是中國漁民觸犯了台灣法律，還是他們觸犯了中國法律。至於他們在台灣海峽執勤，到底是在執行對外的國防任務，或是對內的海防任務，恐怕他們這一輩子也難以想通了。

一九九一、三、十二 聖荷西

## 「大陸政策」的敵對與互惠

### ——悲觀的國民黨「後戡亂時期」

#### 李郝體制的矛盾決策

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宋楚瑜，於三月四日「海峽交流基金會研習會」上表示，「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況，以交流促進了解，以互惠化解敵意」。然而，與宋楚瑜一起出席會議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言人馬英九，則又提出所謂「後戡亂時期五大不變原則」，其中的一條是：「兩岸雖然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但最起碼還是敵對狀態的政策不變。」

在同樣一場研習會裡，代表李登輝系統的宋楚瑜，主張兩岸應該化解敵意；代表郝柏村系統的馬英九，反而強調敵對狀態不變。權力核心內部的南腔北調，恰如其份地反映了國民黨現階段的決策現象。沒有人能夠看得懂這種高度難解的「大陸政策」，究竟兩岸關係是互惠的，還是敵對的，實費人猜疑。

非常明顯的，宋楚瑜與馬英九的談話，分別代表了李登輝與郝柏村之間的權力緊張關係。在十天之前，李登輝領導下的「國統會」才通過一份「國統綱領」新草案，在近程交流互惠的階段裡，就明白寫下了如此的字眼：「以交流促進了解，以互惠消除敵意」；「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這份草案修訂之後，由李登輝核定，並去函行政院，再由行政院據以參照辦理。

行政院參照辦理的結果，便是在海交會研習會上提出「五大不變原則」，完全推翻了「國統會」苦心設計出來的綱領。行政院不僅提出敵對狀態不變，並且還強調「國府與中共政權不做政治性官方接觸的政策不變」。這項原則，可以說是針對「國統綱領」而提出的。因為，「國統綱領」的中程互信合作階段，已明白表示「兩岸應建立對等的官方溝通管道」；同時，還要進一步「推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以創造協商統一的有利條件」。

如果郝柏村的五大不變原則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李登輝的「國統綱領」就是廢紙一張。反過來說，倘若「國統綱領」可以實行的話，則郝柏村的不變原則就完全動搖了。在「大陸政策」的制定上，李登輝與郝柏村的雙頭馬車，必然會造成決策的分裂。一個國家的重大決策，竟然會產生如此分歧、衝突、矛盾的現象，這恰恰證明了權力核心已經癱瘓了。

## 「大陸政策」的敵對與互惠

### 不尊重民意的惡果

「國統會」在制定「國統綱領」時，一筆刪去「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意願」，而代之以「顧及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安全與福祉」。這種蔑視民意的條文，使得「國統綱領」充滿了統治者的主觀意志。因為，人民的意願是基本人權無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的意願是天賦的，不能有絲毫折扣的。人民的權益、安全、福祉，則是統治者規定的。在規定人民的權益時，統治者必然優先考慮自身的利益。因此，「國統綱領」雖然揭示「顧及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但仔細考察的話，國民黨的利益已優先被顧及了。

正因爲有「國統會」對人民意願的不尊重，所以才有行政院的完全擦拭台灣社會的願望。在郝柏村的五大不變原則裡，人民是不存在的；這五大不變，正說明了行政院的政策，仍然是以台灣人民做爲假想敵。

實行了四十餘年的戡亂體制，其戡亂對象從來就不是以中共爲目標，而是台灣地區的人民爲主要敵人。在戡亂的漫長時間裡，受到逮捕、判刑、槍殺的，並非是海峽對岸的「叛亂團體」，反而是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現在台灣就要進入「後戡亂時期」，行政院仍然堅持五大不變原則，這等於暗示，在過去成立的「通匪」、「資匪」等等罪名，又將以其他新的包裝

繼續存在下去。

今年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以後，幾乎可預見到台灣人權的情況不可能有改善。李登輝的互惠關係與郝柏村的敵對關係，必然使人民無所適從。如果海峽兩岸是互惠關係的話，國民黨首先要做的，就是平反過去在「通匪」、「資匪」裡的冤案、錯案、假案。如果是敵對關係的話，則「動員戡亂時期」根本無需廢止，否則台灣人民隨時都有落入法網的可能。

宋楚瑜與馬英九在海交會研習會上的發言，再一次暴露國民黨決策的草率。行政院如果根據五大不變原則去制定「兩岸人民關係法」，其內容、精神一定與「國統綱領」發生衝突。這是典型的國民黨統治方式，所有的法令閉門制定之後，都驅使台灣人民去擔任實驗品的角色。如果沒有錯的話，功勞歸於國民黨；如果法令有任何差錯，受害的一定是台灣人。

無論互惠關係或是敵對關係，國民黨的「大陸政策」並沒有考慮到對台灣人民意願的尊重。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與台灣人民之間的猜疑與敵對必然會加深。後戡亂時期來臨時，明天的台灣會更亂。

一九九一、三、六 聖荷西

## 國際生存空間日益萎縮

### ——台灣加入關貿總協的困境

#### 錯誤立場決定錯誤方向

台灣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GATT）的問題，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台灣主權不能確立，入會的問題就不能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三月廿七日於北京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台灣既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麼它當然沒有資格參加關貿總協。只有在中國同意之下，可以做為一個地區來參加。」

這個問題，原就無需錢其琛來說，歷史經驗早已顯示，台灣如果不是一个獨立的國家，就根本不可能加入任何一個國際組織。台灣是亞洲開發銀行的創建國，竟然還必須接受後來入會的中共的安排。現在要加入這個全球性的關貿總協，北京當然還是堅持要把「亞銀模式」應用在台灣之上。

關貿總協執行長鄧克爾 (Arthur Dunkel)，在日前已說得很明白：「在聯合國體系中，台灣並不存在，而代表中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又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對台灣申請入會做什麼？事實上，我們無能為力。」如果甚至關貿總協的執行長都已經持這種看法，則無待北京的阻撓，台灣申請入會之舉，自然是困難重重。

在聯合國體系中不存在的台灣，其實在其他國家的地圖上也是不存在的。這不只是國民黨不能確立台灣主權而已，更惡化的是，國民黨到今天仍然還堅持宣稱代表中國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當然就必須聽命於北京的安排。

國民黨秘密以「台澎金馬」的名義申請入會時，原是期待美國能夠支持。對國民黨來說，只要華府扮演「帶頭支持」的角色，台灣就可順利入會。美國貿易代表奚爾斯，在三月廿六日對台北記者，就說得很坦白，美國即使在台灣申請入會一案上擔任積極的贊助者，但仍需考慮到其他會員國的保留態度。

台灣如果不是一个獨立的國家，如果在主權問題上不能爭取生存空間，則無論透過其他國家如何實力的支持，也還是難以成爲國際組織的一員。使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日益萎縮，最大的原因就是國民黨至今仍死不悔改地堅持「代表中國」的立場。錯誤的立場，自然就導致錯誤的方向，這原就是無需爭辯的一個事實。

### 頑強語言難抗頑強現實

郝柏村在三月廿二日與民進黨立委的政治對話，被視爲是近年來最大的一次統獨爭辯。在那次答詢中，郝柏村擺出高姿態表示：「新加坡是個獨立國家，但台灣不能成爲一個獨立國家，因爲新加坡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兩者不能混爲一談。」

這種貌似莊嚴的談話，完全不能改變殘酷的現實。新加坡從前是英國殖民地，在宣佈獨立之後，立刻能夠加入國際社會。台灣從前是日本的殖民地，在變成中華民國領土之後，反而從國際社會中消失。台灣在「中華民國」的陰影下不能獨立，在理論上固然可以搪塞；然而，中華民國究竟在現實上生存於怎樣的空間？沒有台灣，就沒有中華民國，這是至爲明顯的事實。離開真正的土地與人民，國家就只剩下空殼子而已。對於以血汗創造經濟奇蹟的台灣人民，國民黨從未給予承認，卻反而要以空頭的名義，使台灣人民從國際社會中放逐出來。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說得非常透徹，台灣要加入國際組織，就必須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國民黨不想朝獨立的方向去走，就沒有資格參加國際組織。

不是北京阻撓台灣入會，也不是美國不帶頭支持，更不是關貿總協不願開門，而是國民黨放逐了自己，也放逐了全體台灣人民。郝柏村在國會議堂上說得那麼驕悍，那麼強硬，卻



完全不能改變客觀現實於萬一。台灣在三月廿五日與澳洲簽訂航空協議時，澳大利亞就特別指出：「澳洲視中共為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澳洲不會與台灣簽下任何『政府對政府』的航權協定。」郝柏村的強硬立場，可能是勝利的；但是，在國際現實上，他是一敗塗地的。一紙航空協定，尚且如此，則申請加入關貿總協一案，更是可想而知。

台灣要在國際社會爭取生存空間，就不能不朝向獨立主權的道路去追求。如果中華民國的生存，能像郝柏村那樣說得文情並茂，其前途早已獲致四海歡騰的境界，又何至於每年都照例必須為中華民國的地位苦心辯論？主權的誕生，並不能從辯論中求得，而是要從現實中的土地與人民去建立起來。企求中共善意的反應，企求美國善意的支持，倒不如反求諸己，謙卑地與台灣人民尋求善意的合作。頑強的錯誤，造成頑強的惡果，這是四十年來的慘痛教訓。放逐的中華民國，已到了必須向台灣人民回歸的時候了。

一九九一、三、廿九 聖荷西

## 傳達北京信息，不能如此沒水準

### 「看天田」般的報導

才在十天之前，台北某報轉載了一篇香港《潮流》月刊所刊登的文章，題目是「木馬屠城八小時解決台灣問題」。該文有如此聳人聽聞的說法，鄧小平誇稱，「只要七個空降師配台海、空軍，在八小時內就能把台灣問題解決」。十天之後，同樣的報紙在四月一日又從北京報導說，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王兆國引述鄧小平的話說，以後將少提或不提武力犯台的問題，並認為兩岸可以坐下來談台灣發展國際政治活動的問題。

上面兩則報導，都是引述鄧小平的發言，而且也同樣在原來的報紙刊登，然而傳達的信息內容卻是相反的。第一則說，八小時之內，就可使用屠殺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第二則說，此後將少提武力犯台的問題。台灣的新聞報導，竟然是如此沒有水準，彷彿台灣讀者都是「愚

民」一般。

仔細分析該報發佈這兩則消息的動機，就不值得訝異了。原來《潮流》月刊，是該報特派員在香港編輯的刊物。以他自己刊物的文章，傳真給在台灣「母報」，就可以用來恫嚇台灣的住民。這種無需成本的、廉價的報導，代表其報格是如何的不上道了。

該報從北京發回的消息，乃是王兆國面對國民黨非主流派學者的發言。這群據說都是「博士級」的國民黨學者，在失意政客李慶華的率領下，集體到北京去聽訓。這位「對中共有幻想」的展望基金會負責人，希望北京能夠讓國民黨在國際有生存的空間，以便抑制島內的台獨聲浪。李慶華與一群博士級學者，這樣上京告狀，恰恰反映了國民黨早已失去了其主體性。要解決台灣獨立的問題，就應該在台灣本土解決。他們竟然本末倒置，放下學格、放下身段，祈求中共給予「生存的條件」。

王兆國的談話，毫無新意。但是，充當北京傳聲筒的台北該報，又一次老調重彈地予以報導。該報早已遺忘，僅僅在十天之前，鄧小平揚言要在最短期間內武力侵台。現在則又說，北京此後將不再談武力犯台的事。究竟是北京對台政策轉變特別迅速，還是該報報導的變調特別迅速？當報紙失去其主體性的時候，它就只有像看天田一般，等待統治者隨意餵養任何消息。反正有消息就報導，且不管其可信度為何。

### 「變色龍」式的政策

國民黨報紙之所以如此沒有水準，最主要的原因是，國民黨的大陸政策也是非常沒有水準。跟著統治者奔走的報紙，無論其主子是北京或台北，自然也就隨著統治者的顏色而轉變。

爲了宣佈戡亂時期終止，國民黨竟然不知道如何稱呼北京政府。爲了公佈「國家統一綱領」，國民黨竟然可以放棄自己的國號。戡亂時期既然終止，中共就不再是叛亂團體；既然不是叛亂團體，它當然就是一個政府，一個國家。國民黨卻還是避免面對現實，全然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

國民黨向台灣人民公開表示它是主張統一的，然而，公佈「國統綱領」時，竟然找不到任何國號。國民黨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固情猶可原；然而，國民黨在綱領上也完全拭去「中華民國」的國號。那麼，所謂國家統一，究竟是那一國家與那一國家統一？這樣沒有水準的綱領，就能夠達到統一嗎？

國民黨之沒有水準還不止於此。明明在公佈「國統綱領」時，國民黨就已表示希望得到中共「善意的回應」；但是，北京尚未有任何回應之前，國民黨又宣稱，在終止戡亂時期之後，中共將被定位爲「敵對團體」。這又是怎樣的政策？一方面祈求對方要有「善意」，一方面又

表示對方是「敵對團體」。這樣的政策，是沒有人看得懂的。中共一個喪失主體的政府，制定出來的政策必然是喪失主體的政策。可以想像的，它參養出來的學者，當然也是喪失主體的學者。上樑不正下樑歪，看天田的新聞報導，傳達的果然又是喪失主體的信息。

北京的對台政策，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就沒有產生任何變化。它的「武力犯台」與「和平統一」政策，是交互運用的。鄧小平在一九八四年定了「一國兩制」的調子之後，其對台政策更是固定化了。除非鄧小平死了，或是中共上層權力結構改變了，北京對台政策是不會輕易調整的。台灣的報紙要傳達信息，必須對北京政策有基本的認識與研究。一味追隨台灣的變色龍政策，又一味做看天田的報導，其結果當然就是災難了。

一九九一、四、二 聖荷西

## 謹防海基會趁內亂引進外患

### 台灣進入內亂時期

國大臨時會與立法院同時爆發的憲政戰爭，正吸引全國人民的注意。就在這場由國民黨主導出來的內亂越演越烈之際，台灣行政院的偽民間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將於四月廿一日派員前往北京談判。據說，這是要「建立兩岸溝通管道」的一次談判。由於台灣已經進入了內亂時期，對於海基會此行的意義，許多人並不特別注意。究竟海基會的談判內容是什麼，日後對台灣社會將產生怎樣的影響，甚至會不會利用外患的陰影來鎮壓內亂，這些問題是不能不予以關心的。

國民黨對「大陸政策」的混淆不清，不僅使台灣與中國的往來一直不能穩定下來，而且也由於國民黨始終不能為自己定位，連帶使今天國大臨時會與立法院陷於紛亂的狀態。國民

黨迫切要解決與北京的曖昧關係，就像今天國大臨時會要解決曖昧的憲政問題一般，都是以倉促草率的方式上下其手，企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使人民分辨不清整個政治發展的動向。

在憲政危機上，台灣人民可以依賴本身的智慧與能力，來對抗國民黨的暴行。即使萬年代表利用警察權來進行「實質修憲」，台灣人民還可以使用抵抗權拒絕承認、拒絕接受。但是，這次海基會在行政院的「授權」之下前往北京，雙方會達成何種程度的協議；在黑箱作業的情況下，其談判結果恐怕就不是台灣人民的力量可能左右。

根據「國統會」公佈的國統綱領，表面上雖有所謂短程、中程、長程的目標，但實際上這份綱領完全沒有時間表可循。因此，從模稜兩可的文字裡，根本不能看出長短之分。制定這樣一份計劃，國民黨在作法上自然可長可短。在這種彈性的「大陸政策」指導下，這次海基會遠赴北京，極有可能同時把短程、中程、長程的目標一併完成。

海基會的工作，可以不必顧及台灣人民的意願；因為國統綱領已公然刪除「尊重台灣地區人民意願」的字眼。可以想像的，海基會在面對中國領導人時，談判的基礎將只有國民黨的統治意志，以及中國方面的利益；最多最多，也只是「顧及」一下台灣人民的權益而已。

## 海基會是「人頭政府」

現在更令人擔憂的是，海基會的任何談判不必負一切任何政治責任，國民黨也不必負一切任何政治責任。行政院對外宣稱，海基會只是一個「民間機構」，它只是接受委托辦理中國大陸業務。換句話說，海基會變成國民黨的另外一個「人頭政府」，日後凡是發生不良結果，可以由海基會去承擔；但凡是有任何好處，都由國民黨去接收。

海基會此行的主要接觸對象，是中國國務院的對台辦公室。這清楚顯示，海基會這個偽民間機構，進行的是一種官方性質的工作。只要官方接觸的基礎建立起來，雙方談判的內容就會跟著擴大。就像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說的，國統綱領雖有階段性的先後次序，但階段與階段之間並無明顯區隔，也沒有界限或時間表。依照這樣的原則去發展，這次海基會在北京會談出「兩岸高層人士互訪」的結果，恐怕就不是意外的事。高層人士互訪時，也就是談判層次提高的時候，這才是台灣社會的夢魘。

利用中國的陰影，對台灣內部進行恐嚇，是國民黨的統治武器。在過去，國民黨指控台灣獨組織與中共「勾聯」從事活動；現在則改變了語調，如果台灣宣佈獨立，中共就會武力犯台。在未來，很明顯的趨勢是，國民黨自己乾脆與中共去「勾聯」，這比起過去任何恫嚇所造

成的壓力還大。海基會表面上是中介機構，骨子裡是進行勾聯工作，這是「人頭政府」的最大好處。

當台灣爲了改造憲政而進入內亂時期之際，全國人民絕對不能忘記國民黨已正式與北京在做官方接觸了。如果國民黨在內亂失控時，如果國民黨在失去島內的政治資源時，它有可能藉北京的力量來壓制台灣民間的力量。海基會是行政院的延長線，日後也將成爲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熱線。面對今日台灣內憂外患的局面，吾人才更加痛切感到，台灣非得加速建立一個能夠反映台灣人民意願的政府不可；只有具備民意的政府建立起來，歷史的噩夢才有可能祛除。

一九九一、四、十三 聖荷西

## 海基會與國民黨的大陸政策

### 壟斷與中國的對話權

「海峽交流基金會」訪問團到達北京時，國民黨正式與中共建立了官方的接觸。國民黨一方面宣稱中共是敵對團體，一方面又派員與中共官方人員接觸；這個事實證明，所謂「三不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就是要讓國民黨壟斷與中國的對話權。海基會當初的成立，是爲了收編台灣其他對中國交流的團體。現在在行政院陸委會的授權之下，海基會有意構築北京與台北之間的唯一溝通管道，企圖已很明顯。

海基會的北京之行啓程之前，陸委會主任委員施啓揚對外表示，「政府必須檢討局部擴張兩岸的危險性」。他說，兩岸民間交流後，台灣所得的是開放探親與文化交流；而失去的是資金產業外移，以及對中共心防的鬆懈。施啓揚既是陸委會主任委員，而且又熟悉兩岸交流之

後的得失，爲什麼還要授權海基會去北京談判？施啓揚提出的警告，如果不是虛偽的，便是在掩護海基會的北京訪問。國民黨自己率先與北京接觸，卻又責怪民間對中共心防的鬆懈。這種政策，能稱爲政策嗎？

陳長文與中國國務院對台辦副主任唐樹備見面時，中共就立即提出五個原則。北京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以及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立場，都包括在這些原則裡。這種會議還未召開就把結論放在前面的模式，原是中共統戰的一貫策略。中國對待西藏達賴喇嘛，使用的就是這種模式，這原是無足爲奇的。

奇怪的反而是陸委會的回應，該會的副主委高孔廉說，中共所提五大原則的內容，均超越了海基會所獲授權的範圍。更可笑的是，該會發言人馬英九則說，中共五原則提到的「三通」、「高層互訪」，都屬於「國統綱領」的第二階段。他們以爲，「陸委會授權」與「國統綱領」是何等神聖的事情；海峽兩岸客觀形勢的發展，都一定會隨著國民黨的主觀願望去演變。

對中國政治稍有研究的話，都應該在接觸之前預知中國方面可能出現的動作。國民黨既然迫不急待要進行接觸，中國領導人自然也有備而來。他們熟悉統戰的技巧，也熟悉如何順勢使接觸的層面升高。高孔廉與馬英九事後聰明的談話，只證明他們徒然握有權力，對中國卻一無所知。

### 戴保險套式的接觸

緊跟高孔廉、馬英九的發言之後，陸委會又於五月一日發表一份聲明。在聲明裡，國民黨再度故作無辜狀，說什麼海基會只希望討論迫切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未料北京方面卻重複其一貫的統戰策略，聲明表示「令人深感遺憾」云云。

陸委會發表的這份聲明，絕對不是要給北京看的，而是對台灣人民進行哄騙的一種手法。這就像陳長文在北京表示，「絕不會有秘密會面或出賣台灣等情事」。倘然這是民間的接觸，爲什麼陸委會必須三番兩次出面澄清，爲什麼陳長文必須如此信誓旦旦？從陸委會種種離奇的反應，已充分證明國民黨是一個失去人民信任的政權。它知道北京之行，一定會引起人民的懷疑，所以它才表現出又是遺憾，又是保證的狼狽姿態。

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交往，原是無可抵擋的趨勢。雙方對話的問題，是屬於全體台灣人民安危的問題。然而，國民黨寧可選擇密室決策的方式，也寧可選擇避開正當立法的方式，獨斷獨行與中國官方私下溝通。不僅如此，國民黨還在政府體制之外，創造另一個「人頭政府」——海基會，企圖逃避它應當承擔的一切政治責任。

雙方明明已經發生了不可告人的關係，國民黨卻片面宣稱它戴了保險套。有海基會這樣

的保險套，國民黨竟然可以公然宣稱沒有去北京幽會。這種虛偽的政治道德，台灣人民絕對不可能接受的。何況，國民黨目前擁有的保險套就一定保險嗎？這種法外情能夠保證不帶來暗疾嗎？

台灣擁有最勤勞、最守法的人民，也擁有可貴的經濟能力與智慧，卻偏偏遇到了一個最沒有骨氣的政府。它一方面高舉「一個中國」的旗幟，另一方面又堅持「統一中國」的主張，然而它卻以「政治實體」自居，自動把「中華民國」的國號取消。在進退失據之餘，既譴責中共不做善意的回應，又責怪台灣民間沒有中共心防。全世界絕對沒有這樣毫無擔當的政府。國民黨跑到日本，就自稱「亞東交流協會」；跑到美國，又自稱「北美協調會」。如今跑到中國，又立刻改名為「海峽交流基金會」。請問「中華民國」，你的名字叫什麼？

一九九一、五、三 聖荷西

## 壓抑情結的終結

陳芳明

——《李登輝情結》與《福爾摩莎情結》後記

如果有人問起：在文學、歷史、政治方面的撰寫工作上，我究竟在追求什麼？回顧這十年來我所努力的方向，答案應該只有一個，那就是追求台灣人民主體性的重建。

討論台灣文學時，我始終相信，台灣文學的自主性格早就建立起來了。自日據時期以降，台灣作家未嘗脫離過島上人民的憧憬與願望而進行創作的。探索台灣文學的心靈世界，原就無需援用台灣以外的文學理論來界定，其自主性的存在自始就是飽滿的、豐饒的。用一種自卑的腔調，企圖矮化台灣文學的發展，刻意附會台灣文學是其他地區的支流或一部分，這種說法只在反映少數台灣作家的侏儒心態。

同樣的，在討論台灣歷史時，我也認為，歷史解釋必須以台灣人民為中心。台灣歷史的創造與推動，全然是出自島上住民的力量。無論是早期先民的開拓，或是晚期移民的貢獻，其血汗心力最後造就了今日台灣社會的格局。離開台灣人民的主體來定義台灣史，終究不免歪曲了歷史。建立台灣人民的史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撥開統治者歷史解釋的迷霧。對於中

國帝王史觀與帝國主義史觀，我不斷強調必須予以批駁釐清。這種工作，不容存有絲毫的溫情主義與僥倖心態。恢復台灣人的歷史解釋，無非是要恢復台灣人真正的精神面貌。

觀察當前台灣政治發展時，我尊崇的是台灣人權、台灣民權、台灣主權。人權，牽涉到個人生存的最根本尊嚴；民權，是人民參予政治時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主權，就聯繫整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立足的人格。在思考政治問題時，我未嘗須與偏離這三個層次的中心。我從來就相信，政論不是無的放矢，不是情緒發洩，而是對不公不義體制的批判。政治影響層面之廣泛，就像一個開關監控不同房間的電燈。當一個瘋狂統治者濫用、誤用權力時，往往就像一個劣童在肆意玩弄電燈開關，其快感可以說全然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對於這樣的統治者，如果不予以撻伐批判，權力將只有繼續腐化下去。

我不能不承認的是，在撰寫文學、歷史與政論時，心情總是偏向緊張的。對於一位學者而言，所有的問題也許都可以採取客觀而從容的態度來處理。我一向尊敬這樣的學術紀律。不過，在不正常的台灣社會裏，有許多事件並不必然都是屬於學術問題。當一部憲法可以用來侵犯人權，當一個政權可以濫用國家名義來侮辱人民時，我認為這不是客觀的學術問題。當法拳、暴力擊打在手無寸鐵的百姓身上時，人民的立即反應必然就是使用抵抗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有學者從容進行客觀的分析，仍然還袖手探討這樣的暴力會不會引起痛楚；那麼，這已不是學者了，而是幫兇，是共犯。

我的心情特別急迫，主要是因為台灣已經虛擲了太多可貴的時光。這兩年來，我回台四次，深深覺得台灣社會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階段，甚至是已到了不變就不足以生存下去的地步。城市交通之混亂，空氣污染之嚴重，早已超過人類體能所可負荷的程度。即使不談高層次的憲政改革問題，僅僅就形而下的垃圾而言，竟然會演變到束手無策的境地。這種問題，只有垃圾政權才會製造出來。面對這種精神異常的政權，許多學者仍然樂此不疲地耽溺於蓋洛普民意測驗遊戲，仍然還非此不樂地高談台灣不必制憲，仍然還樂不可支地揚言中國最終將統一。什麼樣的政權參養什麼樣的學者，什麼樣的人格押注於什麼樣的市場。

相對於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台灣政治脚步不僅是緩慢的，而且還出現了倒退的現象。在二十世紀快要結束之際，東歐發生了大規模的民主改革，蘇聯帝國體制也次第走向了瓦解。這種演變所具備的革命意義，較諸一九一七年布爾塞維克的取得政權還更加深刻重大。然而，這還只是局部性的變化而已。對當代的人類歷史來說，最使人感到刻骨銘心的發展，莫過於全球性冷戰體制的傾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出現了意識形態的對立，核子武器的競賽，強權干預弱國的橫行，這些都支配了人們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方式。

隨著冷戰結構的解體，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各個社會已開始尋求彼此的和解，也開始追求各自主體的重建。這種主體性的恢復運動，重新調整了人類的思維與價值。九〇年代所見證的殖民地、附庸國紛紛獨立自主的事實，其意義當不止於政治層面而已。更重要的是，



在人民力量的主導之下，各個社會的固有文化開始獲得回歸自主的機會。

在這種世界大改造、大調整的背景下，台灣竟然是反其道而行。爲了拒絕加速憲政改革，當權者在島內不惜引發省籍對立與統獨紛爭。和平互信的時代已經降臨了國際社會，統治者竟然把這種祥和的氣氛監禁於台灣島嶼之外。歷史的巨輪並不會因此而停滯下來，當統治者拒絕前進時，時間是不可能等待的，人民更不可能耐心等待。人民的力量正在萌芽，破土的儀式不久就要揭幕了。

《李登輝情結》與《福爾摩莎情結》二書，收集的是我在一九九〇年夏天到一九九一年夏天所寫的政論。這段期間，正是國是會議結束之後，以及民間的保台會召開之前。這整整一年裏，巨型的示威遊行已足夠影響台灣政治氣候。我親身感受到，人民的信心正在恢復之中，人民的主體也正在重建之中。我更深深感受到，過去兩年來社會中瀰漫的李登輝情結已日趨退潮之中。英雄與英雄崇拜的時代，畢竟已一去不復返了。沒有聖明君主能夠拯救台灣，唯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自我拯救。這兩冊政論集的文字，所要表達的正是這樣的信念。

情結，是一種壓抑的心理狀態，是一種不正常情緒的寄望與憧憬。以《李登輝情結》做爲書名，自然是對這兩年來台灣政治文化的一個諷刺。這種不平衡的情結能夠減少一分，人民的主體才能恢復一分。以《福爾摩莎情結》來命名，也是對台灣人民心情的一個反射。自來台灣人都習慣以壓抑的情緒來表達對鄉土的愛。如今，在人民力量崛起之際，熱愛台灣已

無需掩飾，而應該是明朗、開闊而放曠。這種健康的心情能夠多放寬一分，台灣社會的主體才能重建一分。

出版這兩冊政論集之前，我有一次日本之行。走在東京街頭，我頗能體會到日本人正積極準備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心情，更能體會到日本正朝向大國氣象的道路邁進。那天，與友人到達新宿時，黃昏裏飄然下著小雨。在潮濕的燈光中瞻仰東京都政府的龐然建築，我禁不住告訴朋友，東京將不僅成爲亞洲的首都，而且極有可能成爲二十一世紀人類的首都。嗜盡敗戰滋味的日本人，終於在廢墟中站起來了。做爲日本鄰國的台灣，在顛覆統治者的引導下，顯然還沒有找到站起來的機會；相反的，似乎還有意走向廢墟之中。

二十世紀即將到達終點，這是人類歷史的另一個重要分水嶺。在世紀末迫近之際，台灣人民也應該對長久以來累積起來的壓抑情結做一個總結。我深深相信，台灣政治的對決年代也日益迫近，因爲人民不會容許把本世紀的問題繼續帶到下个世紀。以台灣社會的人民意願來取代當權者的統治意志，恐怕就是未來十年的主要工作。

出版之前，我應該感謝李敏勇、張炎憲兩位摯友賜予給我。他們都是「四七社」的同志；「四七社」，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文字工作者集團，也是二二八事件後倖存世代的集團。我的思考與心情，敏勇、炎憲當能分享；我的憂慮與焦急，他們也能夠分擔。我們是台灣歷史的未亡人，上蒼讓我們存活下來，是爲了見證台灣歷史的改造，我與我的世代將繼續密切觀

察、介入、獻身，以一顆不滅的、不碎的心。

一九九一、十、廿二 聖荷西

... 一九九一、十、廿二 聖荷西 ... 一九九一、十、廿二 聖荷西 ... 一九九一、十、廿二 聖荷西 ...

除非你要做中國國民，  
或外國人，或世界公民，  
否則，你會感覺  
本土文學的重要與必要。

# 台灣作家全集

一流的家長，一流的作品  
一流的印象，一流的水準  
不需要任何理由！

短篇小說保存全350冊

前衛出版社圖書目錄

李登輝情結

ISBN : 957-9512-37-x(平裝)

1991年11月 初版第一刷發行

定價：180元

作者：陳芳明

出版者：前衛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10748金門街9-14號

電話／02-3650091

傳真／02-3679041

郵撥／05625551 前衛出版社

發行人：林文欽

法律顧問：謝長廷律師

印刷所：松霖彩色印刷公司

☆局版台業字第2746號

1991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若有印刷、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陳芳明簡介

台灣左營人，一九四七年生。一九六九年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一九七三年獲台大史學碩士，一九七四年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深造。除本行的史學研究之外，他以「陳嘉農」筆名寫詩和散文，以「宋冬陽」寫文學評論，以「施敏輝」寫政論，並歷任海外《美麗島週報》編輯、《台灣文化》總編輯、「台灣文庫」執行主編，是海外反對運動一支健筆，因此長列「返台黑名單」達十五年之久。

著有《鏡子與影子》《詩和現實》《受傷的蘆葦》《放膽文章拚命酒》《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在時代分合的路口》《鞭傷之島》《台灣內部的民主的窺探》《台灣對外關係的窺探》《謝雪紅評傳》。

編有《台灣意識論戰選集》《楊逵的文學生涯》《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專輯》。

CAVES BOOKS, LTD.

敦煌書局

NO.76-78, WU FU 4TH RD. KAOHSIUNG, TAIWAN, R. O. C.  
TEL: 561-5716 銘謝惠顧 THANK YOU

周宜旋

573.07

7546-6

2995836

單位：總圖書館 CP

來源：周宜旋先生贈

日期：97.12.11